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二〇二一年九月第三期(总第九十一期)第二十三卷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2021
第3期

2021年9月 第3期(总第91期) 第23卷
Sept.2021 No.3 Sum.91 Vol.23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杨亚林到 省社会主义学院调研



7月30日上午，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杨亚林到省社会主义学院调研；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徐彬，省委统战部有关领导，省社院领导班子成员陪同调研。

杨亚林一行参观了统战文化浮雕墙、云南民主党派工商联发展史教学基地、图书馆（统战文献中心）、教室、学员宿舍等。

杨亚林对省社院近年来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作用表示肯定。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省委印发的《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精神，为巩固统一战线各领域成员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作出更大贡献。

（文字：肖莉莉 图片：王曜宇 责编：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1年第3期(总第91期)

本刊顾问

杨保建 徐 彬 高 峰 李玛琳 喻顶成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蔡 勇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袁光兴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寅平 李从贤 杨松禄 钟瑞华

侯晓芳 诸 芳 黄 梅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执行主编:王寅平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王寅平

副 主 任:杨松禄 罗 雷

责任编辑:念兴昌 李亚强 朱家麟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严维国

编 务: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目 次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逻辑、经验与启示 林华山 (5)
- 百年统战历程 生动云南实践
——“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在云南的实践与探索”理论研讨会综述 ... 马弋涵 (12)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三个维度 陈昌荣 (18)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内在逻辑与功能意义 李 娟 (24)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 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 吕鸣章 (34)
- 从十月革命到苏联再到俄罗斯的历史巨变 李亚强 (40)

●统战理论与实践

- 高校海归教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初探 杨美新, 郭燕萍 (49)
- 大统战视阈下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现实路径
——以玉溪市为例 李昆裕 (54)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 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与组织优势的效能优化 李旭辉, 江生亮 (60)
- 新时代协商民主: 逻辑、理论特征与实践价值 周宗耀 (71)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6*2021-8]

●民族工作

-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民族工作的历史贡献 尹记远 (82)
- 文化治理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中的现实意义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李 贞 (89)

●文化建设

- 云南水族文化传承及发展研究 方 琳, 李云兵, 张 横 (94)
-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 张 璐, 许 焯 (101)

●发展问题研究

- 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吴 韬 (108)
- 大学生公益创业融入社会治理: 逻辑、功能与进路 苗江欢, 熊天露 (115)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3, 2021

Content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Centennial Founding of CPC

- Logic,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The CPC-Led United Front's Facilitation to the Chinese People's Unity Lin Huashan(5)
- Centennial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Front and Its Practice in Yunnan: A Report on "Seminar of CPC's Theories and Policies Regarding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ir Practice and Improvement in Yunnan" Ma Yihan(12)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 Scientific Perception from Three Angles into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hen Changrong(18)
- The Intrinsic Logic and Functional Effect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Powers'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Li Juan(24)

Theories and Practice Marxism

- On Engels' Particular Dedication to Marxism Lyu Mingzhang(34)
-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from October Revolution to the Time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Li Yaqiang (40)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 A Probe into the Orient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Teachers' Outlook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Colleges Yang Meixin, Guo Yanping (49)
- The Great United Front's Ways to Reinforce the Non-CPC Representatives'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Yuxi City Li Kunyu (54)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 On the Functional Optimization of Mechanism for Diversified Circles and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Based on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Li Xuhui, Jiang Shengliang (60)
-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the New Era: Logic,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e Value Zhou Zongyao (71)

Work on Ethnic Affairs

- Contributions of Local CPC Organizations in Yunnan to Ethnic Affairs during the Wartime of Liberation Yin Jiyuan (82)
- Significant Affec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on the Form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National Solidarity: A Case of Xishuangbanna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Dai Li Zhen (89)

Cultural Development

- Carrying on and Developing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hui in Yunnan Fang Lin, Li Yunbing, Zhang Heng (94)
- Keeping up and Promoting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for the New Era Zhang Lu, Xu Ye (101)

Issues on Development

- Towards China's E-government and Digital Governance: Theories and Practice Wu Tao (108)
-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with Public Interests Mingled with Social Governance: Logic, Function and Approaches Miao Jianghuan, Xiong Tianlu (11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 大团结的逻辑、经验与启示

林华山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重庆400064)

摘要: 中华儿女大团结体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效应与话语创新。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致力于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中华儿女大团结实现彻底的大团结大联合,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服务建设整合人民的核心政党、多样一体的现代国家、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的进程中,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宝贵历史经验:以构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心圆政治格局为根本原则,以服务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目标为行动遵循,以协同两个范围联盟及命运共同体为基本格局,以坚持精神与利益、政策和制度相结合为科学方法,以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奋斗主题为前进方向。新时代统一战线要汲取历史经验,提高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效能。

关键词: 统一战线; 中华儿女大团结; 中国共产党; 现代国家; 中华民族; 党建国家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3-0005-07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举团结的旗帜,领导形成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壮阔局面,彰显善于团结、敢于胜利的巨大政治优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强调“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铸就百年辉煌的团结密码,指明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运用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以大团结凝聚大力量、以大力量推动大发展,沉淀出宝贵经验。在新征程上,系统梳理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汲取大团结智慧、深化大联合实践,必将能为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可逆转之势,汇聚起一往无前、浩浩荡荡的磅礴力量。

“统一战线与中华儿女大团结”是具有内在密切关系的重大命题。但是,以往的理论文献较少涉及统一战线与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关系,仅有少数相关短评论及^{②③}。有的文献在研究新型举国体制时提及“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逐步成为统一战线的重要追求”观点^④,有的文献在侨务工作意

作者简介: 林华山,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执行主编、副编审,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与实践。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② 肖存良:《统一战线与中华儿女大团结》,《人民政协报》2021年8月4日,第8版。

③ 周述杰:《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统一战线》,《团结报》2021年9月7日,第8版。

④ 周虎:《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国家方案:新型举国体制的演进、价值和优化》,《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52—62页。

义上论及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①。笔者认为,统一战线与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关系具有两重含义。其一,在手段意义上,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法宝。其二,在价值意义上,中华儿女大团结体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效应与话语创新。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致力于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中华儿女大团结实现彻底的大团结大联合,也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本文立足“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中华民族”三维结构,梳理统一战线与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内在关系,分析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一、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践行了无产阶级运动“为了大多数”“依靠大多数”“团结大多数”的一贯追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深刻逻辑,蕴藏于“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中华民族”三维结构中。

(一) 服务建设整合人民的核心政党

近代,中国民众“一盘散沙”局面呼唤诞生核心政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封建王朝无力再维系大一统格局,政治共同体面临解体危机。孙中山先生一度慨叹:“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为走出这种危机,辛亥革命应运而生,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资产阶级政权办政党、开议会,试图把中国社会重新团结起来。然而,资产阶级政权及其主要政党无力整合人民,恶性党争、军阀混战、列强干预等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分裂。破解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局面,亟须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现代政党承担起整合人民的使命。这种政党需要扎根社会,能够把人民广泛组织起来。于是,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

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筑牢核心政党之基。中国共产党秉持唯物史观,通过建立统一战线不断植入社会。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农民阶级,建立工农联盟,促使占中国社会主体部分的阶级阶层进行联合行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华侨华人等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大联合。解放战争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服务建立新中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中华儿女大团结踏上新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爱国统一战线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中华儿女大团结进入崭新阶段。新征程上,统一战线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中华儿女大团结奏响恢宏华章。

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不仅推动、化解了近代中国社会解体的危机,把人民组织起来,而且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and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先进理论与实践的驱动下,中华儿女大团结已经成为富含统一战线贡献的“政党行动”。

(二) 服务建设多样一体的现代国家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需要实现多样与一体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成为核心政党的过程,也是中国

① 吴桂韩:《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57—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现代国家建立巩固和发展完善的过程。根据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走的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道路。这种现代国家建构道路，必须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辛亥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政党采取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及其配套制度，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不能有效吸纳巨型国家的广泛多样性，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多政党、多民族、多宗教、多阶层和多地区、多习俗以及多种发展程度等广泛多样性，加大了团结全体人民的难度。建立多样一体的现代国家，再造能够吸纳广泛多样性的政治共同体，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统一战线为中国现代国家注入多样一体基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提出自己的国家建设主张，并进行持续的探索和发展。^① 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注重融入统一战线的理念、制度和方式。从建国理念来看，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通过统一战线范围的拓展把广泛的人民群众纳入国家政治生活。历经“工农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主张的发展以及相应政权建设实践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得以确立。这是统一战线从政治联盟上升为国家形态的制度成果。当前，人民的范畴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四者联盟”交叉重合，人民国家的政治基础更加牢固。就立国制度而言，我国实施与国体相匹配的政体，确立新型国家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实现了对国家内部多样性的制度化整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使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制度基础更加坚实。

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方案和实践，贯彻中华儿女大团结理念，把人民组织起来以整合广泛多样性，建设多样一体的现代国家。统一战线内嵌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立与建设全程，为国家注入了团结基因。中华儿女大团结获得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保障，成为富含统一战线基因的“国家现象”。

（三）服务建设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

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情形激发了民众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是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曾长期处于自在状态，在近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进入自觉状态。在抵御外侮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中国民众民族意识的增强与政党建设现代国家，是一体两面的过程。历经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并界分其内涵、辛亥革命推动中国走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道路，中华民族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共同体。

统一战线团结各民族为一家夯实了中华民族之体。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吸收与转化梁启超和辛亥革命等关于中华民族认识的合理部分，在各项活动中加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李大钊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大家庭，是国内各民族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分析了民众大联合的可能性及必要性。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② 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中华民族观。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其后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论断，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至此，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共同体基础更加牢固。

统一战线团结各族人民为一体的过程，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① 李应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新型国家制度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演进》，《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34—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2页。

的过程。统一战线在各个时期推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尽管所服务的中心任务和目标不同,但均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百年奋斗主题,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中华儿女大团结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愿景驱动,成为富含统一战线特征的“民族风貌”。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核心政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国家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中华儿女大团结奋进愿景。在服务建设整合人民的核心政党、多样一体的现代国家、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的进程中,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法宝。

二、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历史经验

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过程中形成了诸多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契合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反映了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中华民族”三维结构中的基本定位及内在规律。

(一) 根本原则: 构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心圆政治格局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百年来统一战线的一条根本经验。^①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本质上是最广泛政治联盟促进人民各部分的大团结大联合,同样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把广泛力量凝聚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心圆政治格局。同心圆政治格局生成众星拱月的政治局面,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政治权威,贯彻国家治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营造有序高效稳定团结的政治氛围,从政治上层建筑角度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统一战线作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四者联盟”的最大同心圆,正是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生动写照。回顾百年历史,统一战线越是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越是能够得到巩固和壮大,越是能够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因此,越是在充满多样性的时代,越要发挥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作用,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难以形成和维护中华儿女大团结;没有中华儿女大团结,难以确立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统一战线,难以维系和深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纽带。统一战线构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心圆政治格局,使中华儿女大团结具备更大的向心力。

(二) 行动遵循: 服务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目标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目标服务。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旨在把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在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团结广大人民赢取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站起来”的目标服务。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中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统一战线团结广大成员参与“三大改造”,为我国社会性质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变革服务,使中华儿女大团结获得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制度的稳固支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从阶级联盟转变为政治联盟,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最大限度凝聚各种政治社会力量,为“富起来”的目标服务,使中华儿女大团结获得更加深厚的现实基础。新时代,统一战线直接为“强起来”的目标服务,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大公约数凝聚磅礴力量,使中华儿女大团结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统一战线调动各方力量一致行动,使中华儿女大团结具备更大的行动力。

(三) 基本格局: 协同两个范围联盟及命运共同体

统一战线践行大团结大联合主题,以推动人民结成紧密共同体为基本形式。统一战线促进中

^① 张献生:《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统一战线百年历史的根本经验》,《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5页。

华儿女大团结，本质上是最广泛统一战线的形式把中华儿女组织起来。统一战线的运转发生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整体变迁中，在大陆范围内和大陆范围外两个格局中构筑联盟形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及其对中华儿女的团结，回应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直接反击了外部势力分裂和遏制中国的企图。随着国际因素影响的增加，统一战线各项活动日益具有外部特征，中国共产党也日益以世界眼光巩固壮大统一战线、团结中华儿女。以历史阶段划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不断推动中国人民以组织起来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断推动中国以坚不可摧的团结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以国际、国内划分，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增强了中华儿女团结抗战的力量。以大陆范围内、大陆范围外划分，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在大陆内外两个范围中开展，广泛地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起来。统一战线的两个格局协同，既把中华儿女吸纳进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夯实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内部基础；也实现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衔接，作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世界贡献。在中国内部维持团结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巨大贡献，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内部维持团结、世界人民大团结提供了中国方案。统一战线坚持两个格局协同、两个命运共同体互动，使中华儿女大团结具备更大的影响力。

（四）科学方法：坚持精神与利益、政策和制度相结合

统一战线工作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坚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等原则，注重运用精神与利益、政策和制度相结合方法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同样需要系统施策。就柔性方法而言，中国共产党注重通过统一战线传递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价值追求，综合运用政治引领、宣传舆论、文化艺术等方式，不断铸牢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共有精神家园。就利益激励方法而言，中国共产党注重照顾同盟者利益，调动统一战线成员的积极性。比如，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政策调整建立与巩固工农联盟，调动地主阶级参与抗日战争的积极性；通过工商政策调整动员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就制度方法而言，中国共产党确立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把这一原则贯穿于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全过程，以制度方式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①，是以中华儿女大团结为取向的国家建构和制度建设的成果。统一战线相关制度保障使我国社会主要关系处于和谐状态，避免出现西方国家的政治极化、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化。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围绕圆心大团结”还是“各自为政大撕裂”，“集中力量办大事”还是“自扫门前雪难成事”，已经成为“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巨大分野。统一战线因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而效能显著，使中华儿女大团结具备更大的凝聚力。

（五）前进方向：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奋斗主题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同样始终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奋斗主题。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长远目标和前进方向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历经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态演进。各形态统一战线的具体目标虽然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建立的各形态统一战线都属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奋斗主题，锚定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

^① 林华山、罗振建：《统一战线制度：一项立国治国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安排》，《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4—24页。

^② 林华山：《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发展图景——从“爱国统一战线”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19—26页。

女大团结的前进方向。统一战线高举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全体中华儿女的最大价值公约数;两个范围联盟均共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是为了齐心协力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统一战线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愿景,使中华儿女大团结具备更大的感召力。

事实表明,统一战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务现代国家建设,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蕴藏着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巨大能量。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能力,铸牢现代国家的团结品格,锻造中国人民的团结精神,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团结基础,在新征程上定将大有作为。

三、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现实启示

新时代是中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须臾离不开中华儿女大团结。统一战线要汲取历史经验,把握历史方位,进一步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要胸怀“国之大者”,统筹“两个大局”,提高新时代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效能。

(一) 加强对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政治引领

要夯实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思想基础。对民主党派成员,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增强做中国共产党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意识。对各族人民群众,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中华民族一体格局。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增进他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要引导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引导台湾同胞增强反对“台独”意识,增强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等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

(二) 坚持与完善统一战线的各项制度

要强化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制度保障。在政治领域,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引导各界人士有序参与政治。在经济领域,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积极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发展、各类主体活力竞相迸发的营商环境。在文化领域,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社会领域,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

(三) 完善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法体系

要提高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工作质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同样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内容需要更加全面,既要关注具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也要关注政治参与权利、个人价值实现、个体精神满足等高层次需求。统一战线工作要坚持依政策开展与依规开展的有机统一,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遵循,健全统一战线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统一战线有关事务。

(四) 拓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覆盖领域

要丰富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空间维度。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统

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加娴熟地统筹“两个大局”、调处国际国内两类因素。面对统一战线成员多重身份特征日益突出的现状，要加强各行业各部分各系统间的工作协调。同时，统一战线工作要适应信息时代人群数字化集结的新情况，探索开展信息时代的“圈层统战工作”，无缝对接依托职业、兴趣、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形成的各类圈层，精准开展团结联合工作。

（五）治理统一战线领域输入性风险

要优化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外部环境。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制中国发展目的，频频向我国统一战线领域输入风险，企图破坏中华儿女大团结。^①要坚持系统施策、重点治理，防范和化解统一战线领域输入性风险。防范海外中国企业家、留学生、华侨华人等群体人身财产安全风险，保护统一战线有关成员的权益。防范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技术泛安全化等风险，保护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安全，维护赴海外经营平台型企业的数据安全。加强反制工作，用好反制裁、反干涉的法律、经济、政策、外交等工具。加强公共外交，对非国家行为体做好沟通解释工作，降低其污名化我国统一战线的意愿。针对美西方国家对我国统一战线的污名化，我国要提高涉统一战线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和质量。

（六）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要健全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工作体制。统一战线工作涉及部门多、领域广，需要深入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要协同组织、宣传、统战、网信等党的部门，外交、教育、公安、民政等政府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等人民团体，既加强统筹协调、协同配合，又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和作用。发挥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的重要抓手作用，完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各项制度和机制，切实发挥其统筹协调作用。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能力素质，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守正创新。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最大限度发挥统一战线的团结效能。

纵观古今，能否实现团结、保持团结和增进团结，是任何政治共同体都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历史上，中国大一统取向和格局经久传承，积淀了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文明基因。近代以来，中华儿女大团结一度受到冲击，处于暂时被遮蔽状态。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接续努力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华儿女大团结获得主心骨和向心力。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华儿女大团结再次展现勃勃生机。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统一战线促使中华儿女大团结不断闪耀着法宝光辉。新时代，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需求迫切、地位重要、任务重大，将继续显现出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战略价值。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林华山、龚静阳：《大安全与大统战：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74—92页。

百年统战历程 生动云南实践

——“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在云南的实践与探索” 理论研讨会综述

马弋涵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2021年6月28日, 由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主办、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承办的“百年统战历程 生动云南实践——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在云南的实践与探索”理论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本次研讨会作为云南统一战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紧紧围绕“百年统战历程 生动云南实践”这一主题, 研究、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近百年来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 总结云南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 并聚焦新时代统一战线各领域的重点、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为助推云南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关键词: 统一战线; 建党100周年; 云南实践; 理论研讨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3-0012-06

2021年6月28日,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由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主办、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承办的“百年统战历程 生动云南实践——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在云南的实践与探索”理论研讨会在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蔡勇, 云南省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吴昀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何云葵主持开幕式并作会议总结。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友康、杨春禄以及来自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复旦大学、云南省委统战部、省社科院, 以及云南各民主党派省委、有关人民团体、省内各高等院校、各州市社会主义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专家、获奖论文作者代表和党外中青班学员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部主任王树臣教授作主旨报告, 农工党云南省委张宽寿主委,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教授,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萧霁虹研究员等, 来自省内外的十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统一战线百年历程、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民族宗教等问题作了交流发言。本次理论研讨会共征集到论文70余篇, 经过严格筛选、评阅, 推选出24篇优秀论文并进行相应表彰。现就会议学术发言和论文提交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作者简介: 马弋涵,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主要从事统战理论、法学理论研究。

一、汲取百年统战历程中的智慧力量，不断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回顾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会议认为，近百年来，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到爱国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法宝作用，成为党史上的光辉篇章。学院党组书记蔡勇在致辞中指出：“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统一战线因党而生、伴党而行、随党而兴。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要把统一战线历史经验学习好、总结好、传承好、发扬好。”关于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和法宝作用，王树臣教授以《征途漫漫 团结奋斗——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百年辉煌史》为题作主旨报告，他以中共中央对中共党史划分的四个阶段为脉络线索，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法宝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总结、概括了科学把握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方法，详细阐述了新时代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具体体现，并就如何准确认识和充分发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作了深刻解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统一战线工作看，只有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才能弄明白未来我们应该怎样继续成功地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从而在新征程上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会议对此形成以下共识。

一要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融会贯通，学深悟透，讲清楚。中共党史与统一战线理论、统一战线史的内容相互贯通，观点相互印证。蔡勇强调：“研究统一战线历史，要做到以史为证、以史为例，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统一战线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实事求是看待统一战线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努力消除认识误区、思想盲区，向全省广大统一战线成员讲清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讲清楚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合法性，从而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二要坚定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才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统一战线工作才有前进方向和坚强保障。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王树臣教授在主旨报告中强调，“历史、实践、理论都证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经验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用好统一战线法宝、做好统战工作，必须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云南大学王新红教授在《建党百年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经验》发言中也指出：“加强和完善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统一战线工作整体上得以不断完善发展、联盟基础不断扩大和巩固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党总结近百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最终结论。新时代下，指导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经验仍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今后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不仅要矢志不渝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还要通过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等方面来体现和巩固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核心作用。”昆明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李达在《准确理解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历程、特征与方向》一文中进一步说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领导，需要以正确的方向带领人、凝聚人和吸引人。具体来讲，要正确提出大政方针和立法建议，发挥爱国统一战线的职能作用；要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党员干部选拔和推荐到各级国家机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要充分发挥各级国家机关中的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做好党外代

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维护好与党外人士在各级国家机关中的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保证他们对分管的工作享有相应的权利；要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战略高度重视和抓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政权工作。”

三要努力发挥好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习近平同志强调，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关于如何理解统一战线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朱小宝在《建党百年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略》一文中认为：“建党百年，是统一战线不断发展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向前推进的一百年。统一战线通过民众的大联合、工农的大组织、民众的大觉醒、制度的大奠基、民族的大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保驾护航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当前，统一战线的发展与我国历史方位的变化同步，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更加需要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对此，昆明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李达在《准确理解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历程、特征与方向》一文中指出：“新时代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基本特征，体现在联盟基础持续巩固、政治地位日益突出、范围渐进走向开放、重点领域不断凸显等四个主要方面。鉴于此，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需要用新思想统领统一战线工作全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嵌入到中国改革的全部过程，放在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全域空间中来研判和分析，从而发挥好统一战线在党和国家事业建设中的法宝作用、提高统一战线队伍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以及完善党对统一战线政权的全面领导。”

二、准确把握云南统战工作的使命责任和科学方法，奋力谱写新时代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统战新篇章

会议认为，云南是一个民主党派组织齐全、民族宗教工作任务繁重、侨务资源丰富、与港澳台联系紧密的边疆省份，统战工作在全省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云南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和新时代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会专家们通过回顾统一战线在云岭大地上的生动实践，总结出一系列云南成功的统战经验，一致认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云南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把统一战线重要法宝地位在思想上确立起来、在实践中运用起来，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持。

一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王寅平教授在题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云南统战工作实践和经验》的发言中表明：“云南统战工作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切实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云南统战工作以政治引领、思想引导、求同存异、联谊交友、协商交流、照顾同盟者利益、发挥党外代表人士‘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作用等工作方式，促进各方面关系和谐，进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要不断深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农工党云南省委理论研究室李续亮主任在《试论近代以来政党政治的中国道路》一文中指出：“新型政党制度符合中国实际，能够实现最广大人民和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团结起来为共同目标而奋斗，能够通过制度化安排集中各方意见推动科学民主决策，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只代表部分群体利益、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社会撕裂的弊端，是真正行得通、很管用的中国式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治理和人类政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在此基础上，农工党云南省委张宽寿主委结合实践作了全面生动的主题发言，他

围绕农工党中央对口云南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既督又帮，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典型事例，论证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体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属性与优势的独特政治监督形式。他指出：“我国8个民主党派中央对口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充分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特优势，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成功范例。在多党合作制度框架下，应积极推广民主党派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形成的成功经验，不断增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在国家监督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建议，“应从国家层面加强民主监督顶层设计，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总体部署，结合各民主党派特色优势，继续安排各民主党派对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切实发挥好、巩固好这一经实践检验的独特制度安排。”

三要努力推动民族宗教工作再上新台阶。建党百年，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云南始终坚持把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突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取得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和社会稳定的明显成效，被誉为民族宗教工作的“云南现象”。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教授在作题为《统战工作中的民族宗教》的发言中指出：“由于云南民族宗教统战工作贡献卓著，无论是新中国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新时代云南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不断变化的历史、经济与社会条件下，云南社会持续保持了动态的均衡，成为有序发展的典范。”

关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云南经验，西双版纳州社会主义学院张志远教授在作题为《中国共产党100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云南经验》的发言中总结道：“云南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立足于党成立后在云南开展的一系列民族工作，而且还立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多民族省情，民族关系复杂，民族之间敌对、隔离的实际，抓住中央的政策机遇，通过超越族际新型民族关系、超越族际共有文化、超越族际政治参与和超越族际共同富裕目标的建构，通过‘以心换心’、民族仪式、共建共治共享、桥梁和纽带等政策举措，建成了各民族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不仅形成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而且也加快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关于推进宗教中国化的云南实践，云南省民族宗教委卢锦平在《宗教中国化的云南实践》一文中作了总结，他认为：“云南准确把握宗教中国化的意义和内涵，贯彻落实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工作要求，将宗教工作放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三个定位’、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局中来思考和谋划。通过加强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教育引导，注重发挥宗教界在推进宗教中国化方面的主体作用，依法治理宗教领域‘逆中国化’‘去中国化’突出问题，引导各宗教在宗教建筑、宗教礼仪、宗教活动等方面进行宗教中国化实践，支持宗教界加强自身建设，融入时代发展主流等主要做法，推动云南宗教在政治上自觉认同、在文化上自觉融合、在社会上自觉适应，与社会发展同步、与时代进步同频，成为社会建设的和谐因素和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普洱市社会主义学院教师关哲在《云南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实践与启示研究——以普洱市为例》一文中指出：“普洱市在宗教工作中因势利导，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圆心固守底线，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爱国爱教人才、开展法制宣传、举办文化活动、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等工作中延长半径，达到一致性与多样性协调统一，结成正向共识，以此来推进宗教中国化，形成宗教中国化工作的普洱经验。”就宗教工作如何在云南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萧霁虹研究员在题为《引导宗教发挥民心相通的积极作用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发言中指出：“一是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二是持续引导宗教界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并融入讲经讲道中，引导信教群众正信正行。三是积极支持宗教内开展交流对话，发挥宗教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

的软实力作用,筑牢‘民心相通’的基础,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四要立足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桥梁纽带作用。放眼当前国际形势和云南周边外交态势,复旦大学张家栋教授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中缅关系》发言中说道:“在中美战略博弈上升的情况下,缅甸在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再度上升。缅甸国内政治生态,又使得传统的主权国家间外交形态难以有效地、可持续地发挥作用。这些都给地方外事和相关工作提供了机会。云南省要发挥自己的地理、人文和经贸优势,一方面服务于国家的对缅政策目标,另一方面也服务于云南省的自身发展需求。”会议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施后,云南凭借地缘优势和开放战略,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华人华侨在开拓海外新兴市场、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经济结构升级转型、帮助企业“走出去”、塑造中国形象、传播中国的语言文化、促进友好交流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们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推动力量和重要资源。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华文学院副教授夏玉清等在《试论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云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角色和作用》一文中继续指出:“云南要大力发扬华人华侨爱国爱乡的优秀品质,加快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建设,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加强与华人华侨的联系与交流,发展华文教育事业,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新一代华人华侨,实现华人华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华人华侨联系广泛、沟通海外的优势,为促进云南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三、深化统战理论研究,实现新时代统战工作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统一战线理应顺应历史潮流,做到在理论与实践上与时俱进。省委统战部吴昫三巡视员在开幕式讲话中,就如何推进统战理论研究提出了“三个坚持”的具体要求:

一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确保统战理论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新时代统战理论研究的行动指南。善于从政治高度观察、分析、研究问题,对统战领域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充分阐释、讲清讲透,努力消除认识误区、思想盲区。善于运用学术力量,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进一步夯实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二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深刻回答好“新时代统战之问”。当前统战理论研究要积极贴近决策、服务决策、促进决策,深入研究统一战线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认真总结统战工作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推出更多对统战工作实践有指导意义、对党和政府决策有参考价值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

三要坚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推动统战理论研究不断开拓创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善于从火热的实践中汲取丰厚的思想养分,善于在总结鲜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规律性认识,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推进统战理论创新。统战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要善于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开拓新的研究天地;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借助历史的“慧眼”,看清楚未来前行的道路;要统筹协调党内与党外、统战系统内与统战系统外、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等各方面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统战理论研究队伍。

在会议总结中,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何云葵指出:“我们开展统战工作和统战理论研究,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趋势,从百年统战历程的伟大实践、辉煌成就和光荣传统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要深刻理解百年统战历程背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要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理论原典，深入梳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深入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战理论的文明根性，从而推动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在统一战线领域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四、秉持情怀视野，为构建统战话语体系提供学术助力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会议认为，由于中西方历史不同、文化相异、政道分殊，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最重要的是增强“四个自信”，坚持中国情怀，扩展国际视野，用发展的理论指导发展的实践，用中国话语解释中国实践，破除西方话语霸权。就统战领域而言，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罗雷在《系统观念视角下建党百年统战话语新特色探析》一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系统观念’与统一战线思想具有高度的理论同构性和话语契合性，必将成为统一战线新的话语特色和优势。在喜迎建党100周年之际，更要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契机，牢牢把握‘系统观念’这一统战话语新特色，推动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建设更加科学完善，打造强有力的统战话语体系，获得优势话语权。”辽阳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崔晓彤在《统一战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构建：优势、制约、路径》一文中指出：“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华文化的具体承载形式和内容呈现形式，其实践拓展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构建越发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统一战线具有的独特优势内涵着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以及实践逻辑，不仅深深扎根并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历程，而且已经成为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活力和比较优势的重要载体和实践依托。正是统一战线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构建之间存在的高度联系，要求持续推动统一战线独特优势转化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构建的内在动力和效能引擎，积极延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影响领域和拓展空间，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不可替代的理论助推力。”

责任编辑：李亚强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的三个维度

陈昌荣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科社教研部, 四川 成都 610071)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科学理解这一制度体系需要坚持三个维度: 在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维度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要求, 在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维度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张力生成, 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维度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治理体系; 三个维度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3-0018-0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①新时代新阶段,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顺利推进, 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保障。只有深刻理解了 this 关系, 才能深度认同并形成行动的自觉。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是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本文从三个维度对如何科学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征作简要分析。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要求

国家治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 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话题。现代国家治理更重视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国家治理既要见物也要见人, 既要讲制度也要讲精神, 既要尊法律也要尊价值, 既要有制度自信也要有价值自信。”^②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贯穿其中的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 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也只能是在遵循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国家治理。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 体现的是时代发展要求和现代治理理念, 必然体现出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基本特点。

作者简介: 陈昌荣, 四川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主要研究政治与社会治理。

^①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19年, 第2页。

^② 舒刚:《国家治理与价值体系》,《瞭望》新闻周刊, 2014年3月4日。

这是整体把握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深切关注的重要维度。

(一) 科学性与人性相统一：体现治理目标的价值生成

任何有效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都离不开一套具有鲜明价值导向的基本制度和治理体系。国家治理是一个需要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征和回答时代之间的根本性问题。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执政理念和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既要体现当代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要求，也要高度关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必须内化并彰显科学性与人性相统一，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目标的价值生成。

一方面，科学性是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根本要求和显著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征。政党政治是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政党本身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总是代表一定群体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从根本上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体现的是利益的全面性和广泛性，集中体现作为执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的科学性。在这样的政党领导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体现出治理理念、模式和方法的科学性。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可能脱离时代对科学精神的坚守和追求，尤其是现代国家治理内在要求的科学性原则和科学价值追求，必然要求各方面全过程体现追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这不仅是原则，是方法，是手段，更是一种制度精神。

另一方面，人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要求和外显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人本问题上从来都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生动的社会实践，以广大人民为本，赋予人本思想以最真实、具体的主体。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就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的精辟论断，提供了把握人的本质的根本方法。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最终就是围绕如何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构建和完善制度体系，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样的过程立足“治理”二字，必须坚守人本原则。因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本原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治理才有清晰的目标对象、依靠力量和动力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开幕会上指出的那样：“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②因此，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通过坚持人本原则，明确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这样的治理才可能持续，这样的治理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国家治理也好，社会治理也罢，都必须始终清楚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治理国家，根本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在战争年代如此，在和平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如此。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让人民不断得到实惠，真正具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题人，中国共产党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论是坚持和巩固什么，还是完善和发展什么，都旨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理顺各种制度机制，建立健全各种保障人民群众权益的制度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③ 转引自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第1版。

制,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事,谋实利,真正使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最终落实到“人民”受益这个根本性原则上,使人民至上的思想和原则走深做实,彰显出鲜明的人本价值取向。

(二) 科学价值与政治价值相统一: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本质

政治性(阶级性)是政党的鲜明特性,任何政党都有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性与阶级性是内在统一的。政治性(阶级性)只有融入国家治理中,才能将政治理念、政治价值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治理价值。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更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因此,中国共产党这种先锋队性质不仅仅体现在对现代治理科学性的方向把握和价值引领上,更要体现在政治价值取向的先进性上。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无论进行革命也好,还是取得领导地位成为执政党进行长期执政也罢,都必须始终把握时代发展和政党政治的科学性要求,同时始终聚焦于政治价值的彰显,最终落脚在牢牢把握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作为一个整体明确了紧跟时代发展要求,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而且随时随地亮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原则,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质上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性与政治价值取向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根本上就是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原则,建设好国家,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也好,巩固政权也好,建设国家也罢,引领社会发展方向也好,治理社会也罢,既要关注时代命题,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体现科学性,也要始终全面彻底地兑现对人民的承诺,真正做到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在这样的基础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就有了方向,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和科学的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始终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确保自己始终成为一个体现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政党,也始终赢得人民的支持,永葆青春活力,永葆先进性、纯洁性。这样的党根本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她植根于中国社会,植根于人民,有能力、有信心、有决心带领人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始终彰显先进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仍然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为指导,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建设和完善一整套推动国家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的制度体系,构建推动社会和谐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实施有效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张力生成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②国家治理的根本性问题是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征和回答时代之问。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要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所要面对的历史任务的实际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和路径。

(一) 历史性与现实性统一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和各方面

历史性与现实性是内在紧密关联的。从历史纵向发展进程上看,国家治理大体能够体现出继承与发展,批判与建构的发展进程。当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2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①。放眼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围绕国家和社会治理这个重大问题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不可谓不多。成功的经验往往成为后继者的宝贵财富，而失败者的教训也往往成为后继者不重蹈覆辙的反面教材。因此，在历史发展视野中，只要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历史发展方向和进程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都必然有其重要的价值意义。

当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源泉有三个突出的方面：一是在中国历史上，开明盛世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经验。在历史层面，我们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制度客观上受到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影响。比如儒家治理思想中的为政以德、仁政、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以及大一统的制度设计和权力分配。这些历史实践形成的政治主张和文化价值，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是当代中国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精神财富。二是我们的治理理念、模式、制度结构受到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践探索尤其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和运动，也是一种制度建构进程，虽然这种进程可能是短暂的，但是也有重大借鉴价值，比如巴黎公社的社会管理经验和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虽然在过去的历史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机制建设遇到不少挫折甚至失败，但是一些成功的做法尤其是制度设计对中国的启示作用是实实在在的。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也有不少成功的做法，当然也有失误，但成功的做法带来的启示十分明显，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针对性地局部探索执政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探索“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的经验，等等。

历史与现实的对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必须注重的基本逻辑和思维方法，也是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样、往何处去的重要条件。只有对接历史和现实，才能承继已有宝贵经验，应对现实变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定推进。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须继承我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以后探索国家建构和管理过程中的宝贵经验，这有助于创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着眼于现实要求，置身于新时代新阶段新要求的客观进程中，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总体进程中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从而坚持和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实现治理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这既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创新过程，也是彰显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有效治理国家的重要法宝。

（二）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须紧跟时代发展要求和体现现代性

时代就是历史的展开。在横向上看，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国家治理必定立足于现实提供的条件和时代使命。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中国梦的使命，必须更加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民的现实要求，实现更加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和治理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任务。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治理需要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征和回答时代之问。立足现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实施科学有效治理，创造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开明盛世，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时代价值。

同时，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国家和民族交往的扩大，不同民族之间在国家和社会治理方面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因而我们更加需要关注时代发展大势所构成的现实大背景和大时代。这样的国家治理对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换句话说，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既要置于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审视，也要置于整体推进整个

^① 转引自罗祎楠：《中国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学理探索——以宋元明历史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23页。

人类社会的现实性中去审视。当今时代，全球化使国家间的治理有了更多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必要和可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国家治理方面也需要取长补短。在当今时代的现实大视野上看，中国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对国外先进的治理经验的学习和借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关注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体现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和制度治理的理念，体现政府的有效治理，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明确目标，加强顶层设计，突出法治建设，推进政治改革，夯实社会基础。在广泛意义上看，一切体现现实性和现代性特征的有效治理模式和治理经验都应为我们所吸收，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再创造，才能更好地形成体现中国特色的治理经验和治理模式。

总而言之，把握一个国家的治理效能与时代影响，既要放到纵向历史发展进程所构成的大时代中去审视，也要放到横向上一定时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视野中去看待。各国的国家治理都具有历史的特定性和时代性，正是这种基于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显著特征和观察维度，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得以延续。

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特征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体现的维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保理论的科学性、解释力和生命力，体现“坚持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同时，理论必须观照实践，反映实践变革的要求，回应和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过程。

（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念、模式和方法的显著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治理思想主要是在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病，以及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其认为巴黎公社实施的治理是新型的国家治理，内含着巴黎公社（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是公有化的经济治理、民主化的政治治理、彰显平等正义的教育文化及社会治理等，而且这种治理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理念、模式和方法，主要体现在：主体上强调人民和政党的统一；方式上强调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原则上坚持自由、平等、民主和效率的统一；效能上突出管理职能和经济社会职能的统一。^②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设想立足于这样几个基本条件：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并建立起政权；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不仅获得了广泛的权利而且具备实现自身权利的各种条件；三是以往历史包括资本主义留下来的自由、平等、民主、效率等观念得到批判性继承和改造，被赋予了社会主义的内容；四是国家的内外职能较以往的国家职能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对内的经济社会职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职能，通过军事等手段御敌等对外职能相对不是那么突出。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展望或者预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各方面的条件、要求和表现，除了在巴黎公社得以部分检测外，绝大多数内容是一种科学的设想。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等问题的分析并不是针对俄罗斯、中国等东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具体情况。加之受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进行全面深刻的论述并提出完全切合实际的指导，因而他们提供的是出发点、方法和思路。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苏联）的诞生无疑使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国家理论有了检验的基

^① 许耀桐：《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学习〈法兰西内战〉的认识》，《党政研究》2019年第5期，第5页。

^② 陈志刚：《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发展——从马克思到习近平》，《人民论坛》2019年第12期，第102—103页。

基础和条件。在国家治理方面，列宁结合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他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和权威相统一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在职能方面，列宁在1917年8、9月间写作的《国家与革命》小册子中强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①遗憾的是，列宁英年早逝留下的关于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的初步探讨并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下来。但是，列宁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经验启示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国家治理必须突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既探索出一条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立场、基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发展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进程中，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推进和发展完全延续了这种完整进程和典型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念本身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大视野上，着眼于人类社会实践进程，以科学理论指引实践，以实践促进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完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和凸显这样的要求和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经验，立足新时代国际国内的新挑战，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思想和中国新时代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国家治理的新理念新战略新要求^②。上述理论无论在理念、模式还是方法上，都集中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点。这是继承、创新的结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和实践进程的加速度推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促进了二者的相互促进、同向发展，也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极大的生命力，形成了显著优势。

（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信息的传递、知识的传播更加迅速，文明的交流互鉴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绕不过、避不开的客观事实。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并使这种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凸显出现代化的特征和要求，就必须紧跟时代脉搏，紧跟世界各国治理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先进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同时，时代的深刻变革和各国各地区治理实践的独特发展，又要求理论必须紧扣这些生动的实践，并且有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才能更好地将现代化治理的理念、模式和方法融入治理过程中，使其在治理过程中得到检验、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世界性的联系的普遍加强，给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实现治理理论的传播和治理实践的密切交流、取长补短提供了重要机遇和条件，而这种取长补短、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和创新又有力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是现代化的要求，而现代化本身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过程，这就必然使国家和社会治理更加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从而赋予其内在的生机活力，实现治理实践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透析当今世界种种乱象，治理赤字是症结所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具有走向美好未来的制胜法宝，因为这一科学理论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智慧与中国思维，它对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难题的成功破解，不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意义，而且具有深邃的时代价值、世界意义。^③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② 陈志刚：《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发展——从马克思到习近平》，《人民论坛》2019年第12期，第103页。

^③ 李捷：《世界性三大治理难题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华日报》2017年9月6日，第15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内在逻辑与功能意义

李娟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展现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的基本特点, 呈现出的是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间统一的运演逻辑。这一政治权力模式有效地消除了“权力过分集中”和“权力过分分散”带来的诸多弊端,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提供了结构性权力支撑。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高度来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在解决稳定政权、协商民主、腐败治理、消减贫困等问题方面展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一系列的优势和实践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权力关系模式; 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3-0024-1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生发展的实践产物, 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它是在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有独特创造性的政治权力关系模式, 发挥着调节中国政治关系、构建中国政治秩序、促进中国进步和发展的政治功能。分析和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的基本特点、运演逻辑、功能作用以及世界借鉴意义, 可以让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治理经验和智慧,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特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的政治经济场域中, 政治权力突显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实践特色。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力量, 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的本质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独立执政这一政治前提下, 纵向观之, 政治权力统一集中于党中央; 横向观之, 政治权力之间构成了各司其职的分工、配合与协作关系。

(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领导和最高权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领导和最高权威, 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的本质内涵。邓小平同志曾强调,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 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力量统一起来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践模式”(2018A08)。

作者简介: 李娟,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法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② 这一系列重大政治理论鲜明而自信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权力中所扮演的具有的决定性和唯一性的执政主体角色。

1. “决定性”执政主体角色表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属性，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领导和最高权威。从政治权力的现实运作来看，中国共产党既具有将党的意志贯穿到政治权力重构、组织、运行全过程的绝对权力，又具有将反映着党的意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执行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各方面的当然权威，更具有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方向以及核心价值理念的完全支配力。

2. “唯一性”执政主体角色表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属性，即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力量地位是不可替代以及不能替代的，具有历史必然性。从政治权力的历史生成来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力量地位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活动的规律性表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生成于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一系列成功的实践活动中，来源于党的自我革命、人民的认同以及宪法的赋予。与西方国家建构的逻辑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依靠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来完成的”^③。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70年的建设与改革实践历程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集国家发展战略规划者、人民幸福领导者、民族复兴担当者、社会文化引领者为一体的民族国家向心力量”，它“通过整合党内外一切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以及社会力量为中国改革给予了主体性保障和集体力支撑”。^④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力量地位是中国共产党100年党的建设实践活动的过程性逻辑表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都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和反省性，它在70余年的执政实践中既历练出了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社会团体、个体组织所无法超越的“集中力量干大事”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能力和权威能力，又锤炼出了国外其他国家“票选制”或者“威权制”执政党所无法比拟的敢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政治品格和执政理念。

3. 倘若离开中国共产党这一最高政治力量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人们不仅会犯政治常识性错误，无法认清楚中国政治权力的本质特征以及中国政治权力支配下的一切政治经济实践活动的终极意义，而且还会陷入主观主义的妄加批判的泥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都会产生误读和误判。

（二）一切政治权力集中统一于党中央的领导，党中央是党内外一切政治权力的轴心和首脑

一切政治权力集中统一于党中央的领导，党中央是党内外一切政治权力的轴心和首脑，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的历史基因。党中央这一政治权力轴心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活动中起着“首脑”^⑤作用，它是顶层设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体。有学者将以党中央为核心的政治权力运作体制概括为“党中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342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③ 祝灵君：《党的领导与国家能力——兼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与经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5期，第32—40页。

④ 李娟、王宏波：《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式改革的经验与模式》，《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2—19页。

⑤ 刘少奇：《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26页。

央集体领导体制”，这一领导体制“首创于毛泽东时代，恢复重建于邓小平时代、巩固完善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发展创新于新时代”，“集体学习、集体调研、集体外事、集体自律、集体决策”是这一领导体制的特点与方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首要表现。^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②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中国政治权力，主要体现在党内和党外两个层面。

1. 党内层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切政治权力的轴心权威。党中央拥有管党治党的管理权、管军治军的军事权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顶层设计权。通过建构规范化、程序化的纪律机制和组织管理机制来确保党内各级党委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性；通过建立全面从严治军、建军、兴军以及强军的理论创新体系、军队管理体系、实战演习体系来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通过布局制度化、常态化的领导机制、决策机制和问责机制来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级党委的全面贯彻实施与执行。

2. 党外层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党外一切政治权力的轴心组织。党中央拥有厘定国家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和指导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权。通过顶层设计国家战略方针以及指导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与有效调配国家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监察权力，既要确保整个政治统治和经济社会管理的秩序稳定与和谐发展，又要引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发展观念以及价值文化。

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协调各方和总揽全局是确保中国政治权力的党性特征及其稳定性、创造性和持久力的决定性因素。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思想、组织、行动、信念方面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中国“大一统”传统优秀文化在中国当代政治权力架构的传承与延续，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程的历史性选择。

（三）政治权力之间彼此分工、相互配合与共同协作

政治权力之间彼此分工、相互配合与共同协作，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模式的过程机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机制下权力间的对抗、冲突、竞争关系不同，中国政治权力展现出来的是分工、配合与协作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协商民主两大制度路径的导引、规范下，中国的政治权力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和可通约性，逐渐形成了彼此分工、相互配合与共同协作的关系。

1.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得以实现分工、配合与协作的根本政治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③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过程中自我革命与自我完善的历史规律表征。历史证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领导人民集中力量加快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步伐、顺利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的政治权力能够实现分工、配合和协作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一调配、战略规划，既统筹安排不同政治权力系统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各自在遵守宪法、法律基础上应该承担的具体事务，又统领各个政治权力的党性特质和人民性价值旨归。一方面，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在服从党中央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的同时，都按

^① 胡鞍钢、杨竺松：《坚持完善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七大机制”与核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5—18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重要论述摘录》，2018年7月2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8/0702/c385474-30098624.html>，2021年5月20日。

照宪法、法律所赋予的职权、职能、职责各司其职、各行其权。各民主党派也要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和领导者地位，尤其是拥护党中央政治领导的前提下参政议政。另一方面，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党领导下的一切政治权力始终保持着党性和人民性，牢筑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使命，在新时代着力于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同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主要矛盾，最终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人民利益的实现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的政治权力得以实现分工、配合和协作的根本政治前提，也是中国的政治权力关系模式区别于西方三权分立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颇具决定性的政治因素。

2.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分工、配合与协作的实现方式。对于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而言，中国在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政治前提下，又面临着政治权力如何在“集中”与“民主”之间游刃有余、在“上通”与“下达”之间心手相应的重大难题。协商民主则是中国政治权力之间能够得以分工、配合与协作的有效实现方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借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科学决策所创造出来的独特、独有、独到的民主形式，它表征出来的是“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①的中国式民主逻辑。在这一民主逻辑和民主方式的内在规定下，中国的政治权力在横向层面和纵向层面都保持着良性的可通约性关联。横向层面，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监察机关之间及其内部各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以及民主沟通，借助信息共享、联合行文、合作执法等联动途径实现政治权力在“分职”基础上的配合与协作，以此解决关乎党的理想信念、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地方稳定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比如反腐倡廉、扶贫攻坚、惠民利民工程等。纵向层面，人民群众通过行使选举和监督权利、依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择公众参政议政途径来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以此实现政治权力与“社会最大公约数”之间的对接和通约，进而保证了政治权力运演的社会化和民主化。在协商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逻辑和民主方式的支配下，不同政治权力之间因良性互动与配合而构成的政治合力以及稳定的政治权力结构是政治权力保持凝聚性和统一性并一体化于党中央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有利于各种分散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以及经济力量的整合，而且有利于党中央顶层设计的路线、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以及实效性的发挥。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政治权力间的分工、配合与协作这一过程机制的作用下，中国的政治权力既实现了以党中央为核心向党内—党外—社会的有序而规范的扩散，又完成了分散而孤立的社会（党外）力量向党内—党中央核心组织的自觉而主动的聚合，最终成为保证社会主义中国一切政治权力能够统一服务于党治国理政和人民利益的最根本、最有效、最实用的政治权力模式。

二、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高度统一的运演逻辑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制度。在政党政治制度下，政党意志、国家意志、人民意志（社会意志）之间的平衡协调是执政党执政时期所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这是因为：其一，政党、国家、人民大众这是三个不同的、有着自身意志的主体。作为有着独特政治身份和政治信仰的党员集合体和组织体，政党有着合乎自身政治信仰、政治诉求和政治利益的政治意志。被马克思称为“虚拟共同体”的国家，虽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意志性，但是它往往表征的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利益。人民大众则由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种族的群体构成，人民大众的意志具有多样性和可调和性；借助公权力机构和公共价值观体系，人民大众的意志是可以调和的。其二，政党意志、国家意志、人民意志间平衡、有序、和谐的关系结构和整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92页。

个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平衡发展之间呈现的是正相关关系。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执政者及政治权力行使者如果不能及时回应日益分化的社会阶层利益,那么就有可能造成政党意志与人民意志间的对抗和冲突,这种对抗和冲突又会造成整个国家经济政治关系的失序,进而又不利于国家意志的实现;反之,如果政党意志、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处于一种和谐稳定的关系结构中,便会有利于政党利益、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共同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的关系模式折射出来的恰恰就是“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高度统一”的运演逻辑。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国、中国人民三者同呼吸、共命运,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党的意志、国家意志、人民意志高度统一则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国、中国人民三者能够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逻辑机理。在这一逻辑机理的内在规定下,中国共产党当然地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最高政治力量和一体化向心力量,其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的关系模式也得以出场且运行发展。

(一) 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高度统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出场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所一手缔造的,它表征出来的是“政党先于国家、国家依赖政党、政党与国家命运与共”的国家诞生进路。这一国家产生的特殊性历史进路意味着,从新中国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将自身的阶级权力向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转化的历史决定权和现实支配权。“政治权力就是阶级权力向国家领域的转化”。^①实现了自身阶级权力向国家各个领域的完全转化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新中国政治权力的唯一的、合法的、独立的支配者和控制者,党的意志必然会贯穿于新中国政治权力分配和运行的全过程与各方面。与此同时,从政治学意义上来看,“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②“国家是政治权力的统一体”。^③在党与国家间同命运、共进退的历史进路中,政治权力与国家权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政治层面和国家层面所表现出来的两种外在表现形式,两者在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作为中国政治权力的唯一支配者和控制者的中国共产党当然地成为了国家主权及国家意志的代表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在其出场的历史进路中就体现出了党的意志与国家意志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二) 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高度统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它的先进性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富有号召力和感召力的人民性、党性特质。“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④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没有同整个工农联盟相违背的特殊利益,“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私利和特权”^⑤。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这一党性特质决定了它所建立的政权必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它所代表的也必然是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且,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只有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才能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的根本力量”。^⑥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⑦

①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0页。

③ [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88页。

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7页。

⑦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7页。

所以，既然“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①那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了社会主义新政权之后，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新中国国家意志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力也必然承载着人民的意愿、寄托着人民的期待以及反映着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间的高度统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发生逻辑

这一权力发生逻辑具有历史性意义。首先，它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高政治力量的历史证成依据。中国共产党既具有将代表着人民意志的利益诉求和美好愿景转化为凝聚着党的意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当然权威，又具有将代表着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法律、制度、机制等的绝对权力。其次，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分工与协作的历史规律支撑。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间的高度统一是中国政治权力之间以党中央为核心得以“有序扩散”和“自觉聚合”的历史的形成的内在支配力。在这一内在支配力的规律性限定下，中国的政治权力才突显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的基本特点。最后，它是新中国建立70年来政治权力改革的发生学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下，政治权力“破”与“立”的结构性变革都必须遵循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高度统一这一基本规律，以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党性特质与人民性历史品格。

（四）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间的高度统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运行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逐渐发展完善成为由党委的领导权、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任免监督决定权、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权力以及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力所构成的结构体。结构是由一系列转化规律构成的转换体系，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特征”，而且要依靠内在的“一整套转换规律”来“保持自己的守恒或使自己本身得到充实”。^②“结构的组成部分受一整套内在规律的支配，这套规律决定着结构的性质和结构的各部分的性质”^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结构体折射出来的是“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间的高度统一”的内在规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权力支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生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政治革命、政治建设和政治改革各种实践活动中，它是扎根中国本国土壤、反映中国人民意愿、合乎中国历史规律的制度选择。“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④这一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之所以最可靠和最管用，就是在于它有效而充分地解决了大一统社会存在和社会文化状态下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所面临的两个重大现实问题：一是党领导下的统一性政治社会格局的现实巩固问题，二是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为解决这些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与政治保证。

（一）新时代中国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为统一性政治社会格局提供了政治权力支撑

纵观中国的传统国家历史和近代化历史，“大一统”始终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存在状态和社会文化状态。它萌芽于西周、形成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日渐成为一种中国独有的历史规律，不仅规定着中国政治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基本方向，而且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154页。

② [瑞士]让·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页。

③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86页。

形塑着“整齐划一”和“集中统一”式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在维持和巩固统一性社会存在状态和社会文化的各个要素的过程中，一体化向心力量是政治上的决定性力量，它是中国大一统社会享有最高权力和最高权威的主体性力量、符号化象征以及政治性要素。中国共产党成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体化向心力量，这源自于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分工与协作的政治权力关系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一体化向心力量借以集中统一调配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政治权力组织和分配方式。

1. 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社会权力的统一领导权，既确保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都能够紧紧围绕着中国共产党这一一体化向心力量以及党中央这一政治权力中轴线实现高度聚合以及合理整合，又建构了各党派间利益的趋同性以及彼此间的协商合作关系，成功地避免了政党竞争和轮流执政带来的欺骗愚弄民众、政党间相互倾轧、人亡政息的政治丑闻和弊端，进而为“大一统”政治社会格局的巩固提供了有效的最高政治力量保证。

2.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的政治权力在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一委”权力架构下既有分工，即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的权力职能分工，又有协作，即各权力部门在具体解决重拳反腐、脱贫攻坚、深化改革等重大现实问题中能够通力协作，从而确保了政治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站位和目标导向，实现了政治权力的高效、有序、良性分配与运行，避免了权力分立与制衡导向下的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既得化的政治顽疾，这又为统一性政治社会格局在新时代和新的历史方位上朝着现代化、民主化方向不断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支撑。

(二) 新时代中国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为全面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政治权威保证

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长远而重大的发展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①的人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而言，“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有助于力量的协调和资源的征用以支持现代化进程”，^②而且，“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的”。^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事业提供的不仅仅是能够有效“协调力量和征用资源”的政治权力支撑和保证，更重要是，它以合乎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的权力运行和分配机制为平台，为国家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更深层次和更高层次上的政治权威保障。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巩固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之于国家、人民乃至整个民族的政治权威，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在这一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下，作为最高政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集共产主义理想的践行者、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民族复兴的担当者、国家兴旺的领导者于一身。马克斯·韦伯曾说：“达成团结一致的习俗、个人利益、纯粹的情感或观念动机，对于一种既定的支配来说，并不能构成足够可靠的基础。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一个更深层次的要素——对正当性的信仰”。^④这里所谓的“对正当性的信仰”就是政治权威。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复合型角色和多重型功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9页。

②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8页。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53页。

④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319页。

能既是它能够超越国内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而获得最高政治权威的决定性因素，又是它能够统一调配一切资源来统筹兼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政治资本。

2.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权力在统一、分工、协作中始终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建设和发展。与西方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遵循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①的“政治—经济关联式”^②的发展路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性联系，“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始终是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它在对经济现代化及其牵引和带动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事业产生强有力的政治引导和支撑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党领导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进而推动着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铸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最后，在党和人民的主体性参与下，中国的政治权力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间形成了相互支撑和促进的关系结构。以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为权力后盾和政治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国家综合实力趋于世界前列；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为物质基础和精神保障，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又不断地得到巩固；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互支撑，整体上形成了有利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繁荣昌盛、民族伟大复兴的良性循环。总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下，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展现出来的是政治权力和经济规律相辅相成的过程性特点，彻底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先进性。

四、政治治理经验及其借鉴意义

政治制度模式本身并不具有完全的复制性和移植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关系模式合乎中国国情但也非放之四海皆准。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在解决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国家治理难题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国家治理经验及其独特优势，之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具有鲜明的借鉴价值，主要表现为在稳定政权、协商民主、腐败治理和贫困治理四个方面。

（一）在稳定政权和政令统一方面的借鉴意义

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和协作的权力关系模式形塑的是一种富有中国政治治理智慧的“新的政党政治模式”，这一政党政治模式不仅能够“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而且逐渐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良性政治格局。^④故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成功地消除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竞争带来的众多弊端，能够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理性化，在保证政令统一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起到稳定和巩固政权的作用。这些经

①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第3—6页。

② 郑永年：《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文化纵横》2019年第1期，第30—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3页。

④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2021年6月27日，<http://www.zyztb.gov.cn/ddhzw/356641.jhtml>，2021年5月20日。

验优势对于那些想稳定政局、长期执政的执政党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保持了执政党意志与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形式统一,而且避免和消除了政党竞争和轮流执政带来的欺骗愚弄民众、政党间相互倾轧、人亡政息的政治丑闻和弊端。这为稳定和巩固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和树立了超强的政治权威。

2. 政治权力集中统一于党中央,既保证了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上通下达,又确保了各党派间利益的趋同性以及彼此间的协商合作关系,这不仅有利于政权稳定和政令统一以及政策的连续性和执行性,而且有效地避免了地方保护主义、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的政治流弊。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的政治权力分配和运行始终在党中央顶层设计下的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战略框架下坚守党的领导和为人民服务的党性与人民性,这为稳定和巩固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提供了政党政治制度性保证。

3.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实现政治权力的分工、配合与协作,确保了政治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站位和目标导向,实现了政治权力的高效、有序、良性分配与运行,避免了权力分立与制衡导向下的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既得化的政治顽疾。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政治权力分工、配合与协作模式,有力地展现出了中国政党政治“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和协调各方关系”^①的制度优势,这为稳定和巩固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提供了结构性的权力保证。

(二) 在推进民主政治方面的借鉴意义

“民主”一度被认为是西方舶来品,且被形式化和普世化为多党竞选、直接选举、三权分立。然而特朗普选举获胜、英国脱欧事件以及欧洲民粹主义兴起表明,西方式民主打着“民主平等”“一人一票”的幌子来掩饰“一美元一票”的大资本家左右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而且逐渐异化为媒体、资本、投票、政党间相互攻讦的产物,而非人民意志的真正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保证了执政党意志、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科学诠释了民主的真谛。

1. 它折射出来的是形式与实质合一、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统一的人民性哲学品格。它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发展理念,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国家奋斗的根本价值目标,并将人民性理念和目标深深地嵌入中国政治权力来源、分配与运行的全过程之中。

2. 它通过民主集中制和协商民主这两个重要的民主形式,“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②集思广益、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凝聚共识,寻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为统一思想和科学决策奠定深厚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贡献政治合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所展现出来的民主政治经验弥补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不足,克服了决策的既得利益化、形势误判化、执行空谈化、背离人民意愿的弊端和危险,对于推进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具有借鉴意义。

(三) 在腐败治理方面的借鉴意义

腐败问题是世界不同政治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反腐及权力的约束与制约也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传统意义上的腐败治理模式过分强调以刑制腐和事后惩罚,手段单一、消极被动且缺乏预防机制。^③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腐败治理呈现出来的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从严治腐、高压惩腐、合力反腐的腐败治理方式。思想反腐与制度反腐统筹推进、“治心”与“治症”双管齐下,

^①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 <http://www.zyztb.gov.cn/ddhzw/356641.jhtml>。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92页。

^③ 魏昌东:《腐败治理模式与中国反腐立法选择》,《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6期,第197—205页。

这更有利于从根本上预防、遏制乃至根除腐败现象。

1. 政治权力统一集中于党中央，党中央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来顶层设计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机制与方案，并依靠强有力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以及自上而下的政治高压将顶层设计出来的反腐方案贯彻执行于全党和全国。而且，党中央在政治权力约束和腐败治理的率先垂范以及资源调配，既可以实现权力约束“上行下效”的良性循环，又可以形成党内外反对腐败的社会合力。

2.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不同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治权力分工与协作，这一政治权力关系模式有助于在中央政权的政治高压和权威威慑下形成反腐的权力合力。比如，针对某一具体的腐败案件，在各级党委纪检委的领导下以及各级监察委的监督下，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都必须配合调查，并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在腐败治理方面的独特优势之于其他国家的反腐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四）在贫困治理方面的借鉴意义

贫困是阻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中国扶贫减贫工程取得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①与此同时，中国的脱贫攻坚工程更是得到了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为扶贫减贫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权力支撑和政治保障。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仅能够保障扶贫攻坚工作的科学决策、统一部署、分类施策，而且更有利于调配政府、市场、社会各种力量以及整合人力、物力、财力各种资源来合力扶贫攻坚，进而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制度保障相统一的“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扶贫减贫良性循环和可操作机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在消除贫困和减贫扶贫方面的经验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党的领导层面，执政党的领导力和权威性和号召力是政治前提，执政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理念，以民生建设为基点，集中统一以及有效的部署科学的减贫扶贫政策和机制。公共权力运行层面，公共权力间的分工、协作与配合是权力保障，高效且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导向的公共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快速、稳定、科学贯彻落实党中央扶贫减贫政策和机制。社会治理层面，执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机统一则是合力支撑，减贫扶贫还需要社会成员个体、社会团体、企业、自治组织等社会各界力量的配合和发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权力统一、分工与协作关系模式在国家治理中积累的扶贫减贫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摆脱贫困，都具有借鉴意义。

五、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关系模式折射出来的是中国政治治理经验和智慧，必将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典型代表和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健康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也要在实践—理论—实践的逻辑遵循过程中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政治权力支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实现提供中国政治智慧，为社会主义在世界的繁荣兴盛供给中国政治经验。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5日，第1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

吕鸣章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马克思的著作虽然从数量上来看比恩格斯多, 但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元创新上来看, 恩格斯在许多方面是领先于马克思的, 在一定意义上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思想启迪者, 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指明了理论研究的方向。笔者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辩证地看待资本的历史作用, 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逻辑框架; 其二, 初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为无产阶级解放从自发走向自觉指明前进方向; 其三, 敏锐地把握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 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提供思想资源。

关键词: 恩格斯;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 独特贡献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3-0034-06

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 但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我们会感觉到恩格斯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价值, 发现恩格斯并非那个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不仅在经济上直接资助了马克思一家的生活, 在思想上更是启发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

一、辩证地看待资本的历史作用, 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逻辑框架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与马克思从革命浪漫主义出发来实现唯物史观的转向不同, 恩格斯率先从其家族资本主义生产经营企业的实际状况出发, 完成了唯物史观的转向。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有:

其一, 从恩格斯 1843 年 11 月创作完成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时间来看, 恩格斯在完成这一著作后寄给马克思, 得到了马克思极高的评价, 并将其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受恩格斯影响于 1844 年 4 月撰写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完全实现了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向。麦克莱伦也认为马克思对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阅读标志着马克思一生中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

其二, 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目的来看, 恩格斯认为“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 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 并从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作出结论”。^①这和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他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顺序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 然后是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后来, 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写作提纲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过程, 揭示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后, 结束于阶级。从中可以看出, 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认同的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研究”(20NDJC360YBM)。

作者简介: 吕鸣章,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副教授、哲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60 页。

框架起始正是受到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启迪。

其三，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内容来看，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基本范畴和规律进行批判，从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价值（抽象价值与交换价值）出发，沿着价格、土地占有者、竞争、垄断、价值规律、人口集中、阶级斗争这一逻辑展开，认为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是对私有制的维护。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写作提纲，计划按照从商品、价值、价格到阶级、国家、政治等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逻辑来展开分析。从中可以看出，《资本论》的论述内容正是以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基础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最大贡献是剩余价值理论，这正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贡献的概括。马克思正是沿着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商品的二重性分析逻辑展开，并从中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这正是马克思不同于恩格斯的地方，也是马克思对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内容思路的延续与创新之处。

其四，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来看，马克思虽然是从林木盗窃案与地产分析走向唯物史观，并在1843年3月至9月写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史观论断，但是马克思随后并没有详细描述市民社会是如何决定国家，并没有从国民经济学的思路来具体展现这一图景。而同时期的恩格斯在1844年1月发表的《十八世纪英国》，特别是在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描述了英国工业资本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导致市民社会的重构，市民社会表现为无产者与资本家的两极分化，斗争使无产者不断上升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而使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成为可能。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英国实际相结合来阐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典范，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直接产物就是1848年二人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理论逻辑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基本一致的，《共产党宣言》的大部分观点都可以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找到雏形，而且《共产党宣言》就是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为底板的。正是有了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启发，我们才会看到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有关“市民社会如何决定国家”的唯物史观经典著作。此外，与从物质生产角度不同，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从人口生产的角度描述了氏族的解体、家庭的起源、私有制的产生及其阶级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起源发展，展现了阶级社会产生之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图景。同年，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还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如何导致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的，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其五，从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意义来看，恩格斯认为自由主义的国民经济学是对重商主义的超越，同时为超越私有制经济学做了准备。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二重性的认识也是早于马克思的。恩格斯科学评价了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地位，虽然认为资本主义是血腥与恐怖的，但也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推动作用及其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必须的基础与条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恩格斯是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的二重性意义。《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赞叹也是直接来源于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中的思想。“这种生产过剩将成为新的进步的条件和起因，它将实现这种进步，而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因此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①

综上所述，不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与逻辑思路，恩格斯都早于马克思。与同时期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哲学批判相比，恩格斯较早地通过《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构筑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与思路，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为无产阶级解放从自发走向自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建立一个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批判资本主义物象、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8页。

权所需要的。一是出于论战的需要。《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的撰写,是由19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阶段,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各种机会主义涌现,无产阶级政党需要认识这一现象的迫切需要决定的。二是由于资本主义系统性规训决定的。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不仅仅是暴力革命的国家政治,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微观政治。这也是巴黎公社失败的深刻教训。只有建立起全面的、系统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才能识破资本主义的伪善性,形成无产阶级的强大武器。三是保持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需要。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无产阶级的物化不仅仅是一个暴力革命能够解决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解放、文化自觉的问题。无产阶级没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就不成其为一个革命的、独立的阶级主体。四是无产阶级阶级教育的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资本主义,是一个经过七八百年发展打造起来的现代文明体系。资本主义的灭亡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其一,恩格斯主创的《反杜林论》为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及其教科书范式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创作于1876—1878年的《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最重要的体系化阐释。《反杜林论》的主体结构是针对杜林的《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教程》《社会主义理论史批判》的。《哲学教程》中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辩证法的阐述,《国民经济学教程》中对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阐述,《社会主义理论史批判》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这些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后来经过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深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直接依据,最后又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关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论述结合起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范式的主题框架结构。因此,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直接推动者。

其二,恩格斯弥补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虽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发展,但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决定力量,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恩格斯晚年在研读马克思、摩尔根等人有关人类学著作的基础上,写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与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序言,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的论断在原始社会中是不成立的,人口生产是原始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与决定力量,原始社会是不存在阶级对立的。1893年,恩格斯在评判《资本论》时认为:“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①后马克思主义^②者鲍德里亚敏锐地指出《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从后思索的唯物质生产范式的倾向,物质生产在原始社会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正是恩格斯从根本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恩格斯本着一种科学批判的态度来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与公式化,而是使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种开放性的品格。

其三,恩格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在自然辩证法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的唯物史观进行了论证与批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自然界进行了特殊的辩证唯物主义阐述,批判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把自然界作为人类历史的构成要素,认为自然界是“溶解”在历史之中的,填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界空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多诺等对恩格斯的批判主要着眼于实证主义,实际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仅反对自在自然,同时反对庸俗的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辩证法最终是服务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恩格斯还认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9页。

②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西方兴起的一股左翼思潮,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精神,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致力于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旗帜。

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方面，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人类社会辩证运动发展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形态。它的出场形态是受唯心主义历史观影响的。恩格斯尽管受施特劳斯“实体”论影响，强调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但他绝不是经济决定论者，而是强调“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②。恩格斯晚年在给康拉德·施密特、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约瑟夫·布洛赫、保尔·巴尔特等人的大量信件中，有针对性地批判了经济决定论，严禁把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深刻地指出历史是客观决定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方面，恩格斯虽然坚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但是针对其晚年时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认为无产阶级已不具备暴力革命的条件，无产阶级要善于利用普选权及议会斗争等和平方式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打破了暴力革命决定论，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突出无产阶级的历史自觉性。由此，恩格斯逐渐强调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无产阶级政党的宣言工作、阶级意识、议会斗争等理论进行阐述，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三、敏锐地把握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思想资源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并不是一经出场就永恒在场的，其必然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与渗透。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主体自觉的联合打击下变得更加分裂，阶级意识逐渐丧失。针对此种情况，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批判的前瞻性是早于马克思的，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其一，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微观政治体系。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规训与潜移默化的“教育”体系。恩格斯深刻地指出“这些富有者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他们受命运的摆布”^③。工人阶级必须戳穿资本主义思想的伪善性与普世性，必须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保持自身阶级的独立性与纯洁性。工人阶级必须和各类资产阶级决裂，号召工人阶级开展斗争也不应该同资产阶级进行法律的“政治”斗争，而是同资产阶级进行直接斗争，否则仍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失败。马克思后来继承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时，认为其存在两个基本原因：一是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生活已经对全体民众形成全面规训，他们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觉维护者；二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掌握国家政权，应该把国家机器打烂，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的教育。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分散的、仍处于自发阶段的工人阶级形成了细致入微的系统性统治，所以工人运动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形势。所以，马克思原本要在《资本论》中完整地再现资产阶级如何实现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实现从商品到世界市场、国家何以可能的全貌，来揭示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全面统治机制。尽管这一特殊的唯物史观形态没有得到完全展现，但是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彻底继承了恩格斯这一思想，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微观政治规训，并把这一规训体系称为系谱学，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压制。资本主义的微观政治与全球战略使工人阶级不断丧失阶级意识。葛兰西在深刻反思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中认为，西方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规训，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一个思想启蒙。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所同化，而且也乐意被同化，成为自觉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卫道士。因此，他认为只有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来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总之，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04页。

维护自己的利益。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英国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政权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愿望，表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的那些卑鄙的、从表面上看似似乎只能归咎于个别人的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派别，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①

其二，恩格斯预见到无产阶级的分裂与中产阶级的出现。一方面，恩格斯认为阶段性、零星的、毁灭性的罢工，特别是罢工对机器的破坏，更加激发了资产阶级对机器的发明与应用，以及用机器取代工人的变革。机器自动化、智能装备的普及加重了工人失业率，无产阶级之间的竞争进一步造成了无产阶级的分裂。马克思随后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产业工人的后备军，认为“竞争使资产者日益联合，使无产者日益分裂”，竞争使工人改善了的生活条件化为乌有，把工资严格控制在工人的最低生存标准线附近。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的萌芽都可以在恩格斯那里找到思想的踪迹。总之，资本造就了一切。资本决定着工人的生存生活环境，资本甚至决定着工人的生命及其生育。甚至，当代热门的生命政治学仍然可以在恩格斯那里找到理论的源头。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日益恶化的流行病、生态危机，从根本上威胁到了资本家的生命与利润，资产阶级开始着手解决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与知识素养，使工人阶级上升为“中产阶级”，于是产生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但是，英国工人阶级中的“贵族”，甚至当代工人阶级的“消失”，中产阶级的出现，都是以资产阶级的垄断地位来保障的。“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② 这一论断在当代仍然是有效的。工人阶级的历史性“缺场”是阶段性的，中产阶级的在场是以工人阶级的地区分裂以及全球分裂为前提的。所以，工人生活水平的改良是暂时的，资本获利本性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社会主义在英国的消失，只是因为英国工人沾了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优势，他们“吃穿好些，待遇高一些，持有的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③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等人继承恩格斯的批判思路，批判工人阶级的各种机会主义，要求工人阶级时刻保持其阶级意识的历史总体性维度，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政策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渗透。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局限于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直观，看不到中产阶级的历史虚幻性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格局，作出无产阶级消亡的论断，恰恰是没有看到恩格斯这一理论的历史前瞻性与深刻性，从反面也昭示了恩格斯这一思想的当代意义。

其三，恩格斯意识到资本主义已在全球建立起一个世界殖民体系。恩格斯认为，出于对资本本性、科技革命优势、国内政治斗争形势与生态危机的考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垄断与霸权优势，建立起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使用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产品，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④。英国主导的世界垄断体系形成了一个世界市场的经济产业结构布局，这种结构布局的特点在于“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⑤ 恩格斯这一思想的意义，在于它启发了普雷维什的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边缘”结构学说，普雷维什由此认为拉美不发达地区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提供了生产原料、商品加工和消费市场的功能，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剥削不发达国家的“中心—边缘”结构。弗兰克继而提出“依附理论”，分析了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资本利润给不发达的国家造成了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矛盾，对中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7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6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73页。

国家形成依附状态。多斯桑多斯具体分析了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各种依附状态。阿明认为资本主义已形成一个世界体系，应该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考虑无产阶级的解放及其联合。就全球而言，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在国内外都形成了一个“中心—边缘”的组织结构：一个是绝对有组织的，一个是相对松散的组织。

其四，恩格斯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繁荣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造成物化与消解。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就是自欧文主义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①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繁荣中逐渐迷失乃至消亡。当然，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意识到商品拜物教的物化观念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消解。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第二国际对阶级意识的遗忘使得它过度地强调经济决定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阶级意识的自觉及其形成。在东方，列宁很好地抓住革命的“心脏”与“头脑”关系，抓住俄国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与空间，依靠强大的阶级意识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西方，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的缺失“必然陷入拙劣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空想主义这两个极端之中”^②；葛兰西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拜物教进行分析批判；马尔库塞断言，工人的女儿穿得和资本家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彻底忘记了革命的理想与信念；德波的“景观社会”论，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影响与启迪。当然，不管是西马的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还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鲍德里亚、德波等思想家，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尽管他们的批判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的直观进行批判，是批判的副本，但也深刻地反映出工人阶级所面临的资本主义巨大铁幕，以致在后现代，后马克思主义者彻底否定阶级理论，强调多元、碎片化思维。高兹认为无产阶级已不是现代生产力的代表，拉克劳、墨菲直接断言无产阶级已经消亡，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寄托在流浪汉、女权主义者等人的身上。工人阶级克服地区分裂，实现的全世界联合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只有具有不断洞穿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的拜物教迷雾，才能实现阶级主体的自觉及其联合。列宁认为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意义是非凡而卓越的，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发展“都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③

结 语

所以，“恩格斯并不是马克思的口号”，而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及其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并无法替代的历史创作主体。正如1864年马克思对恩格斯所说：“你知道，一，我对一切都弄得迟，二，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的。”^④ 马克思与恩格斯首先并且根本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他们两人共同缔造了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的呕心沥血，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会有些姗姗来迟；没有恩格斯的远见卓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全貌会有些黯然失色。恩格斯几乎涉足并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历程，在很多思想萌芽与思想阐释方面，恩格斯确实是走在了马克思的前面，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一“能指”的口号，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背后的“恩格斯”这一“所指”。就像德里达所说，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无论如何要有个马克思一样，我们不能遮蔽恩格斯，要有对恩格斯的记忆，没有恩格斯的身影，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展现出其思想全貌。总之，我们不能忽视恩格斯的思想才华与历史地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78页。

② [匈牙利]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8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0页。

从十月革命到苏联再到俄罗斯的历史巨变

李亚强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俄国在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中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步较晚,到20世纪初,俄国仍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并且具有很大军事性、封建性的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俄国军队在一战中的败局,直接诱发了国内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政府还没有完全掌控全局,就在十月革命中被颠覆,俄国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建立,开启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分天下的格局。然而,经过近70年的建设、发展、改革,这个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联盟宣告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改旗易帜,国家政体、国体发生转变,作为联盟主体的俄罗斯也在解体和剧变中遭受重创,从“原点”回到“原点”。苏联的解体,一方面使得联盟自身及解体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陷入长期的动荡;另一方面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冲击,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仍将长期存在。

关键词:十月革命;苏联;俄罗斯;历史巨变

中图分类号: K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3-0040-09

一、十月革命的胜利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俄国的使用

(一) 十月革命在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

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刚刚起步,而封建势力仍然顽固的“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上发动一场革命,并通过这一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一种新的、有别于20世纪初期所有社会制度的新型国家,有没有现实可能?提出这一疑问的人,他们的困惑已经由历史的实践给出了答案。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带领布尔什维克巧妙地选取了最适合发动革命的有利时机。“帝国主义顾不上我们,我们似乎也顾不上帝国主义”^①的空档期,为俄国革命爆发提供了可能。列宁利用俄军在国外战场失利、国内民众厌战情绪广泛蔓延的时机发动革命。据统计,俄国参与一战期间,仅在“1914年到1916年间,有200万士兵阵亡,另有400万到600万人受伤或被俘”^②,国内民众生活因战争而困苦不堪,不满、厌战的情绪在各个阶层中蔓延,国内

基金项目: 本文获“百年统战历程 生动云南实践——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在云南的实践与探索”理论研讨会征文二等奖。

作者简介: 李亚强,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①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② [美] 杰克逊·J. 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第四版)下,董仲瑜、施展、韩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各方力量蠢蠢欲动，俄国最后一个王朝——罗曼诺夫政权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以至于革命者几乎没有耗费太大的力量就将其颠覆了。列宁在后来的回忆中曾明确地指出发动十月革命“恰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这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就是这样）”^①。在推翻沙皇统治后，布尔什维克没有选择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进行妥协，而是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推翻了临时政府。俄历1917年10月26日清晨，“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卢那察尔斯基宣读了由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②，这标志着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俄国的政权。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对巴黎公社社会主义实践的全面超越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继巴黎公社之后取得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次革命的完全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十月革命高度评价：“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③ 相较十月革命，巴黎公社之所以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是因为公社的革命只是在一个孤立的城市中试图建立工人阶级政权，这种社会主义的尝试虽然在短时间内、局部范围中取得了胜利，但很快遭到了周围反动势力的反扑，使公社迅速土崩瓦解，使得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但是巴黎公社的失败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积累。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鲜明地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④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按照《共产党宣言》中所设计的那样，一旦革命取得胜利，就在第一时间在土地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等方面全面推动改革。一方面将沙皇俄国旧的国家机器全部打碎，将私有财产收归国有，控制金融系统和税收，用苏维埃武装力量全面保卫胜利成果，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另一方面接受帝国主义国家苛刻的条件，缔结《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退出一战，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当中。

（三）退出一战，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卫新生政权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共领导人对是否通过缔结合约的方式退出一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大家对是否以俄国付出巨大代价的方式来终止战争争论不休，甚至一些领导人仍然赞成继续进行战争，用战争来结束战争。针对其他领导人对是否退出战争犹豫不决的情况，针对新生社会主义共和国危机四伏的现实状况，列宁忧心忡忡，他在大会上“警告说：在我国，十分健康的婴儿——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诞生，如果进行战争，我们就会使这个婴儿送命”^⑤。我们从列宁的“警告”中可以感受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建立之初面临着何其严峻的内外交困局面。最后时刻，列宁不得不用辞职作威胁才勉强说服中央委员会通过缔结和约的决定，接受德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和高达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俄国通过缔结和约，用不甚体面但是却必须的方式退出了仍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危机四伏的新生政权争取了短暂的喘息之机。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从建立之初就处在一个内外交困的境地之中。在国内和国外的敌对势力眼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⑥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再是幽灵状态，它开始拥有自己的身

①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②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第27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4/c_1122783997.htm，2020年10月14日。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⑤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第4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体,可以活动和不断扩大、延伸自己的影响。就俄国国内而言,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在俄国少数几个城市中取得的,而在这几个城市之外的地区仍是由封建地主、新兴资产阶级把控着的“旧世界”。可以说,革命胜利的果实只生长在几个城市的孤岛之上。因此,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并扩大胜利的果实,使工人阶级在俄国站稳脚跟,全面彻底地掌握政权。

就国外而言,苏维埃政权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各方势力的仇视,他们在苏维埃的周围迅速集结起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企图颠覆新生的政权。在危机四伏的国内外环境中,新生政权的发展异常艰难。在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1918年,敌对势力“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占领了苏俄3/4的土地”^①,其“全国生产军事装备的5400家工厂中有3500家位于敌人的占领区中”,政权面临随时被颠覆的巨大风险。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工农的力量迅速被集结起来对抗来自国内外各条战线上的敌对势力。苏共中央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已在敌人包围之中。它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②,要求迅速推行全国性的共产主义政策,号召俄国人民武装起来保卫国家,击败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巩固苏维埃政权。

(四)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持续推行对苏维埃政权的负面影响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击败强敌积蓄了力量,而且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也做到了这一点。在经过最初几年的艰难岁月后,国内外的敌人被逐一击败,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整个国家超凡动员力的体现,给苏共领导人提供了一种范式,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国家未来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列宁等领导人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延续完成俄国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但是实践证明这种尝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苏俄也在这一错误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托洛茨基在该政策延续的时期看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它的动员力不再像战时那样凸显,事实上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苏俄不仅没有取得巨大发展,反而导致了其“生产力的崩溃比历史上所曾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更严重。这个国家,以及它的政府,都已处在悬崖边上了”^③。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给热情高涨,准备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苏共泼了一盆冰水,他们所设想的过渡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飞速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情景没有出现。实际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持续推行,直接导致积贫积弱的苏维埃国家出现了普遍的国内危机,最后竟直接威胁到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存续。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让苏俄的国内生产总值降至1913年的20%左右”;^④在社会矛盾方面,工农兵这些在十月革命之初以及之后一段时期与苏共关系较为融洽的群体也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延续期间,将矛盾发展到近乎激化的程度,使得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国家政权又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五) 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以及新经济政策的提出

苏共领导人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延续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尝试在实践中几乎颠覆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政策是否已经不再适用于苏维埃的实际,因而新的过渡和建设思想需要及时提出。1921年,列宁在汲取了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后指出:“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

① 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4页。

②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第50—51页。

③ [美]杰克逊·J. 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第四版)下,第721页。

④ [美]菲利普·J. 阿德勒、兰德尔·L. 波韦尔斯:《世界文明史》(第四版),林骥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916页。

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和分派。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①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来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只是苏俄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不具有普适性，短时期内推行该政策是苏俄特殊的客观条件的需要，虽然该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但其对国家原本不甚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采取的压榨式开发，也直接导致了苏俄后续发展的乏力，积累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在某些领域这些问题甚至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和方式在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走到了终结的边缘，这种在国家特殊时期采取的非正常措施只能是短暂的，其只能随着这种特殊状态的终结而终结。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封建主义残余势力仍然顽固的国家中，社会生产力短时期内根本无法获得实质性的飞跃，其物质财富根本无法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充分涌流”，因而该体制下的分配也只能是低水平、低层次、低供应的不平衡的分配，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势必难以长存。所以，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等领导人在社会主义过渡实践中的失败使得他们不得不选择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思考另一种适合苏俄的社会主义过渡方式，用以取代过于直接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这种被设计出来的方式就是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到苏联模式的建立

（一）新经济政策的设计是出于对现实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新经济政策的出台，表明布尔什维克逐渐走向成熟，他们开始认识到即使在超越现实生产力的水平上建构出更加高级的上层建筑，社会也无法一跃而发展到他们所设想的那个水平上。社会发展、生产力进步，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改变、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是有过程性和规律性的，每个阶段都有着特殊的门槛。这种过程性和规律性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中，这些发展阶段前后相继，有着严格的过程性和规律性。发展阶段、认识水平、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要循序渐进，任何在实践中的急躁冒进都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失败和挫折。正如生活在原始时代的人类无法理解和获取信息时代所拥有的生产力一样（即使可以获取，也无法理解和掌握，因为那是超越原始时代人类认知和理解范畴的能力，那个时代的人类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具备相应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积累，因而也无法使用），生活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俄国人民也无法通过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就得以获取社会主义时代所拥有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且这种生产力的程度和等级还是远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能拥有的生产力水平。

（二）昙花一现的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以其温和性和包容性化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后期产生的诸多问题，逐步扭转了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给苏俄带来的不利局面，使得整个社会发展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新经济政策的推行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新气象为未来发展描绘了光明灿烂的图景，许多苏共领导人认为国家可以在新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实现质的飞跃。列宁甚至更为乐观地认为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苏俄的内忧外患将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国家发展将迎来良性循环的重要机遇期，在这个机遇期内，苏俄将在飞速发展中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经济基础的不断积累，整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也会发生质的飞跃，原有社会的消极因素将逐步从新的社会肌体上剥离，被丢到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博物馆中，而作为阶级工具的国家，其主要的职能将不再是政治性的，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将凸显出来，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放，人们的素质和能力将更多地按照自身的意愿去实现个人的发展以及在国家经济社会、生产分工系统中的定位，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① 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0页。

中所预言的社会分工被打破后,那种强加于个人身上的“特殊的活动范围”就会在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中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社会成员“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①。列宁同时也为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规划好了发展方向,他设想“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②。遗憾的是,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在国家中长久地推行下去,它随着列宁的逝世,于1929年年底被苏联新的领导人——斯大林废弃了。

(三) 斯大林接替列宁开辟苏联模式

斯大林执政后,将国家逐步转到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上,以“国家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与党内干部大清洗”^③三大运动为抓手在苏联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基于对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普遍认识,生产力方面的高速推进和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整体富裕成为当时建设社会主义需首要解决的问题,因而“斯大林坚持认为苏联的首要任务是在经济上富裕起来”^④,于是他从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两个方面入手,对苏联的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践表明,斯大林的政策取得了实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33—1937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从欧洲第四上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水平。在以工业生产指标为国家现代化实力评定标准的20世纪初,苏联凭借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跻身工业化强国前列。1936年召开的全苏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工农社会主义国家”^⑤,向全世界宣告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按照斯大林的预计,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可以全部实现工业化,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苏联的建设进程。

(四) 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对国家发展的深刻影响

不得不承认,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苏联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得苏联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得以显现。统计数据显示,在1929—1940年间,苏联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8%”^⑥,而同样的工程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花费了一至两百年的时间,这种优势给西方领导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评价斯大林时鲜明地指出:“他在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⑦从“木犁”到“核武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仅仅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30年间,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将一个落后的半工业半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极大地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这种优越性只是体现在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整个国民经济齐头并进的全面发展。在工业方面,苏联受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方式,以超高速推进工业化;在农业方面,则采用农业集体化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农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础性产业部门,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原料和产品,是国民经济的初级基础,苏联为迅速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工业中的重工业,对农业进行了残酷的压榨用以支撑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从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

② 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66页。

③ 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第108—109页。

④ [美]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斯坦迪什·米查姆、罗伯特·E.勒纳:《西方文明史II》,王觉非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920页。

⑤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第225页。

⑥ 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第106页。

⑦ 唐晋主编:《大国崛起: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15世纪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7页。

导致了苏联国民经济结构的长期畸形。“在苏联的整个历史上，农业始终是主要的经济弱点”^①，这种产业布局的畸形状态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方面，可以说其国内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优势和短板同样突出，才使得苏联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积累了难以挽回的问题，以至于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在实施改革时，无论是从工业、农业、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任何一个方面入手，都难以推动改革取得实质成效。根深蒂固的苏联模式已经与苏联共产党、国家本身融为一体，单方面的改革和全方位的推进最终都要面对是否要突破苏联模式的抉择，前进就意味着走上改旗易帜、亡党亡国的邪路，后退则又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无论进退都会陷入两难困境。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不得章法、左冲右突 30 多年后，戈尔巴乔夫用“新思维”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突破了斯大林模式，埋葬了苏联，埋葬了苏联共产党。

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体两面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俄国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客观选择。在落后的俄国，列宁通过研究鲜明地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② 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认为：苏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去建设”^③，并逐步确立了苏联模式。在废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后，斯大林以实施五年计划的方式对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发展，旨在通过五年计划的实施使苏联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其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可以认为，苏联的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弊端的存在。矛盾具有两面性，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着鲜明的两面性特征，而且在这一矛盾的发展过程中，其次要的、破坏性的方面日益凸显，并且最终压倒和掩盖了主要的、好的方面。在整个苏联历史中，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和弊端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其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性质的、发展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国内人民生活长期困苦，贫富差距悬殊。连续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得俄国在人力、财力、物力上陷入了泥潭，无法自拔。一方面俄国的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他们要受到来自地主、新兴资产阶级、军队的盘剥；另一方面，集中在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受到俄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封建主的压迫、帝国主义战争的侵蚀。这两个在俄国国内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阶级受到多重压迫，革命的意愿强烈，于是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找准时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向工农大众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激发大众的革命意识，推动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苏俄的社会主义是在俄国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建立起来的，从生产力的角度而言，即使是在苏联发展最辉煌的阶段，也仅仅只是在国民经济某些行业 and 部门实现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齐头并进甚至短时期的领先，但从长远来看，这种领先毕竟不是全方位的超越，在发展阶段上并没有顺利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苏联社会主义的产生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成熟后的自然分娩，而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的缺口上通过革命诞生的“早产儿”，因而“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

① [美] 菲利普·J. 阿德勒、兰德尔·L. 波韦尔斯：《世界文明史》（第四版），第 920 页。

②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54 页。

③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92 页。

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这种从旧社会带出的痕迹，很难在短时期的社会改造中被抹除，它仍然嵌在苏联的方方面面。

2. 新政权建立后，苏维埃政府出台政策，使受到多重压迫剥削的工农阶级获得解放，使人民取得了自由，人民一跃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这对于长期以来处于近乎奴隶身份的俄国人来说实在是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激发了他们极大的热情，使得他们积极投身到苏维埃国家的生产建设中。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及生产热情被释放出来，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渴望，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新生政权的仇视并试图颠覆这一政权使人民再度回到那种奴隶般的生存状态，这些因素迫使俄国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生存意志和生产意志，以极快的速度来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改变自身的生活状况，因而人们用极大的热情和牺牲精神展开对国家的建设，并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巨大成功，这种热情带来的生产上的高速度、高效率在苏联前期制订的五年计划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苏俄成立之初，到联盟成立后，苏共领导人发动人民进行了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新经济政策结束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回到指令性计划经济轨道上，开展了以五年计划为名的全方位发展。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掀起了农业集体化的高潮，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用高速度、高指标、行政命令推动农业集体化，将农业、农村、农民视为开展工业化的附属，甚至把农民中的部分群体（富农）人为地划入敌对阶级的队伍加以清理。“据估计，大约有1000万农民在1929—1933年的集体化运动期间丧生”^②，这对于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颇具讽刺意味。国家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将本阶级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进行身份标识，并人为剥离，这对于联盟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打击。为了加快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建设进程，进一步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和攫取国家发展的更大的生存空间，苏联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而且这种政策的执行导致了其国民经济产业发展的长期畸形。虽然通过政策的倾斜，苏联的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为国家的工业化，为卫国战争的胜利，为苏联在战后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分庭抗礼，为扩大苏联的全球影响力和插手地区事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其国内轻工业、服务业、农业的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影响了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对于产业部门的发展而言，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部门的农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也对整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体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苏联的产业部门长期以来定位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上，因而在社会消费品领域，苏联人民长期忍受着生活物资的匮乏（物质的充裕仅仅对于某些特殊群体以及在部分需要向西方进行展示的社会主义窗口地区得到保障），“苏联工业总产品中大约有70%是资本货物，30%是消费品；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则大致相反”^③，这在国家产业发展中，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毛泽东以苏为鉴，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首先就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发展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不能将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发展进行人为的分割，不能偏废其一，否则就会导致生产生活产品的短缺、货币的动荡、产业发展基础不牢等问题，平衡工业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合理地发展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可以“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④。

3. 俄国在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后，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成果，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苏联向全世界展示了在22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多大的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页。

② [美] 菲利普·J. 阿德勒、兰德尔·L. 波韦尔斯：《世界文明史》（第四版），第920页。

③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下，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89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2—723页。

较优势，广阔的国土拥有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丰富资源，优越的资源禀赋解决了工业化对资源的巨大需求。这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它使得苏联几乎不需要任何海外殖民地，就可以获得发展所需的所有资源，这也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封锁没有了实际意义，无论是在热战时期，还是在冷战时期，巨大的国土面积都为苏联提供了发展机遇和战略回旋空间。超凡的资源储藏量为苏联近乎不计成本的超高速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使苏联可以通过粗放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在短时期内完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的积累，但这种发展方式也对资源、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破坏。

其实，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一直处于各种敌对势力的包围和入侵之中，国家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状态一方面来源于苏联内部的不正常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始终高度紧张的对外关系。即使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如日中天，而且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扩展，“从东欧到东亚，东西南北连成一体，拥有世界 1/3 人口和 1/4 土地的强大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了”^①，但苏联仍处于被包围、竞争、渗透的地位。为了扭转这种战略上的不利地位，苏联的神经始终紧绷，焦虑和渴望快速发展成为苏联领导人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为了维持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了应对敌人的入侵，为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赛，苏联对疆域内的资源进行了杀鸡取卵式的开发，以至于苏联这个巨人轰然倒塌时，人们才发现这种超常规的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有一个典型的事件，在 1986 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事故中，苏联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提出处理方案并刻意向民众和全世界隐瞒了事故的真相，使得核辐射和核污染至今仍然影响着周边地区，加固在爆炸反应堆上的防护措施也逐渐失去作用，其带来的风险成为一个棘手的世界性难题。当然，切尔诺贝利事件只是苏联发展过程中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之一。“在 1990 年苏联解体前，这个国家的军工污染程度令人不敢相信……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小国家，现在正面临严重的环境危机。”^②“当历史学家最终对苏维埃共产主义进行‘解剖’时，会得到生态灭绝的‘死亡结论’。”^③历史和现实的实践都在印证着一个道理，即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应该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前提。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相悖的，因而其发展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苏联后期发展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个原则。

4. 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立后，迫于国内外形势的需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过渡方式，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以至于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在抛弃较为温和的新经济政策之后又重新回到高度集中的老路上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斯大林以及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手中逐渐转变为一套成熟的体系，即苏联模式。这一模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集中，在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诸多领域活力的衰减，以至于最终走向僵化，联盟土崩瓦解。苏联的建立使得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真正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启了人类发展历史的新纪元。由于是第一次全面的社会主义实践，因而也就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诸多的认识不全面、实践不科学等问题。因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④，唯一不同的是要把“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阶级状况”替换为“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阶级状况”，那么，“解决社会问题办法还隐藏在不发

① 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第 124 页。

② [美] 约翰·博德利：《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第 5 版），周云水、史济纯、何小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5 页。

③ [美] 约翰·博德利：《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第 5 版），第 3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24 页。

达的经济关系中”^①。遗憾的是，苏联的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维持已有体制、意识形态较量、大国沙文主义等方面。对于苏联人民而言，国家建立之初的那些豪言壮语，那些美好图景，终成幻影，最终只剩下“僵化的体制、高压政策、官僚机构的腐败和懈怠导致的浪费、物资短缺、玩世不恭和绝望”^②。在国家发展的最后时期，无论是苏共党内的一些人，还是苏联人民，都对整个苏共、整个国家失去了信心，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建设“新思维”提出之后，各种思潮激流涌动，各方政治势力暗潮汹涌。让人吃惊的是，苏共在尚有余力扭转局面的时候，没有力挽狂澜，而是与各种反对势力一起埋葬了自身和苏联。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③；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签署协议，“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12月21日，“独联体”正式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以及从联盟解体出来的东欧国家在国家体制上进行了180°的转轨，作为联盟主体的俄罗斯采用了西方开具的“休克疗法”的诊疗方案后，经济陷入长时期的低迷和震荡，人民在国家转轨前期望得到的在新社会并没有实现，在这场剧变中“他们既感受到了旧制度所带来的的压抑，又体会到了新制度所带来的辛酸”^⑤，个中滋味，也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民才会有最真切的体会

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逐步祛除旧社会的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是必须要经历的发展阶段。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虽然在某些领域中保持着与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齐头并进的局面，但是在另一些领域中却长期滞后，国民经济结构长期不平衡，政治体制建设陷入僵化，以至于在后期竟难以入手推动改革，上层建筑的固化、僵化影响到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最终彻底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封闭僵化的老路走上了改旗易帜的邪路。

结 语

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联盟解体，苏维埃走完了短暂却充满争议的一生，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思考，它从矛盾丛生的俄国走来，最终又在矛盾丛生中结束，从一个“原点”归于另一个“原点”。分析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看出，苏联的社会主义虽然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宣布建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而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因而最终只能走向崩溃。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⑥。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24页。

② [英]安德鲁·玛尔：《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邢科、汪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18页。

③ 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7页。

④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第148页。

⑤ [英]安德鲁·玛尔：《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邢科、汪辉译，第51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统战理论与实践

高校海归教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初探

杨美新, 郭燕萍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海归教师是高校发展建设的中坚力量, 强化对高校海归教师的价值观教育引导于高校的发展、教师的自我完善及时代新人的培育皆有重要意义。调查研究数据表明, 当前高校海归教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总体向好, 但亦存在着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现实认同效果不佳、主体参与积极性不足等现实困境。新时代探索高校海归教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路径, 应从强化教育、加强关怀、优化机制等方面精准施策, 以切实提升教育引导的实效性、深化价值认同。

关键词: 海归教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引导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3-0049-05

《2020 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 2020 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人数同比增长 33.9%, 海归人才质量优化, 求职者呈现年轻化、高知化趋势。近年来, 随着留学归国人数的迅速增长, 海归人员已逐渐成为高校人才队伍的重要力量。高校海归教师是莘莘学子眼中的榜样, 是众多青年教师奋斗的目标, 其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将会影响青年群体的成长, 对高校的未来甚至是国家的未来亦会产生重要的辐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 是我们凝聚精神力量、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价值导向。因此, 把握高校海归教师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现状, 积极探索增强高校海归教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教育引导路径, 引导他们成为一名品行端正、业务卓越、情怀深厚的专业化教师, 是筑牢高校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助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实需要, 亦是满足教师个人成长发展需要及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

一、高校海归教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价值意蕴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①海归教师是高校发展的中坚力量, 切实强化其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 引导其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无论是对国家和高校的进步发展, 还是对教师的自我提升以及时代新人的培育都有重大价值。

基金项目: 湖南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信息类高职院校网络舆论生态及其治理策略研究”(XJK17BZY011)、湖南省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项目“开放大学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策略研究”(XSP18YBC161)、湖南大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专项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 杨美新, 博士,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郭燕萍,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① 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年, 第13页。

(一) 筑牢意识形态前沿阵地, 助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教育强则国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①。在十九大报告中,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②的殷切期望。大学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我国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必须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海归教师群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与实践的重要力量,强化对其思想教育引导,一方面有益于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涵养与传播,为海归教师群体补足精神之钙,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筑牢高校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需要很多力量的推动,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其中最持久、深沉的力量。^③高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强化对海归教师的思想教育指导,有益于为高校内涵式发展蓄积强大精神力量,营造求真务实、向上向善的校园文化环境,实现以文化育人和以人才兴文化的双重效应。

(二) 立足教师成长发展需要, 成就新时代四有好老师

人是一种价值性存在,价值观能为我们解释生活的意义,个体的生活都是在特定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传道授业解惑,师者之本职。教师要想切实履行好教书育人的职责,就必须有正确价值观的指导,因为其自身的价值取向不仅影响治学态度和行为,更会于潜移默化中影响受教育者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高校海归教师于海外习得丰富学识、精湛技艺,理应成为高校教育科研的骨干力量、莘莘学子心中的楷模榜样。但由于多元文化思潮、现实境遇等因素的影响,不少海归教师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趋于弱化,出现育人意识不强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④,它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因此,加强对高校海归教师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一方面有益于帮助高校海归教师树立崇高的职业精神和教育理想,为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问、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正确价值观念的树立能够助力高校海归教师坚定职业理想与信念,摆脱“教书匠”的困顿与迷茫,让平凡的工作更具价值、更有获得感,从而帮助其在为新时代教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人生价值。

(三)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推动时代新人培养培育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与栽培。^⑤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型,对社会的思考和自我的认知还不成熟,身边的朋辈、师长在其价值观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深厚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于公于私所持的价值观。^⑥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好老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力争成为社会良好风气的引领者及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指路人。因此,切实加强高校海归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益于引导广大海归教师自觉做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兴国的坚定支持者,并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助力学生成为担当民族大任的新时代好青年。

① 教育部课题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页。

③ 习近平:《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31日,第2版。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2页。

⑤ 张烁、谢环驰:《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民日报》2019年3月19日,第1版。

⑥ 彭波、姚大伟、马占成:《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人民日报》2014年9月10日,第1版。

二、高校海归教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现状特点

高校海归教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只有在准确把握现状的基础上对症下药才是深化认同的应有之义。为此,本研究以高校海归教师群体为对象,从受访者基本情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践行状况及对各职能部门所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活动认同情况等方面展开匿名问卷调研。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回收196份,回收率为98%。对有效回收的问卷经统计后呈现出的受访者基本情况如下:性别方面,男性占比48.98%、女性51.02%;年龄覆盖范围较广,70、80、90后分别占比44.9%、34.69%、18.37%;留学地域则主要以美国地区为主;归国后所任职的院校及所从事专业类别皆分布广泛,985院校占比22.45%、211院校占比18.37%、普通本科院校占比59.18%。总体而言,高校海归教师群体思想状况整体向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较为认同,但亦存在一些问题亟须改善,具体表现如下。

(一) 具备浓厚家国情怀,但与主流意识形态有所疏离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爱国、爱家,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沉、最根本、最永恒的价值取向。^①对于高校海归教师而言,海外留学经历给予了其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打破了其对资本主义国家及制度的美好幻想。当问及“中国人的身份,让您在海外留学期间的突出感受”时,59.18%的受访者表示是被尊重的、自豪的;当问及“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决定回国任教的缘由”时,61.22%的人表示鉴于国内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及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42.86%的人则是受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感召,致力于报效祖国。由此可见,多数高校海归教师不仅感受到了祖国的发展与繁荣,涵养了深厚的家国情怀,亦把自己的理想、人生同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用奋斗托举祖国及个人的美好未来。

与此同时,在多元文化思潮冲击及跨文化逆向性适应的影响下,高校海归教师群体无论是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还是对党情、国情、社情的认知都存在一定的认识模糊问题。当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哪些方面时,仍有71.43%的受访者选择了“集体”层面,个别受访者甚至表示完全不清楚。当问及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仍具解释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优越性”等相关问题的看法时,部分教师表示不清楚、疑惑甚至是不认可。由此可见,高校海归教师群体浓厚的家国情怀与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度认知呈现出分化割裂现象。一方面是由于跨文化接触导致的个体的情感波动、行为变化和认知发展。高校海归教师群体身上带着母文化和旅居国文化两种标签,在旅居国参与的社会活动、积攒的异国文化认同于潜移默化中对其归国后再接受母国主流价值观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海归教师尚未对可能出现的母文化适应问题做好心理调适。对母文化的归属、认同意识以及对异文化的积极、肯定态度导致其正经历着价值观念的相互碰撞与激烈冲突,因此不少海归教师在回归到母国后会倍感人情疏离,出现价值迷失与混乱。

(二) 崇尚社会价值取向,但被现实境遇稀释认同效果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社会的美好追求,其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高校海归教师群体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其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思想意识会更强烈。调研过程中有61.22%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国内稳定的政治社会发展环境才选择回国任教。由此可见,大多高校海归教师渴望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实现个人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但价值追求与现实境遇往往存在差距与隔阂,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经济社会中的一些矛盾逐渐显露,不断被披露出来的有违公平、正义的事件冲击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公平、正义、自由的美好印象,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势必引起海归教师的思想波动,不断冲击着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

马克思在阐述人的需要相关议题时强调:“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和满足自身需要的方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

式”^①，“‘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② 海归教师群体不仅关注社会进步，同时也关注个人成长，当问及“目前生活存在哪些不足”时，职业前景、收入待遇、教学科研等问题分别占比51.02%、59.18%、69.39%。大部分海归教师在经历过海外旅居生活后，对祖国、对民族的情感日益深厚，其渴望通过自身所学报效国家，对自身的发展亦抱有较高的期待。但是由于国内高校关于职称评定、科研考核、收入分配等体制机制与国外教育体系有所区别且尚待完善，不少海归教师面临着事业与生活的双重压力，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较低。而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只有尊重人的需要，并从人的需要出发，才能有效地使其从根本上认同某种价值观。^③ 在现实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海外留学归国教师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发展道路目标、自身发展前景等产生困惑。这些问题杂糅交织在一起便削弱了海归教师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生动力，导致部分教师心理失衡、思想迷失、价值迷茫。

（三）注重个人价值准则，但主体参与积极性有所不足

中国古代历来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高校海归教师理应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价值遵循，并以亲身实践为广大青年树起榜样示范作用。但当问及“如何看待科研过程中引用非权威渠道获得的数据或观点”时，分别有20.41%、8.16%、30.61%的受访者表示这是非常诚信、基本诚信、可以接受的行为；当问及“在教育教学中能否认真备课授课”时，有24.49%的受访者表示基本能做到、2.04%表示无法做到。身为高校教师，教书育人是本职工作，理应认真对待，专注科研亦是重要任务但也应遵守学术规范。由调研数据可知，高校海归教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自身独到的见解，但仍有部分人员将其外化于行的积极性不高，存在理论认同与实践认同相背离的状况。

人是社会的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 and 他人，个体价值的实现也是通过服务社会得到检验和体验的。一种价值观念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④ 因此高校海归教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不能单停留于认知、理解层面，最终都还要落实于实践活动。在高校海归教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主动性不充分的情况下，应通过优化体制机制加强思想引领，不断激发主体参与积极性。现有的机制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亦有如下亟须改善之处，具体表现为：一是支撑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对高校海归教师的教育引领工作并未常态化跟进，亦未根据参与对象的反馈评价及时调整教育引导方案。二是多部门各自为政，主导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目前而言，国家留学基金委、各级统战部、高校党委及各行政管理部门皆参与了高校海归教师的价值观教育引导，但各部门尚处于各司其职、各自为政的碎片化、分割状态，未形成一个上下联动、同频共振的协调工作机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未被充分利用起来。在这种框架体系内，教育引导的局限性日渐凸显、实效性难以提升，教育对象的获得感亦不强。

三、高校海归教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实施路径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关键，而教师是关键中的关键。高校海归教师是中国共产党教育战线上的重要力量，必须自觉肩负起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因此强化对高校海归教师的价值观教育引导是新时代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课题。针对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可从强化教育、加强关怀、优化机制三方面着手，构建加强高校海归教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实施路径。

（一）强化教育，提升价值理论认知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高校海归教师作为传道者，只有自身明道、信道才能成为大学生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③ 李庆华、谭蕾：《高校青年教师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10期，第106—109页。

④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1版。

长路上的指引人。而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一个从理论认知到情感共鸣再到行为实践的层层递进的动态过程,因此,区分层次、突出重点的教育引导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工作。

高校海归教师在海外期间由于远离故土且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及我国的党情、国情、社情存在一定的认知模糊。而认知是认同的初级层次,因此强化对高校海归教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首先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深化认知。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及高校海归教师的群体特点,以理论与实践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传统与现代科技结合、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的方式给予高校海归教师深刻的思想洗礼。在系统、全面的学习中,让高校海归教师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意涵、精神实质及时代价值,从而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感悟。其次是加强适应性教育,强化心理疏导。高校海归教师面对国内外不同的环境会产生心理冲突,会有一个文化再适应的过程。因此,各职能部门应结合高校海归教师实际需求加强心理疏导和教育,积极开展相关的学习培训、心理辅导活动,帮助其尽快熟悉本土的国情、社情、高校的科研工作环境和文化氛围,掌握排解心理困扰和调节情绪的方法,从而尽快跨越逆向文化冲击的阻碍,以积极开放的姿态重铸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性认知和深厚情感。

(二) 精准关怀,夯实价值认同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核心,意识形态所表达的实质关系是利益关系,群众的心理是重经验判断,人民群众只有在利益满足和情感归属中才能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①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工作要想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则必须加强人文关怀,精准定位并及时回应高校海归教师的现实诉求,巩固价值认同基础。

一是加强现实生活关照。人是现实的人,需要是人产生动机和意愿的源泉。高校海归教师在回国任教后既面临着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生活压力,又有职业晋升、科研教学等事业发展压力,幸福指数和生活满意度较低。各职能部门应加强统筹协调工作,切实关照高校海归教师的实际需求,在呼应现实诉求过程中帮助高校海归教师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并鼓励其通过向上向善的个人努力来减轻压力,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二是畅通诉求表达渠道。人是“社会人”,人不仅有物质利益需求,而且有着复杂的情感需要。高校海归教师是一群“高知、高智”群体,对于有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的成员。一方面可积极鼓励其发挥深度专业研究、广泛海外联系和广阔国际视野的独特优势开设相关讲坛,结合时政热点对中西方社会发展进行综合剖析比较和经验借鉴,引导大学生理性辩证地看待中西差别;另一方面可鼓励其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参政议政,在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深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为我国新型智库建设贡献力量。

(三) 优化机制,增强价值认同实效

价值观的教育引导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实践养成,而且要用体制机制来保障。^②新时代加强对高校海归教师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必须打通教育引导的机制性壁垒,以此来提升教育引导实效性,增强认同效果。

首先要优化支撑保障机制,推动高校海归教师价值观教育引导工作的常态化跟进。一方面,定期组织相关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以帮助海归教师深化理论学习、加强实践感悟,并根据学习情况适当调整方案。另一方面,构建沟通反馈体系、及时回应相关诉求,把解决思想问题与回应现实需求统筹起来,倒逼教育引导工作聚人气、接地气。其次是优化协同联动机制,打造高校海归教师价值观教育引导共同体。既切实明确党委的主体责任,发挥把方向、谋大局、促协调的宏观统筹工作;又积极促进其他部门协调分工、落细落实具体工作,在定期的考评调研过程中促进教育引导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总而言之,通过多维协同、打通机制性壁垒,实现党建引领下各部门协调沟通、精诚合作的良好生态画面,以此助力高校海归教师价值观教育引导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有效提升。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孔德永:《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第91—99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1页。

大统战视阈下加强党外代表人士 队伍建设的现实路径

——以玉溪市为例

李昆裕

(玉溪市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摘要: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是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然而, 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在实际工作中, 党外代表人士工作在人才储备、教育培训、选拔任用、监督管理和自身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特别是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亟待增强。从实践层面看,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拓宽党外代表人士发现渠道, 及时储备人才; 二是创新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举措, 提升综合素质; 三是加大党外代表人士选拔任用力度, 合理使用人才; 四是健全党外代表人士监督管理机制, 确保发挥作用。

关键词: 大统战; 党外代表人士; 队伍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3-0054-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社会发展迈入新发展阶段,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必须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 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制度保障和人才支持。2015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 “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 必须全党重视, 大家共同来做”^①, 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全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 关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第一个文件(《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相继出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 要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 健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制度。它们从理论、制度及法律三个层面为在“大统战”格局中进一步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制度保障, 同时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大统战视阈下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必要性

(一)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 它发挥着凝聚共识、优化决策、

基金项目: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2019年度全省社院(校)科研协作课题“新时代加强云南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究”(2019SYXTB05)。

作者简介: 李昆裕, 玉溪社会主义学院理论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建设。

^①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5年5月18日, http://www.china.com.cn/eppcc/2015-05/21/content_35621788.htm, 2021年1月14日。

协调关系和维护稳定等作用。党外代表人士是这一制度的参与者、实践者与推动者，他们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通力合作，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确保了多党合作事业的实现与政治协商的发展。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统战工作对象进一步拓展，人员构成发生了新变化，譬如留学归国人员、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和非公经济人士中的年轻一代是当前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他们的知识素养、精神风貌、生活方式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此同时，对党外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由原来简单的“联合”和“统一”进一步延伸至“培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要培养一批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可堪重用的党外代表人士。基于此，“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十分必要。它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水平，有利于发挥协商民主制度的作用，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持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们国家迈入新发展阶段，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史宏愿的开局、起步关键期，需要更加广泛、更加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汇聚各方英才为之奋斗。党外人士数量庞大、群体多元、分布范围广，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①，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人才资源。目前，党外人士已从科、教、文、卫领域逐步扩展到政府、经济、政法等领域，同时新的社会阶层崛起，出现了新兴职业的党外人才。党外代表人士在党外人士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广泛的影响力，是中国共产党与广大党外代表人士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有利于科学有效地发挥他们的桥梁、纽带作用，把广大党外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持。

（三）推动统一战线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党的革命、建设、改革等时期都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团结和调动一切可以团结和调动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因此，推动统一战线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团结和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党外代表人士是不同党派、不同团体、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及各界人士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代表，他们在联合党外人士时，通过其威望和专业性发挥重要作用，是实现统一战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承担者。故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是实现统一战线的不断巩固和壮大的必然要求。通过有计划、有目标的培养和发掘优秀的党外代表人士，提升他们的能力、拓宽作用发挥途径，不断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从而推动统一战线持续健康发展。

二、大统战视阈下玉溪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面临的困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玉溪市党委的高度重视下，各级统战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和云南省、玉溪市的实施意见，与国家、省、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相结合，从抓源头打基础、扩展党外代表人士覆盖面、健全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等方面入手，不断提高党外代表人士综合素质，为服务玉溪市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提供人才支撑，队伍建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在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与储备、教育与培养、选拔与任用、监督与管理方面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发现与储备方面

1. 发现视野不够宽广。发现可培养的对象是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基础，夯实这个基础要

^① 张鹏立：《新时代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思考》，《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5—10页。

注重在实际工作中拓宽视野。调研实证反映出目前部分县(区)存在发现渠道单一的问题,譬如部分县(区)注重从科教文卫系统党外代表人士中去发现和遴选,对其他党外代表人士的关注度不够。另外是发现机制单一的问题,目前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推荐还停留在定期的组织推荐上。譬如,在人大、政协、政府换届时才通过组织推荐形式选拔党外代表人士,除此之外没有专门的选拔途径,致使许多有从政意愿的优秀党外代表人士没办法实现自己的意愿。长此以往,这部分优秀党外代表人士积极性必然受挫,慢慢地离组织越来越远,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2. 党外代表人士信息库不规范。玉溪市目前建有党外代表人士数据信息库,但不规范。譬如,部分县(区)统战部门对党外代表人士信息的统计重点放在处级和正科级干部和中级职称的党外代表人士上,覆盖范围不全面。另外是数据更新有问题,部分县(区)因没有明确的推荐程序和标准,对无党派代表人士、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宗教界代表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数据几年都没有更新。

3. 党外代表人士储备不足。玉溪市目前党外代表人士总体储备不足,就党外干部而言,呈现出数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实职正处数量较少(2019年有3人)、年龄结构不合理、后备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在其他领域,譬如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宗教界人士、港澳台侨代表人士在结构上不合理,后备人才培养明显滞后,给新老交替带来很大困难。就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而言,平时看起来数量可观,但真正需要时有威望、有影响的专家型、“旗帜性”人物不多。就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而言,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转型发展困难等因素的影响,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所减退。

(二) 教育与培养方面

1. 培训内容和方式不够丰富。党外代表人士的工作领域涉及面广,不同界别有各自的特点,培养目标要求的侧重点也不同,对他们的教育培训既要考虑同一性,也要考虑针对性。但目前的培训内容思想政治理论方面偏多,且理论教育较少结合党外代表人士自身特点进行阐释,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教学方式多采用集中学习,实际锻炼比较少。另外,因为部分县(区)人数较少,分类培训难以实现,致使培训内容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不强。

2. 培训需求难以满足。玉溪市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培训主要依托市、县(区)社会主义学院,但市、县(区)社会主义学院与市、县(区)党校这两级培训机构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而党校的培训对象主要是党员干部,这就导致统战方面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难以满足党外代表人士系统学习的培训需求。同时,部分县(区)因经费有限,培训难以实现全覆盖。另外,因岗位、身份的限制,部分党外代表人士到多个岗位锻炼的需求无法满足。

3. 重视度不够。部分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个基本政治制度理解不深,对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譬如,部分单位党政主要领导片面地认为党外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统战部门的事,在日常工作中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引导不够重视。部分单位对党外干部的培养锻炼不够,党外干部参加学习、培训的机会相比党内干部较少。部分单位对本单位的民主党派干部参与党派活动支持、配合力度不够。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教育与培养。

(三) 选拔与任用方面

1. 机制不健全。近年来,中央、省、市、县(区)对党外代表人士选拔任用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措施,但制度设计不到位。譬如,对党外干部选拔使用的要求不明确,规定中使用“一般要选配”“有一定数量”等语言,弹性非常大。措施中规定了选拔的岗位数量、方式,但没有明确的选拔标准和程序。这些都是缺乏刚性的、系统的选拔任用机制和具体实施细则的具体体现,必然导致部分县(区)、部门在实际执行时随意性较大,不能达到预期要求和效果。

2. 制度落实不到位。主要体现在部分政府组织部门不能严格贯彻落实政策规定。譬如，2019年玉溪市政府组成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中，只有1名正职、14名副职，其比例达不到《中共玉溪市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配备要求（即市政府工作部门配备党外干部的比例一般不低于1/3，到市政府工作部门担任行政正职的党外干部要选配3名以上）。就各县（区）而言，有2个县（区）没有配备党外副县长（区）长，1个县（区）没有配备党外政协副主席，4个县（区）的法院没有配备党外副院长，5个县（区）的检察院没有配备党外副检察长，多数乡镇（街道）领导班子中没有配备党外干部。

3. 培养和使用相脱节。组织、统战部门在培养选拔使用党外代表人士上侧重点有所不同，统战部培养党外代表人士的目的是关键时候能够保持坚定立场、站得出来、帮得上忙、使得上劲，而组织部在党外干部的实职安排上主要是考虑工作的需要和岗位的需要，党外干部有没有代表性、具不具备代表性不作为提拔使用的必要条件，因此出现了统战部多年培养的党外人才达不到组织部提拔使用的要求，组织部提拔使用的党外干部在统战领域不具备较强代表性等情况。这种情况使一些党外代表人士不愿留在党外发展。另外，组织部门在党外领导干部的选拔使用上，一般只是会上研究前征求一下统战部门的意见，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科学机制。

（四）监督与管理方面

1. 缺乏日常管理机制。调研中发现，多数县（区）、部门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日常管理相对松散，对没有被安排使用的党外代表人士仅停留在数据信息的管理上；被安排使用的党外代表人士除政协委员有组织考察、社会监督和观察外，其他仅靠“联系交友”来实现管理，而党外代表人士的身份（比如餐饮、酒店等服务类的企业家和景区内的宗教界人士）受限于“联系交友”的场所，使“联系交友”多局限在“两会”期间开展，日常出现断档。这些管理浮在表面，缺乏有章可循的管理机制，不利于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

2. 考评机制不健全。调研中发现，多数县（区）只有考核评价的指导性意见，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考核评价细则，也没有建立考核评价结果与党外代表人士任用紧密结合的管理机制、激励和退出机制，只有在党外代表人士出现违法乱纪的行为时，才采取劝退、请辞、撤销等管理措施。这就出现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部分党外代表人士不把心思放在履行职责上，工作中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自身素质方面

党外代表人士能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敏感性，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业务水平，在其专业领域中成就突出，且大部分党外代表人士都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同时，部分人在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方面相对不足，有的需提升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能力。譬如，部分党外代表人士对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不够了解，找不准服务经济建设的切入点，在讨论相关的决策时不能有效参与；有的人对参政议政所提的提案论证不够深入，实际操作性不强，导致其不能很好地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有的人虽然能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但思想政治态度、多党合作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有不相适应的地方。

三、大统战视阈下加强玉溪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途径

新时代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要正确认识中共中央对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新要求。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任务是“要适应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的要

求,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①。我们要以要求为目标,努力探索出既遵循干部成长的一般规律,又结合党外代表人士特点的建设途径。

(一) 拓宽党外代表人士发现渠道,及时储备人才

1. 开阔选人视野。发现是选人用人最基础的环节,这个基础做扎实了才能及时全面地发现优秀党外人才。一是拓宽领域。不仅要巩固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这些党外代表人士发现主阵地,还要加强相关部门、党派组织、有关团体的人才信息交流,注意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发掘党外人才,积极在出国和归国的海外留学人员、新的社会阶层等领域中寻找。二是建立党外代表人士的推荐标准和程序。对于党外人才也要把好入口关,全面从严要求,根据“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的基本标准来研究制定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让各相关部门、党派组织、有关团体按照实施细则中的推荐标准和程序完成人才推荐工作,及时把那些政治过硬、业绩突出、群众认同度高的党外优秀人才纳入视野。三是建立党外干部劝留制度。要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党外干部的政治意识、工作业绩、群众认同度等情况,及时发现党外优秀人才,并根据工作需要提前做好党外干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劝留工作安排,有计划地将一部分优秀人才留在党外。

2. 建立规范系统的党外代表人士信息库。党外代表人士的储备是为党外干部选拔任用做准备的,是党外干部的来源和基础,我们要抓住“源头”,夯实基础。一是完善党外代表人士信息库信息,要求各县(区)对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宗教界代表人士、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党外干部队伍进行界别分类统计、记录并制成档案,形成自下而上的信息报送系统。二是对信息库进行动态管理,积极探索党外干部信息报送常态化,实行党外干部信息年报制度,要求相关单位每年上报一次党外科级干部、党外青年公务员的数量和名单,统战部门实时掌握党外科级干部和后备干部的情况和相关动态,及时更新党外代表人才库的资料信息。另外,对其他党外代表人士的信息也要定期进行更新,以便从中发现并储备党外优秀人才。

(二) 创新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举措,提升综合素质

1. 加强教育培训。一是科学合理地进行规划。首先是把党外代表人士培训与玉溪市干部培训一起部署规划。其次是依据党外代表人士界别分类,结合玉溪的实际制订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最后是定期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收集培训需求,按照需求制订培训计划。二是加大培训力度。培训内容要始终将政治引导放在第一位,坚持理论学习与省情、市情教育相结合,着眼于进一步提高党外代表人士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能力,有计划地定期举办党外代表人士理论培训班,同知名高校以及培训机构联合办学,依托他们的优质资源提升培训层次和丰富培训内容,不断提高理论培训的效果。培训方式要进一步创新,针对党外代表人士界别进行分类培训,如人数太少可开发网上教学,增强培训的实效性。另外,打造特色优势学科,以各级社会主义学院为培训主阵地,组织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教师深挖地方统战资源、开发特色课程,逐步建立起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参政议政等具有特色的优势学科。同时,开展社会调查、现场教学、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等,进一步提高培训的效果。

2. 加强实践锻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用是最好的培养”,我们要通过多岗位实践锻炼来提高党外代表人士的综合能力。一是尽量为党外代表人士创造实践锻炼的机会,选派年轻有为的党外代表人士到基层考察调研和挂职锻炼,让他们在基层工作的实践中体验和锤炼,不断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相互之间合作共事的能力。对于出实绩的党外代表人士要进行实职安

^①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发〔2012〕4号),2012年2月23日, http://www.gov.cn/jrzq/2012-02/23/content_2075139.htm, 2021年4月20日。

排，并有意识地将其放到重要岗位进行锻炼，帮助他们在实践中砥砺品格和增长才干，从而提升综合素质。二是使党外干部挂职实践锻炼制度化、规范化，市、县（区）两级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相互协商、共同合作，制定出党外干部挂职锻炼的推荐程序，形成基层（即县各民主党派委员会和党外代表人士所属单位）推荐，县（区）委统战部筛查把关，市委组织部和统战部相互协商后再选派，县（区）委统战部具体管理的工作制度，并专门成立市级党外干部挂职锻炼基地。

（三）加大党外代表人士选拔任用力度，合理使用人才

1. 为党外干部搭建任用平台。一是在选拔任用党外代表人士时，各级党委和党政领导要转变思想观念，对干部的安排使用要同等对待，不要认为党外人才匮乏，用没有合适职位安排来推托。严格按照《中共玉溪市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中规定的配备比例和任职数量执行，使党外干部的选拔和任用由“机遇型”向“机制型”转变。二是任用安排要落实到位，针对玉溪市政府部门党外干部配备未达标的现状，在充分把握各个政府部门特点及党外干部专业特长等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政府部门配备建议方案，明确必须配备党外干部的部门和建议配备党外干部的部门，为党委配备党外干部提供决策参考。

2. 完善选拔任用机制。一是丰富选拔方式。坚持以组织推荐为主，适度采用竞争上岗、公开选拔的方式对党外干部进行选拔和任用。市委组织部和统战部可根据工作需要，每年拿出适当岗位，公开选拔党外干部。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到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部门去寻找优秀党外人才，打破不同所有制、不同身份的局限，使优秀党外人才得到合理使用。二是完善党外干部协调机制，在党委领导下，统战部门与组织部门要互相支持、形成合力。要加强沟通协调，力争在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教育、培养、选拔、任用上合作共事和发挥作用，并在协作的各个环节中既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在党外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任用方面达成共识，避免培养与使用脱节的现象。

（四）健全党外代表人士监督管理机制，确保发挥作用

1. 明晰管理职责。党外代表人士人员分散、身份多样，容易出现多部门管理、职责划分不明确的问题。要实现科学管理，需尽快明确管理职责。一是坚持分类指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对同级党委有关部门、党外代表人士所属的党派团体、所在工作部门各自的管理职责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建立协同管理相关机制，形成责任清晰、各有重点、协调配合的工作格局，共同承担好管理监督的责任。二是明确主体责任。监督管理重在日常，要实现有效管理需明确责任主体。要充分发挥各级党派组织、各民主党派团体的作用，明确对党外代表人士负有监督的主体责任，各级党派组织、各民主党派团体要负责党外代表人士日常的思想政治引导，对党外代表人士参加活动的情况、为地方党委政府建言献策和参政议政的表现进行管理。

2. 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一是建立综合考核评价制度。根据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统战部门围绕思想政治表现、参政议政、合作共事能力、业绩表现、群众基础、廉洁自律等方面，结合党外代表人士不同界别的特点科学设置考核指标评价体系和评价等次（四级：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然后由统战部门牵头组织人大、政协、组织部、宣传部、各民主党派和有关部门组成考核小组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考核，考核依照分类评价的原则进行，考核结果与党外代表人士的选拔使用直接挂钩，对连续二年考核不合格的党外代表人士要及时进行调整。二是建立履职考核评价制度。针对人大、政协党外常委目前没有履职考核的情况，尽快建立履职考核评价制度、约谈制度、不称职委员退出制度，提高党外代表人士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使其发挥好作用。

责任编辑：念兴昌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与组织优势的效能优化

李旭辉¹，江生亮²

(1. 秦皇岛市政协，河北 秦皇岛 066000；2.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在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中，界别作为人民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充分发挥制度与组织优势，对彰显政协特色、推进政协履职至关重要。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便于社会各领域、阶层、行业、团体的利益表达，利于各社会阶层参与国家决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界别组织优势的充分发挥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基本依托，合法性使其在人民政协中的地位不断强化，与社会发展、多元治理的现实需求契合；专业性使其在人民政协中的能力不断强化，组织化水平提升、聚拢效应扩大、整体优势发挥与创新催生新发展、时代催生新使命的历史要求契合；拓展性使其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不断强化，不断扩大人民政协的团结面和包容性，与人民政协为人民的价值追求契合。在新发展阶段，在以新发展理念构建新人民政协发展大格局的进程中，要深入研究人民政协界别的制度与组织优势，工作实践中构建好界别制度体系、发挥好界别整体优势，充分体现界别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价值，不断探索与创新人民政协界别工作。坚持党对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开创党建引领人民政协界别工作新局面，党员委员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的全覆盖。

关键词：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党员委员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3-0060-11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①在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中，界别作为人民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充分发挥制度作用与组织优势，对彰显政协特色、推进政协履职至关重要。在新发展阶段，在以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要深入研究人民政协界别（以下简称政协界别）的制度作用与组织优势，通过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拓展大众的有序政治参与空间，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与创新政协界别工作。

一、政协界别的由来与概念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人民政协是唯一按界别组成的政治组织，从酝酿成立开始就带有明显

作者简介：李旭辉，秦皇岛市政协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区域经济与社会管理；江生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执政党的建设等。

^①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0日，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0/c_1125020851.htm，2021年5月6日。

“由界别组成”的色彩。人民政协的界别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组织中的具体划分形式,是人民政协的组成单位,是区别于我国其他政治组织的显著特点,是人民政协性质的重要表现形式。^①界别是人民政协的显著特色、突出优势,作为主要的会议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工作载体,首要的是在其由来的基础上厘清其概念与范畴。

(一) 政协界别的由来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134名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特邀人士)共662人参加了会议。^②人民政协成立之初的“单位”(也称为“组成单位”或“代表单位”)是“界别”的雏形,当时有46个“单位”(候补代表77人没有计入),其中党派占14个、区域占9个、军队占6个、团体占16个,特邀人士记为1个“单位”。同时,由于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与会“单位”较多也是当时政治的需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界别单位调整到29个,区域、军队代表不再参加人民政协组织。以界别单位组成的人民政协成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与一元主导下的国家治理格局相适应,并积极发挥其职能与作用。在人民政协搭建民主协商平台、促进政党政治参与的进程中,界别单位的作用与优势不断得到发挥和重视。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一章第一条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基础组成”。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为主体的界别单位是人民政协成立之初就有的组织形式,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政协的性质与定位、职能与作用。毛泽东主席指出过,“政协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③,所以,政协委员的党派、团体性,即界别性,是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人员的显著特征,也奠定了人民政协组织优势的基础。

(二) 政协界别概念辨析

“界别”一词,古有“边界告别”之礼、“以界别区域”之喻,今取“界”的“分界”“别”的“类别”之意,“界别”是“类别的划分”的表达。人民政协最初建立时,是希冀通过一个“多阶级联合政党”来获得政治合法性,从而按照“政协一政府”的顺序制宪建国,“社会各界”即被称为“参加单位”,“参加单位”即政协界别的前身,就此来看,政协的界别大致是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划分和区别。^④初期的人民政协,组成单位的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其他有关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界别,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行业或职业等代表人士有序成为政协委员,被划为相应的界别,界别的设置也在与之变化与调整。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人民政协不断壮大,界别名称力图求精,界别数量总体增加,特别是“界别”一词正式提出。20世纪80年代由中共中央提出并经与各方面协商确定的政协委员名单,把所有政协的“参加单位”称为“界别”。李瑞环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曾明确提出:“人民政协由界别组成,政协委员是各个界别的代表。”^⑤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修正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设若干界别”。在新的世纪,“界别”一词释义更加明晰,而且在工作中“横向独立性、纵向专业性、内部联系性”更强。应该说,“界别”作为我国的政治术语,其概念更加成熟,是参加人民政协的

① 刘兰欣:《浅析人民政协界别设置》,《天津政协》2012年第2期,第13—17页。

② 李旭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探索、实践与发展》,《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学术研究》2014年第4期,29—32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5页。

④ 史健榕:《人民政协界别设置的历史调整与思考》,《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69—72页。

⑤ 郑宪:《关于人民政协界别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9—13页。

各个党派、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组织中的具体划分形式，也是政协会议的特定组织形式，反映爱国统一战线的各个组成部分^①。界别是人民政协组织的形成基础，是人民政协性质的集中反映和有效的工作载体，是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是政协委员发挥主体作用的平台，其作用与优势与生俱来，而且在发展中不断强化，凸显人民政协工作特色。

二、政协界别的制度作用与组织优势

政协界别是执政党发扬参与式民主理念的基本单位。^②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全面深化，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各阶层在分化与组合的变动中利益关系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通过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特别是以界别为依托与纽带，“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空间”，更好地围绕中心、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参政议政，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人民政协力量。

（一）政协界别的制度作用

人民政协的各界别来源于、代表、联系着不同的领域、阶层、行业、团体。界别是人民政协为进行有组织、有选择和有分类的政治吸纳而设置的基本组织框架，界别吸纳的动力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党和国家根据政策需要，主动设置相关界别，吸纳相应的社会精英人士，体现为政策导向性。二是党和国家在社会政治参与的需要和压力下进行吸纳，满足社会政治参与的需要，体现为政策适应性。^③界别的设置与发展直接作用和影响人民政协的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界别吸纳整体上表现为人民政协吸纳。政协界别的制度作用，主要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通过人民政协搭建渠道、平台，使人民群众能够公开、透明、合法、有效地进行有序政治参与。通过政协界别制度的实践，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各层次各领域不断扩大，“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人心凝聚，力量汇聚，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充满活力、蓬勃发展。人民政协以界别为基础，充分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彰显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努力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美同心圆。

1. 界别制度为社会各界的利益表达提供渠道、搭建平台

人民政协的性质与定位决定了政协界别制度所承载的利益表达机制，在服务 and 畅通各民族、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展现出如下重要特点。具有多样性，充分反映社会各界的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具有政治性，其基本立足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具有包容性，其已成为各种意见交流、交锋、交融的重要渠道、平台；具有整合性，对所吸纳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输入。^④人民政协在社会利益表达方面的优势和地位，保障了界别政治参与的通畅，扩大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空间，最终推动各方利益协调整合，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政协界别制度有利于协调、化解社会各阶层、群体的人民群众在观念、利益、主张等诸方面的冲突、矛盾，推动社会各方面实现沟通互动、协同整合。一是界别代表（即政协委员）能够在议事进程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各界别在相互尊重中表达观点、交流思想，通过“民声”述“民困”、集“民智”，实现各民族、阶层、群体都能够在国家政治架构中表达自己愿望和诉求。二是政协各界别地位平等、机会平等，能够保障其利益得到表达。人民政协各个界别在政治权利上没有大小、强弱之分，没有多数派和少数

^① 熊必军：《参与式民主理论对人民政协制度界别设置的启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57—60页。

^② 李后强、郭丹、陈兰馨：《政协界别变迁：中国共产党政治吸纳能力的一个研究视角》，《邓小平研究》2018年第1期，第47—59页。

^③ 董树彬、董鹏林：《政治吸纳视阈下人民政协界别变迁与优化》，《中州学刊》2019年第8期，第1—8页。

^④ 钱胜：《发挥政协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与途径》，《中国政协》2012年第2期，第32—38页。

派,所有界别都具有平等地位。^①三是界别的设置在调整与优化,尽可能将各阶层,特别是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等代表纳入其中。政协委员的产生与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相匹配,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员状况相链接,所以委员的产生、界别的吸纳将增强人民政协的人民性,更好地整合、沟通、表达和协调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

2. 界别制度有利于社会各界参与国家决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治理整体效能提升

界别是人民政协协商议政、开展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协商民主的动力源,具有统一战线组成部分的政治地位,与社会纵向的概念不尽相同,却能够从中看到社会结构的“横切面”。我国政治制度中,人大代表由区域选举的代表组成,具有表达区域利益的功能;政协委员不按区域选举产生而是按界别协商产生,这样产生的委员可以不受地域和人口比例的限制,最广泛地包容各方面的代表人士,从而使政协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政治上最大的包容性,具有表达界别利益的功能。^②由于人民政协在功能上侧重于对政策方针的谋划协商,在制度上又囊括了社会各个方面,因此在效果上与人大构成了“条”与“块”的有机结合。与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人大票决制民主形式不同的是,人民政协实行的是既尊重多数又照顾少数的协商民主形式^③,政协界别协商的优势较为突出。社会的稳定需要国家与社会的交流、社会内部信息的流动,国家要时刻准备接受社会信息,倾听人民的要求,并为之作出反馈。^④社会阶层构成变化进程中,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需要国家高度重视与妥善解决,构建利益多元化新格局。各界别代表人士的政治参与、权益诉求、建言献策,将社会力量与公共权力有效平衡,社会管理的广泛联合能力不断提升。政协界别不仅是国家与社会阶层之间沟通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且能够增强其阶层内凝聚力,加强阶层间沟通与团结,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绘就最大同心圆。同时,政协界别的“条带型”代表性,易产生“聚拢效应”,能够真正地将各方人士的智力能力汇集起来、热情能动调动起来,并以界别组织资源为基础,把经济资源、文化(技术)资源等条带分布交织的倍加效能发挥出来。

3. 界别制度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毛泽东领导创建的新中国政治属性突出地表现为“人民性”,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广泛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⑤人民政协的人民性在界别制度方面表现突出,界别是人民政协的群众基础,在新中国建立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与时俱进。一是政协界别的设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高度契合。界别的设置始终回应着社会变化,根据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化,适时微调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并且始终顺应着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界别调整始终是渐进完善的过程,伴随着一次次变化,界别的包容性、广泛性和代表性优势愈见凸显。^⑥二是政协界别的侧重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相呼应。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各界别委员的协商讨论,决定了我国的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事项,这是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历史使命。在人民政协成立初期,其通过在各种会议中开展的界别协商建言议事,“先后协商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案、讨论了重要问题,组织民主爱国人士参加土地改革等运动,组织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等”。“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从一开始就根植于人民政协的制度设计之中……为恢

① 李火林:《论政协的界别民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第100—103页。

② 郑究:《关于人民政协界别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9—13页。

③ 王立京:《中国公民参与制度化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

④ 高秉雄、张江涛:《人民政协界别:变迁与改革》,《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第60—65页。

⑤ 唐洲雁:《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光明日报》2013年1月11日,第1版。

⑥ 赵彤:《人民政协界别建设的发展历程》,《人民政协报》2014年9月20日,第18版。

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为中华民族站起来作出了重要贡献。”^①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尽可能团结一切力量、动员一切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民主生活,成为政协的新任务。^②在改革时期,政协界别协商焕发出蓬勃生机,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原则指导下,各界别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激发,在重大课题研究、重大决策协商、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为中华民族富起来提供了强大力量”^③。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政协的历程,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始终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向推进,相互促进。改革开放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人民政协为改革开放凝心聚力献计出力,两者关系密切,荣辱与共。^④三是界别的关注在为社会关切与群众期待“鼓”与“呼”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政协界别广泛、积极、有序地参与国事,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促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以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收到的提案为例:二届二次会议收到提案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科学技术和文教卫生方面的占67.2%;关于政治法律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占12.8%。^⑤八届五次提案中经济建设方面占42.3%;科教文卫体方面占30.8%;政法、统战、人事方面占26.9%。^⑥十三届三次会议立案的提案中,经济建设方面占38.32%;政治建设方面占11.05%;文化建设方面占8.33%;社会建设方面占31.97%;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占7.32%。^⑦各界别总提案数量增加的同时,其所关注焦点的范畴在扩展,从政治建设,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提案如此,社情民意也是相同,维护群众利益的同时促进事业发展。

(二) 政协界别的组织优势

界别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个党派、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组织中的具体划分形式,也是政协会议的基本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每一个界别都由一定数量的特定委员所组成,同一界别的委员一般都具有大体相似的身份、职业特征,联系和代表着特定领域的群众。^⑧界别的优势,根本在于其组织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在一元主导下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中,界别是人民政协“大系统”与委员“小细胞”间天然的、必需的、不可替代的“组织”。但界别组织本身不属于一级政治组织,不具备政治组织存续和运行所需要的要义,然而其能够以相关的规章和制度等机制,在人民政协给予一定的人财物力支持下,在党政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开展一定工作。界别是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主体,界别的组织性纽带作用、络合意义是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优势和特点的基础,界别组织优势的充分发挥将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基本依托所在。

1. 界别的合法性使其在人民政协中的地位不断强化,与社会发展、多元治理的现实需求契合

人民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⑨政协委员(即代表人士)所在界

^① 人民政协网:《秉持初心的双向发力》,2018年12月18日, <http://www.rmzxb.com.cn/c/2018-12-18/2244419.shtml>, 2021年5月23日。

^② 人民政协网:《秉持初心的双向发力》。

^③ 人民政协网:《秉持初心的双向发力》。

^④ 王翔:《人民政协在参与改革开放中实现自我发展》,《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第22—25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提案审查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2月8日,第3版。

^⑥ 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八届五次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3月13日,第2版。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人民日报》2020年5月28日,第4版。

^⑧ 郭丽兰:《界别协商的主体问题浅议》,《党政干部学刊》2013年第5期,第18—21页。

^⑨ 毛泽东:《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4—385页。

别的党派性、团体性是人民政协构成的显著特征。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事业的重要载体，其诞生之时就肩负起重大的历史使命，“统战是第一功能，团结是第一主题”。人民政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但人民政协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肩负一项共同的政治任务，即凝聚人心，构建和巩固各社会阶层的政治共识。^①人民政协以界别为基础，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着最广泛的联系，努力画出最大同心圆。界别植根于人民大众，能够倾听基层的呼声、体察群众的情绪、了解各种矛盾和问题，以界别为纽带、桥梁，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载体和抓手，也是推动社会治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方法^②。界别的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人民政协，特别是各个界别，积极参与各类协商议事，贡献智力与力量，将“参与国是”和沉到基层、服务群众统筹起来、融合起来，推动基层群众“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是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要求，也是对协商民主价值与应用的深化。社会治理的内容增多、重心下沉急需平台拓展、主体多元，人民政协的各个界别参与基层不同领域的协商，能够推动基层协商在理念、手段等方面发展创新，通过利益协调、矛盾消融、凝聚共识汇聚社会发展的群众力量。此外，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要求政治体制、机制作出相应的回应，而政协界别的整合功能较好地协调了社会利益的分歧和博弈，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团结。^③

2. 界别的专业性使其在人民政协中的能力不断强化，组织化水平提升、聚拢效应扩大、整体优势更好发挥，与创新催生新发展、时代催生新使命的历史要求契合

人民政协的各界别广泛联系着各自的群众，代表其利益、表达其主张。在不同群体的意见表达和认知交换中，利益诉求越充分、越完整，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意义就越重大，同时使国家治理能力得到进一步整合和汇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变化，深入研究更好发挥政协界别作用的思路和办法，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空间”。^④界别利益与诉求的表达是界别的基本权益，也是人民政协任务、作用的应有之义。界别凝心聚力、服务大局的优势和作用，在其履职中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显著、越来越重要。界别联系着社会的各个方面，界别利益代表的同一性、成员关系的密切性、作用角度的差异性、专业上的互补性、构成上的动态性、身份上的双重性，决定了界别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界别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有较高的文化层次、较强的专业知识、较多的共同语言，容易形成共识、凝聚集体智慧，既具有专业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科学性又有代表性，建言献策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⑤

促进发展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新时代，人民政协站在了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的第一线。各界别委员遵循服从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的原则，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监督监在关键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界别的议事范畴在广度上扩大、深度上增加，问题的提出与协商越来越专门、细化、深入，专业性更加突出，界别的专业优势、智力支持优势愈发突显和重要。各界别政协委员始终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以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履职尽责，找准定位、选好角度，在界别内协商、界别间协商等参政议事活动中建真言献良策，发表真知灼见、勇于担当，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上凸显人民政协人才荟萃和智力密集的特色、人才库与智囊团的优势，展现人民政协新时代的大作为、新篇章。

① 潘维：《人民政协的优势在于凝聚人心》，《人民日报》2018年12月5日，第20版。

② 吕忠梅：《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人民日报》2020年5月19日，第9版。

③ 马向萌：《协商民主理论对人民政协界别设置的启示》，《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第78—80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1日，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1/c_1112564804.htm，2021年5月23日。

⑤ 陈祖涛：《充分发挥政协界别作用积极服务“四个荆门”建设》，《荆门日报》2012年12月29日，第3版。

3. 界别的拓展性使其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不断强化,不断扩大人民政协的团结面和包容性,与人民政协为人民的价值追求契合

人民政协与时俱进的发展,既遵循国家治理的要求,又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其组织构成本身,具有代表人民的特质,人民政协的人民性来源于政协委员的界别代表性。^①界别的代表性、包容性越大,大众通过人民政协所体现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越广泛、真实与管用,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奠定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人民政协联系群众、团结群众、服务群众的基本载体是界别,只有界别发展、优化、壮大,人民政协联系群众、团结各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才会真正体现,最终实现多元社会结构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体系的稳定。一是界别的精英性在减弱、草根性在增强,界别向各个阶层拓展,人民政协的团结面扩大、人民性突出。社会各界群众的各类声音通过界别的建议整合、人民政协的民意表达,使得被听得到、听得清、听得准。其次,界别的“条带型”功效加强,联系的深度在加大,汇集民智、凝聚民心,共创美好生活。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考察调研时强调“政协委员要更好联系和服务所在界别的群众”。^②界别通过委员主体作用的发挥,主动走进基层群众中,一方面可以正向引导基层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也能够为群众的逆向参与提供平台和载体,有效地缩短利益表达与民意获取、利益整合的时空距离,有效发展基层民主协商。^③而且,界别的条性特征使得纵向促进相似类资源整合、横向加紧各业态项目交织,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利于要素的流动性配置,更好地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再次,界别的拓展性使得人民政协功能不断延伸和发挥,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通过界别的拓展,社会各力量都能够参与到公共管理、现代治理中。人民政协以界别将多元力量凝聚,体现其包容的政治性、民主的人民性。界别扩大了人民政协的团结面和包容性,与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元一体社会结构相适宜,正向作用于人民事业发展,归根结底是“人民政协为人民”。

三、新时代政协界别制度优势的效能优化路径

界别是组成人民政协的基本单位,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是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行职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依托。^④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切实把握界别工作正确方向,健全制度机制,完善平台载体,开创政协界别工作新格局,更好发挥其作用和优势。

(一) 政协界别制度体系构建与整体优势发挥

当前,在各级政协组织中,一些界别委员的地域、行业分布不够均衡,在联系界别群众、强化政治引领等方面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界别组织化程度不一,不少界别缺乏组织依托,显得过于松散,在落实党的政策主张、执行组织决议决定等方面缺乏有效载体和具体抓手。^⑤界别“联系一界、团结一片”的作用发挥,“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的双向发力,需要制度体系的构建,以制度完善功能、规范程序、顺畅关系、提升保障、促进发展,体现特色优势,彰显整体效能。

1. 界别设置要在调整中优化

(1) 优化政协委员产生机制和委员结构。人民政协工作的实力在委员,政协界别的作用在委

^① 于雁:《论人民政协的人民性及其民意表达与整合功能》,《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第47—52页。

^② 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国务院公报》,2020年第27号(9月17日),第9—11页。

^③ 刘佳义:《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解放日报》2019年9月19日,第10版。

^④ 董云虎:《论新时代健全发挥界别作用的工作机制》,《中国政协》2018年第19期,第20—21页。

^⑤ 张昌尔:《以最大优势引领界别特色在“双向发力”中彰显制度优势》,《人民政协报》2019年3月3日,第5版。

员、活力在委员。政协界别建设的基础是政协委员。政协委员通过提名协商的途径产生，以界别的形式来开展各项活动。从一定程度上来看，政协委员的产生科学性、规范性不足，具有一定松散性，约束力较差。为此，一是要完善政协委员推荐遴选机制，并制定政协委员产生的法规，积极探索政协委员届中的考察调整，尝试政协委员候补制度等。二是政协委员的产生要顾及甚至是倾向于基层一线，适当减少精英委员的数量，以代表性强、结构合理、素质较高为遴选政协委员的基本要求，奠定政协界别设置优化的基础。

(2) 优化政协界别结构设置和界别工作机制。目前，有些界别的确存在缺乏标准、边界模糊、交叉重叠的问题。应通过调整界别设置，在相对稳定中适时改革，在相对趋同的界别中，将差异进一步有序归类，更好体现界别特色，从而加强各族各界、各阶层、各群体政协委员的代表性，进一步畅通其利益表达渠道。尤其是通过对界别设置和工作机制的不断优化，使弱势群体、新兴阶层的诉求更及时、充分地反映到政治系统中，促进各阶层各领域群体权利的调整和均衡。界别设置的优化调整应在深刻理解界别内涵、详细熟知界别历史、全面把握界别现状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有计划地分步骤、分阶段进行，以调整界别吸纳深度广度为主，调整界别数量和划分为辅。调整和优化界别设置应遵循“基本主体稳定、新生力量适时补充、界别内部构成适当优化”的原则；把握精英与大众、个体与群体、界别身份与协商能力、界别组织化与界别代表功能之间的关系，真正发挥界别的民主价值功能^①，充分保证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始终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包容性。

2. 界别建设要在规范中提升

界别特色与作用的彰显，其根基在于界别建设。推进界别建设要着力在界别活动与界别协商两大方面努力。界别活动“活起来、实起来、强起来”需制度上规范、程序上完善、保障上充分。建设以会议（全会、常委会等）为主要平台，以提案、社情民意等为重要载体，以管理制度为基本遵循，以“界别+”为拓展的界别活动体系与工作机制，确保界别活动有序、活泼地开展。以专门委员会为重要依托，不断完善界别联系制度、召集人制度等，使得界别活动有人民政协的关注与支持、相关单位和部门的协助与配合、基层界别群众的欢迎与参与，不断提升界别的组织化水平。人民政协的专委会及机关办公室要在统筹协调、协调联动、保障服务方面不断规范，形成界别作用发挥的合力。《界别工作条例》《界别活动办法》《界别履职考核办法》等规章要不断细化、求实，使得界别工作活动有载体、有抓手、有渠道、有成效。在新形势条件下，运用网络等现代技术，以界别微信群、云会议等开展网络活动、远程议政，以“云履职”助力界别建设、提升其能力与水平。

应加强以界别为基本单位，组织开展各类协商建言、参政议事，扩大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一要重视界别内协商，各界别就事关本界别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或本界别普遍性利益诉求，进行协商议政，提出本界别意见建议。二要丰富界别间协商，在各自表达“界别意见”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和交流，形成界别间的共识。三要优化界别外协商，加强与党政领导、职能部门协商，逐步建立以界别为基础、以委员为主体、以专委会为依托、以专题为内容、以对口为纽带、以座谈为主要方法的协商形式，实现协商规范化。^②

3. 政协界别工作要在创新中拓展

政协界别工作创新拓展，一是应选好配强界别召集人，发挥好其作用，在界别委员的共同努力下积极探索开展界别履职活动的有效途径和方式。界别召集人应代表性强、影响力大、组织能力强、综合素质高，是本界别的知名人士、热心人士，在界别活动中能够处于领导地位。界别召集人不局限于一人，应被赋予一定的工作权利、相应的政治地位，一般是由政协常委、相关专委会

^① 刘菊香：《从协商民主理论看人民政协界别设置的优化》，《理论导刊》2014年第9期，第10—13页。

^② 宋文豹：《推动界别工作质量提升激发政协工作新活力》，《中国政协》2018年第14期，第43—44页。

会副主任（最好是不驻会的委员副主任）等担任。在界别召集人工作中，若能够配设联络员协助召集人，工作效果更好，有利于增强工作的组织性。二是界别工作与相关的专委会工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虽然侧重有所不同，但能够而且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优势互补、整合资源，共同开展视察调研、举办专题座谈等。界别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专委会、联合专委会，但不能被专委会领导，更不能被代替。三是界别工作宜突出特色，不断拓展界别活动空间，在充分利用提案、考察调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会议发言等传统载体的基础上开展好界别联谊会、界别情况通报会、界别经验交流会等。四是应不断拓展社情民意表达空间，通过网络新媒体以及大数据广泛征集社情民意并做好梳理、分析、综合工作，及时、准确反映给政府相关部门。五是应不断拓展界别委员建言议政空间，凸显界别在参政议政中的重要地位。^①六是界别工作应充分发挥其专业性、独立性、联系性强的优势。“纵向专业性强”的优势使得其在人民政协“智囊团”建设上有基础，应当有所作为、可以有所作为；“横向独立性强”的优势使得其在人民政协“大家庭”生活中有归属，能够不断畅所欲言、做好代言、勇建诤言，在界别间协商中表达诉求、争取利益，界别间学习中交流思想、凝聚共识，界别间借鉴中优化格局、拓展范围；“上下内外联系性强”的优势使得其在人民政协“直通车”信息报送中及时收集高质量社情民意，在紧密联系团结服务基层群众中触角延伸“最后一百米”，获得真实信息，听到民声、了解民意，通过第一手资料促进党和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公平公正。

界别工作应充分彰显特性，强化界别意识，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界别工作在推动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界别履职参政要在参与中支持、在支持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督。

（二）政协界别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优势效能发挥

政协界别是扩大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其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不言而喻。政协界别，在设置中与社会结构变化和政治发展的要求密切联系，体现的是界别的历史属性、社会属性和组织属性；在实践中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和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有机作用，凸显的是界别的包容性、拓展性，反映的是人民政协的人民性。界别工作“活起来”“实起来”“强起来”，需要充分发挥和提升其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价值所蕴涵的巨大效能，更好发挥界别作为人民政协创新重要依托的作用。

1. 正确认识政协界别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优势

人民政协制度充分体现了统战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创新与发展。界别作为人民政协基本组成单位，是历史任务和时代要求，其政治属性明显，而且特色突出。政协界别是执政党领导政协发扬参与式民主的重要基本单位，反映了各行各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参与；发挥界别作用直接关系到人民政协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实现，关系到人民政协的政治地位，关系到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实现执政目标，其重要性不容忽视。^②界别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主要承担者，界别活动遵循人民政协组织的宗旨，以会议、调研、视察、考察、建言等有序政治参与，是组织性和政治性较强的人民政协委员集体履职的重要形式与载体，其目的是促进团结和民主、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要充分发挥界别在政协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界别不仅体现人民政协参与单位的广泛性，还应体现不同特色政治力量的代表性；界别的政治协商主体地位要突出，以强化界别整体的政治属性、政治作用。^③

政协界别是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力的特殊群体，广泛联系和代表各自界

^① 周青山、俞玲：《人民政协界别设置及其作用发挥研究（二）——人民政协界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建议》，《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36—40页。

^② 李后强、郭丹、陈兰馨：《政协界别变迁：中国共产党政治吸纳能力的一个研究视角》，《邓小平研究》2018年第1期，第47—59页。

^③ 伍龙章：《充分发挥政协界别作用》，《人民日报》2006年3月24日，第13版。

别的群众。政协各界别分别代表着人民群众中某一方面多数人的利益，其整体上已形成纵向触底、横向达边的组织化发展，便于系统地、综合地表达社会各界别群众中分散的、零碎的意见建议。界别的设置原则上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优化过程与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变化相呼应，以不断使人民政协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社会性是界别的自有属性。界别是党和政府与人民大众双向沟通的桥梁与纽带，其承担的代表性、倡导性功能要发挥好。界别要组织委员发挥自我特长、奉献自己爱心，多为社会发展做贡献，强化社会属性，同时提高人民政协及其界别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界别工作效能

界别由界别委员组成，不同的界别代表的社会基础存在较大差别，政治参与的研究表明来自不同群体的政治参与者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政治效能感不同。^①界别的效能发挥首先要强化以界别为单位的聚集问题，提高界别的组织性与凝聚力。一是要将委员的个体优势转化为界别的整体效能。界别委员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有政治担当；必须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有责任担当；必须准确把握履职方式方法，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有能力担当，要将个体化、分散化的委员作用形成整体合力，共同“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二是要在“说得对”“说得准”“说得好”上下功夫，在增进共识、凝聚人心、服务社会上求实效。界别的横向独立性、纵向专业性、内部联系性的特点是人民政协参政、建言、监督的基础与保障。人民政协各个界别要有参与政协工作热情，参与协商议政的激情，参与民主监督的温情，参与发展的豪情，积极主动作为，紧紧社会经济工作的中心，建好发展之言，立好发展之论，谋好发展之策。特别是结合各行业实际和本界别的所长，在专题调研上求“深”，在视察上求“真”，在提案工作上求“精”，在社情民意上求“实”，在团结联谊上求“广”。三是要加强界别间沟通，切实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社会各阶层间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议事协商需要人民政协搭建常态长效界别协商平台。界别协商，尤其是界别间协商就是要便于社会各领域、阶层、行业、团体的利益表达，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进程中消除误解、化解矛盾，营造更加和谐、更加顺畅的社会环境。

3. 政协界别不能够党派化发展

界别履职实效的增强，既要分类施策，又要协调联动，彰显特色优势中发挥整体功能。各个界别的组织基础、履职方式、承担功能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区别、是特点。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成为人民政协各党派团体界别的重要组织依托。各民主党派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演进中，在组织发展方面明确了各自的重点“分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党派的界别特色，这是现实履职的需要，也是发挥民主党派统战功能、扩大政党制度包容性的需要。^②人民政协各党派团体界别的工作与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工作有部分的重叠、一定的交叉，要有机地结合、有效地协作，但不能将界别工作与党派工作等同，更不能以党派工作取代界别工作或使界别工作党派化发展。非党派团体界别不能够一味地照搬、模仿党派团体界别的建设。同时，非党派界别绝不能对界别工作做党派式要求、将界别建设党派化发展。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与界别建设两者应分别遵循各自的规律与要求。

界别建设应充分体现界别特点、正确行使政治权利。各个界别的建设发展，一是要强调其包容性、发展性。不过度强调界别界限的准确性，不过度强调界别身份的固定性，这样有利于增强界别基础的广泛性、代表性。二是要强调其社会属性，发挥好界别作为扩大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

^① 李鹏：《人民政协界别设置对界别委员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基于广东省M市政协委员的问卷调查研究》，《特区实践与理论》2016年第1期，第68—73页。

^② 黄天柱：《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界别特色的形成演变及理论思考》，《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50—57，61页。

与的重要渠道作用。三是要强调其历史性、现实性。界别在一定程度实现了人民政协政治吸纳功能,但非党派界别不能像民主党派那样拥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因为界别吸纳框架、吸纳动力和吸纳策略不断调适能够满足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需求。

(三) 加强党对政协界别建设和发展的领导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人民政协的本质要求,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规矩;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最根本的是务必始终坚持党对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①政协界别作为社会各界利益的代表和扩大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必须加强党对其建设和发展的领导。

1. 开创党建引领政协界别工作新局面

政协界别建设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在界别工作中讲政治、讲大局、讲奉献,不断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按照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要求,“支部建在界别上,委员聚在党旗下,政治建设摆首位,思想引领全覆盖”。在各界别建立党支部,“政治上统领、思想上引领、行动上带领”。将党支部建在界别是人民政协系统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无盲区”的有力抓手,要推动界别学习往心里走、界别建设往深里走、界别工作往实里走。要健全工作制度、丰富党建活动、完善相关机制。不断完善联系界别工作制度,健全政协主席会议指导界别工作、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联系界别、参加活动等机制。探索建立政协党组成员联系相关界别党员委员、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制度;实行党员委员组织关系一方隶属、参加双重组织生活的办法,组织和引导党员委员自觉接受政协党组织教育管理和参加政协党组织活动、进行党性锻炼。^②对民主党派界别,要坚持加强政治引领,引导其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统一战线历史、人民政协历史、党派历史的结合学习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尝试界别间结对子,共同聚焦中心工作、提高履职水平,实现政协工作与党派工作整体联动、同频共振,不断推进民主党派界别建设和发展。

2. 加强党员委员参加双重组织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

在界别党员委员中建立界别党组织,是参照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的工作创新,是完善人民政协党的组织体系、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全覆盖的重要措施。但在工作中要注重“党员委员组织关系一方隶属”,一般是在原编入党支部、小组,需要隶属方同意或其上级党委要求(或允许)“双重组织生活”。界别党组织在性质上是临时党支部,但期限较长,而且不同于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民主生活会的党委(党组)。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的党委(党组)与党支部(小组)一般是上下所属关系,几乎没有跨度。界别党员委员的界别党组织(党支部或党小组)与原隶属方跨度较大,需要在程序上合规、严谨,各级政协所在的地方党委要制定工作实施意见,在本域范围内同意或要求“党员委员组织关系一方隶属”与“双重组织生活”,同级政协党组出台关于党员委员参加双重组织生活的办法。也可以由各级政协所在的地方党委正式授权同级政协党组出台关于党员委员参加双重组织生活的办法。加强领导、严格程序,通过界别党组织建立,将党的组织力量与人民政协的界别组织力量有机组合起来,激发更大的发展活力,同时以党员委员参加双重组织生活,推进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彰显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与时代性。

责任编辑:罗雷

^① 乔传秀:《坚持党对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中国政协》2018年第11期,第46—47页。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8年10月14日, www.gov.cn/zhengce/2018-10/14/content_5330653.htm, 2021年3月5日。

新时代协商民主：逻辑、理论特征与实践价值

周宗耀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新时代协商民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本质属性，有如下逻辑基础。其历史逻辑根源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等各个历史时期弘扬民主理念、建构民主制度、推动民主实践的探索；理论逻辑上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实践逻辑上是立足现实问题、直面新挑战、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而不断完善的产物。新时代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糅合中国传统文化、巩固人民当家做主所构建的完整体系，具有历史传承与现实创新相一致、制度建构与实践探索相符合、精英推动与民众参与相统一、民族特色与世界意义相融合的鲜明理论特征。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强大动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

关键词：新时代协商民主；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协商机制；人民当家作主；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3-0071-11

新时代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凸显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势所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大命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①的建设目标、习近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和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就新时代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坚实基础、制度架构、理论特征、实践路径等进行了总体规划，为新时代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擘画了发展方向和路线图。

深入推进新时代协商民主建设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既需要在观念上弄清楚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又需要在行动上推动协商民主的制度探索；既需要从理论上阐释好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又需要在实践中增强协商民主的现实功能；既需要按照路线图构建整体性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又要善于将制度体系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化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研究，客观把握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抓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探索的重点和关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体系研究”(19JZD026)。

作者简介：周宗耀，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党内法规。

^①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2月10日，第1版。

一、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四重逻辑

新时代协商民主是基于中国发展现实、为解决新时代民主政治现存问题形成的理论体系,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蕴含着缜密的内在逻辑,成为推动新时代协商民主不断完善的动力源泉。新时代协商民主具有丰富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制度逻辑,使之成为有独特“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制度基础”^①的制度体系。

(一) 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历史逻辑

新时代协商民主的生成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息息相关。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其蕴含的历史逻辑根源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弘扬民主理念、建构民主制度、推动民主实践的积极探索。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维系和调整各革命党派关系的实践奠定了协商民主的基础。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主张“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②,为中共二大提出“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奠定基础。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③,为“三三制”民主政权奠定基础。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首次提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原则,并强调党员“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④。193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同月10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强调:“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吸收进来。”^⑤同时,陕甘宁边区制定民族、宗教政策,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很多党外进步人士积极参与到“三三制”政权机构中,为边区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协商完善作出巨大贡献。

2. 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协商的实践,直接推动协商民主发展成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⑥“五一”口号的发布开启了新政协会议和协商建国的序幕。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顺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周恩来在人民政协已有的机构基础上,“建议建立几个工作小组,在常务委员会指导和秘书长的具体领导下,使全国政协工作能够分类进行”^⑦,进一步完善了人民政协的组织构成和工作机制。1950年3月1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举行各民主党派座谈会,每两周一次”^⑧,因而命名为双周座谈会,常态发挥各民主党派作用。改革开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95页。

⑤ 陈云:《陈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0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3—284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页。

⑧ 许维宁:《李维汉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1页。

放后，人民政协切实履行政治协商职能，创新并广泛开展民主恳谈会、协商议事会等协商方式，使政治协商取得极大发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新时代协商民主的理论逻辑

新时代协商民主不是凭空捏造的，它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它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1. 新时代的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马克思强调广泛发扬民主，要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列宁根据俄国实际提出，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属于大多数人的政权”^①，明确了无产阶级政权拥有最广泛的民主。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强调在人民内部开展广泛民主活动，赋予人民广泛的自由权和选举权。二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马克思指出“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②，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列宁总结落后国家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③。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联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④，并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同样重视政党协商，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⑤ 列宁注重实行多党合作，主张要“同苏维埃中的少数派分享政权”，前提是“这个少数派必须诚心诚意地服从多数”^⑥。毛泽东认识到多党合作的重要性，提出“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⑦。

2. 新时代协商民主的直接理论来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民主，它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统一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最大程度地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在此基础上，协商民主开始向体系化、规范化发展。邓小平重视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十三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⑧ 概念，并强调“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⑨。江泽民总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来源，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协商制度化发展。胡锦涛强调要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⑩。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强调要加快制度化建设，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⑪。

3. 新时代协商民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宝库。人类在探索政治文明的实践中推动了民主的发展，西方社会发展了选举民主、代议制民主等多种民主形式。但是，由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社会结构的失衡和撕裂、极端民粹主义的兴起、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等，当前西方民主的实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新时代协商民主，因为强调发展最广泛的协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2页。

③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1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9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9页。

⑧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页。

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3页。

⑩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72页。

⑪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

商主体和领域、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保障各群体在协商中平等公正的地位,能够有效协商国家重大事务决策、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

(三) 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制度逻辑

新时代协商民主建立在规范的制度基础之上,稳定可持续的制度能够为民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坚实支撑。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是新中国成立后创造的政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的政治体制,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 人民政协制度是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制度根植于中国协商民主实践。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为民主政治发展开创了新局面,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①,体现了协商主体的广泛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新时代以来,人民政协制度在推动协商民主制度化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专门机构以及发扬人民民主的现实载体,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的实践过程正是将自身发展经验制度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制度先导的过程。由此,人民政协制度不仅是政协协商的制度来源,更是新时代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制度借鉴。

2. 新型政党制度是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制度基本构成要素。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政协联组会议上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概念。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有形式,是政党协商的制度根基和实践来源,同时也是发展完善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制度基元。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局势,党高度重视政党协商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对政党协商的定义、内涵、形式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明确了新时代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②。政党协商成为新时代协商民主的首要渠道,不仅由于政党协商在治国理政中具有重要作用,更由于它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制度支撑。

(四) 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实践逻辑

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为了解决时代问题和摆脱现实困境。新时代协商民主正是立足现实问题、直面新挑战、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而不断完善的产物。因此,新时代协商民主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1. 政党政治实践中的协商探索,在推动新时代协商民主发展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中明确了政党协商主要就党中央决策、宪法法律修改、国家事务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召开或委托召开政党协商会议达170余次,就党代会报告、宪法修改、国家发展规划等重大事项进行协商沟通;各民主党派深入参与政党协商,通过调研等形式形成书面建议730余件,为国家重大事务建言献策。^③同时,政协协商的主要内容也涉及国家大政方针。2020年全年举办重要协商活动23次,组织考察调研80项,开展多种多样的政协协商,共收到提案5974件,立案5044件,充分发挥政协协商在国家事务决策中的关键性作用。^④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稳定有效的协商机制,在推动新时代协商民主发展上发挥重要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5页。

② 《中办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1日,第1版。

③ 参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2021年6月25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6/25/c_1127596748.htm, 2021年6月26日。

④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21年3月11日,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1-03/11/c_139801690.htm, 2021年6月26日。

作用。

2. 政治决策实践中的协商机制，在促进政府科学民主决策、助力法治建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一，《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强调推进政府协商要“探索制定并公布协商事项目录、增强协商的广泛性针对性、完善政府协商机制”^①。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协商的实施意见》，详细规定了政府协商的主要形式、协商程序、保障机制等，重点强调了政府协商的主体范围。此外，赤峰、青岛等地方也出台了具体文件，推进政府协商向下落实。政府协商确保在决策前开展协商，巩固了人民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其二，随着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需要多方面吸纳立法意见，《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着重强调人大要“深入开展立法工作中的协商”。人大在立法方面的实践已经有了充足的经验和制度文本保障，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人大立法协商的具体形式进行了详细规定。此后，吉林、新疆、上海等省市区和长春、南京、济南等市形成了立法协商的相关规定，都是人大协商在立法上的实践经验。政府协商和人大协商主要关注政府决策和立法方面的机制实施，为政府决策和相关机构立法提供多样视角。

3. 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协商创新，在解决社会矛盾、正确处理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其一，人民团体协商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在组织社会协商和反映民众意愿上发挥重要作用。《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人民团体参与各协商渠道的工作机制。2016年9月印发的《全国妇联改革方案》强调，妇联代表要积极参与到人大、政协、政府协商等各类协商中。通过这种人民团体参与协商的形式，更好地处理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推动社会群体和谐发展。其二，社会组织协商的协商内容也聚焦社会治理，解决社会关系矛盾。浙江的“乡贤参事会协商文化村治模式”是社会组织协商的重要实践案例。2015年底，浙江省共有乡贤参事会1690个。截至2016年底，浙江诸暨市建立镇级乡贤参事会27个，村级乡贤参事会366个。^②浙江以乡贤组织为依托进行协商，构建平等共治的社会关系，使社会治理更加高效。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是与群众联系最紧密的两类组织，通过这两种协商渠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更加民主化、科学化。

4. 发扬基层民主实践中的协商范式，在扩大协商主体、拓展协商范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强调城乡社区协商是推动基层民主的重要举措，并对其作出了整体规划，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基层协商。北京、河南、江苏等地纷纷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并开展多样的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些典型案例，例如江苏的“有事好商量·民生专题协商议事月”、浙江温岭的“民生恳谈会”、广州的“村（居）民议事会议”等。这些协商实践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扩大了参与基层协商的主要群体，丰富了基层民主的实践形式。

二、新时代协商民主的理论特征

新时代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糅合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协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发扬社会民主、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制度体系，同时也为世界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因此，新时代协商民主具有历史传承与现实创新相一致、制度构建与实践探索相符合、精英推动与民众参与相统一、民族特色与世界意义相融合等特征。

（一）历史继承与现实创新相一致

新时代协商民主是中国内生性的民主形式，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协商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民主政治的现状发展形成的制度体系。首先，新时代协商民主的生成和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息息相关。协商民主“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

^①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2月10日，第1版。

^② 参见《浙江“乡贤参事会协商文化村治模式”获奖》，2016年12月18日，https://zjnews.zjol.com.cn/zjnews/zjxw/201612/t20161218_2201686.shtml，2021年6月26日。

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①，内含民本思想“以民为本”与和合思想“求同存异”的基本内核，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其次，新时代协商民主是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领域探索历程的继承。新时代协商民主是在党的百年实践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其在中国的制度构建至少可溯源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实践，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人民政协制度，完善于新时代践行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民主政治历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的硕果，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

同时，新时代协商民主立足实际问题，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民主形式，是立足于新时代新问题的民主政治体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愈加复杂，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多样化。在思想多元化、利益多层化的社会状况下，将马克思主义协商理论与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相结合，充分考虑不同的社会阶层，将人民政府、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等纳入协商体系中，不断创新协商民主的渠道，拓展为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七种渠道，发展完善了协商民主体系。

新时代协商民主是历史继承和时代创新相结合的产物。新时代协商民主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符合时代发展的思想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并不断完善发展而来的特有的民主形式。同时，新时代协商民主具有极强的现实关切性，充分融合当下社会多群体、多观念的复杂形势，将不同的利益主体统合到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之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二）制度建构与实践探索相符合

协商民主制度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势所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到了用制度体系驱动的关键节点，新时代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势必要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支撑社会主义民主全面发展。2015年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正式开启了新时代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序幕。随后，先后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施意见》，加快形成新时代协商民主的总体制度框架。在总制度框架的统筹下，各地就七种具体渠道制定制度文本，主要是以规范某一协商方式的实施意见为主，例如浙江省发布《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逐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协商制度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新时代协商民主体系建设的目标方向是要“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④，逐步形成范围广泛、体系完整的制度。

“制度的价值在于实践，实践可以在民众与制度之间建立起规范性的联系，从而增强民众对制度的认同和支持，也构建了制度本身的合法性。”^⑤新时代协商民主是实实在在运用于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是从解决新时代新问题的实践中探索得出的民主理论，是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制度实践。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实践内容丰富，充盈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是随着城乡社区人口的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④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⑤ 陈家刚：《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思考》，《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第47—56页。

逐渐增加，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推动基层协商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北京、江苏、浙江、河南等地方党委也印发相关文件，推动城乡社区基层协商不断完善，在基层开展民主恳谈会、社会协商对话会、民主听证会和民主评议会等，逐步形成覆盖基层治理的科学制度，构筑起基层协商的实践样板。二是政协协商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对于政府工作和选举民主无法顾及的部分，需要经常性地开展政协协商，解决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例如，贵州省就本省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召开省长与政协委员的协商对话会、民主评议政府工作，通过政府与政协委员的交流、讨论，就重大问题形成代表人民意见的决策报告，以利于重大决策的制定、修改和实施。

（三）精英推动与民众参与相统一

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我国协商民主的协商内容从政治议题向社会治理扩展，相应地，协商民主的主体也出现从精英群体向社会大众转变的趋势。但基于政治精英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背景等因素，他们仍在推动协商民主发展，民众则成为协商民主中最重要的主体。

精英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因子，具有稳定的协商流程和深厚的实践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协商民主形式主要就是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政治协商，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机构和制度性载体，其参与主体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代表等，仅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当时协商民主的实然更偏向于精英政治。改革开放以后，协商民主的协商范围逐步扩大，政治精英的压倒性主体地位开始发生改变，但在协商过程中，他们仍然是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这主要是由于政治精英对特定领域的知识和理论水平优于普通民众。政治精英也来自人民，是某一部人民的“民意代表”，因而协商民主中的精英参与可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若机制得当，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增强其民主性。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阶层间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增多，更多基层民众期盼参与社会决策和治理。为此，需从主体、渠道、目标等方面扩大民众参与社会协商的机会，促使民众广泛、有序参加政治生活。一是人民群众是协商的主体。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①。这就要求让广泛的民众参与到相关决策中，并且必须确保各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②。二是人民群众的协商渠道不断扩大。新时代协商民主作为最直接的民主形式，其渠道应该尽可能地扩大，涵盖数量最大、范围最广、层次最多的民众，要让群众能够尽可能表达自己的意愿。新时代协商民主拓展了七种协商渠道并在地方开展实践，基本覆盖了民众关心的领域，让民众可以多渠道反映意愿和寻求解决途径。三是实现人民美好愿望是协商的目标。协商民主是人民对国家重大事务和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在决策前、中、后开展广泛协商，进而凝聚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因此其必须始终以解决人民的问题为目标，同时也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统合到国家发展大局中，为国家发展建设提供动力和价值吸纳。

（四）民族特色与世界意义相融合

新时代协商民主的理论内核包含众多中国元素，并立足于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此外，新时代协商民主吸收借鉴了世界先进民主理论成果，是在应对国际环境和世界局势变化中发展的理论，因而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新时代协商民主的民族特色充分体现在其理论来源之中。就文化根源而言，新时代协商民主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政治文化因子，是“和合”“求同存异”等文化理念的传承与创新，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就历史根源而言，新时代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创新发展，其发展充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历史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特色政治领域的生动实践。就制度根源而言，新时代协商民主虽然对西方协商民主的有益成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1—292页。

② 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第85—91页。

果进行了借鉴,但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三三制”、人民政协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等是其最主要的制度来源,充满着中国智慧。就实践根源而言,新时代协商民主是在紧密结合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现状和国家治理情况,解决新时代新问题的具体实践中发展完善的。

新时代协商民主的世界意义,一是体现在其借鉴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上。新时代协商民主吸纳了许多西方民主的有效经验,主要是西方民主的理论特性,倡导理性、平等、包容等价值;还融合了西方协商民主将精英政治向普罗大众扩展的广泛性,使中国民主政治更能体现人民当家做主。二是体现在中国协商民主的历史职责上。人民政协在“扩大国际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1954年后,人民政协在“对外友好活动中进行了许多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78年以来,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一步发挥了重要作用”^②。政治协商会议在历史上所起的协商国际关系的作用,为新时代协商民主助力构建良好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支撑。三是体现在新时代国际治理观中。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蓬勃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复杂。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同世界各国开展协商,坚持关于世界各国人民的事“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③,充分体现了平等对话、共同参与的协商理念。

三、新时代协商民主的重大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开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根本指南。以此为根本遵循而不断发展完善的新时代协商民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增添了强大活力,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新秩序建立提供了强大支撑。

(一) 新时代协商民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我国民主政治是由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中上层民主和基层民主等民主范畴和结构要素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和体系中,协商民主发挥着协调、黏合、衔接的重要功能和作用。

一是新时代协商民主通过广泛多层协商机制发挥协调作用。我国的民主政治内涵十分丰富,为避免多种民主形式在实践过程中产生混乱和摩擦,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协调,新时代协商民主正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新时代协商民主内容和对象广泛的特点,有助于在各个方面对其他形式的民主进行合理调整。新时代协商民主发展出了政党、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基层和社会组织协商等七种渠道,并且就各类协商渠道进行了细致划归。同时,这七个渠道也对应了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选举民主、社会民主和基层民主的内容范畴,有利于更好地协调民主政治中各个形式的作用范围和方式;同时,民主政治中的其他民主形式以其专门性,帮助协商民主各渠道更适合具体民主建设内容。继续坚持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协商机制,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谐发展,推动各类民主协调发展。

二是新时代协商民主借助多主体协商机制发挥黏合作用。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党内民主是根本保证,人民民主是主体内容,基层民主是实践基础,社会民主是环境与氛围”^④,这些都具体对应到协商民主中去。协商民主的协商主体范围非常广泛,从政党到社会组织、从政府到人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人民日报》2018年3月28日,第2版。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18页。

④ 《健全协商民主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家刚》,《中国政协理论研讨》2012年第4期,第58—63页。

民，从精英到基层，将所有事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糅合到协商民主的各种渠道中。政党协商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相联系，将党内意志向外界传达，有助于党内民主的效果增强；人大协商与政府协商在决策中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意愿，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对发扬人民民主进行了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人民团体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将复杂社会关系的各类群体拢合到协商上来，使社会民主有了实现平台和机制；基层协商发生在基层，直接与普通群众的利益相联系，创造了多种协商形式，丰富了基层民主落实的途径。继续坚持协商民主的多主体协商渠道，将民主政治的各构成要素黏合到协商民主的各种形式和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凝聚作用。

三是新时代协商民主利用全过程协商机制发挥衔接作用。协商民主的流程覆盖了决策前、决策中及决策后，有助于填补各民主形式在内容、形式差异和程序脱节等方面的不足，形成各民主形式的有效衔接，加强民主体系的系统性和完善性。我国民主政治中的组成要素既是相互独立的存在，又是需要彼此紧密联系发挥合力作用的统一体。由于各类民主形式的专门性，难以在程序和范畴上无差别地配合，因此，需要一种兼容性极强的民主形式将所有构成要素衔接起来，保证我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完整性和顺畅性。协商民主以其协商范围、主体、对象的广泛和全面，贯穿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将各民主形式有效串联起来。例如，通过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中，执政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协商的机制，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联系；通过政府与群众进行协商，将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基层民主相联系；通过协商民主融入选举民主，使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衔接，共同发挥积极作用。继续坚持协商民主全过程参与的协商形式，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各构成要素互相衔接，更好地发挥彼此联动的作用。

（二）新时代协商民主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新时代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来源，推动新时代协商民主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新时代协商民主不断制度化发展，给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就需要更好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协协商和政党协商的优势。

1. 坚持党领导下的政协协商，推动新型政党制度高速发展。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①，推进政协协商有利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高质量发展。一是政协协商是发展多党合作的需要。人民政协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发扬民主、参与国是、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②，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开展合作、协商共事的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协协商以人民政协为专门协商机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进行密切、平等的协商、沟通。执政党和参政党利用专题协商会、双周协商座谈会、提案办理协商等制度，为多党合作提供制度平台和协商机制，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化发展。二是政协协商是发展政治协商的需要。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三个职能之一，对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政协作为政治协商的专门机构，其协商民主发展事关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在推进政治协商发展的过程中，既要遵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赋予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范围规定；又要大力创新政协协商的形式，通过政协全体会议、政协常委专题协商会和政协常委委托下的座谈会等形式，将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全过程。

2. 继续发挥政党协商优势，加强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③，充分体现了其在推动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政党协商推动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首要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政党协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通过加强各级党委对政党协商的领导，加强党的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对政党协商的重视，发挥政党协商的最大效能，推动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其次，开展政党协商要认清当下复杂形式，牢记多党合作初心。2015年，习近平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表示：“开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摘要）》，《人民日报》2006年3月2日，第1版。

② 《中办印发〈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6月26日，第1版。

③ 《中办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1日，第1版。

展政党协商,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对中国共产党来讲,要加强对政党协商的领导,增强协商意识,更加善于协商。对民主党派而言,要努力提高政党协商能力,担负起政党协商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①可见,新时代政党协商注重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间的联系,通过会议、约谈、书面协商等方式,完善协商制度机制、提升协商实效性,更好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构建和谐党际关系。

(三) 新时代协商民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强大动能

民主政治的发展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③,达到“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目的。新时代协商民主发展为加快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巩固人民当家做主体地位、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机制和制度支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表示,“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④,新时代协商民主主要扩大协商主体,充分发扬民主、凝聚共识,更好推动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不断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的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⑤,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运用以上各项制度体系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实现两者的现代化,需使各项制度体系在制定和实施中具备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广的人民性。党和政府借助新时代协商民主,进行科学民主决策,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互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制度的完善化、治理机制的现代化”^⑥。新时代协商民主是在人民内部进行多元利益、广泛主体协商的民主形式,助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多元化发展;新时代协商民主形成了七大协商渠道,制定了成熟完善的协商程序,完全契合治理体系完善化的发展方向;新时代协商民主立足新形势新变化,加快健全政党协商机制、政府协商机制、城乡社区协商机制等多方位的协商机制,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机制的现代化水平。

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相辅相成。新时代协商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表现。践行新时代协商民主,国家治理才能具有坚实基础,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发挥更强国际治理效能。通过完善新时代协商民主体系,加快构建协商民主机制和程序,才能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四) 新时代协商民主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

“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⑦将协商民主的重要理念融入国际治理中,有利于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治理新秩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广泛影响。

1. 新时代协商民主有利于消解西方在国际治理中的霸权,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新秩序。“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高度认同不同政治体制的存

①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6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89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④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页。

⑤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第3—6页。

⑥ 洪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30—33页。

⑦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⑧ 魏源著,赵丽霞选注:《默觚:魏源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56页。

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而定，不能一味凭借强权政治而将自身民主政治体制强加到他人身上。中国根据自身民主政治发展现状，对社会主义民主提出了四个“权利”标准^①，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标准，是对西方民主的新突破。十八大以来，在深刻洞悉世界发展形势和中国民主政治新发展的基础上，新时代协商民主理论与国际治理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国际协商机制，为国际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案。新时代协商民主倡导平等、公正、公开的价值观和协商于民的形式，有助于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在国际视野中奠定基础。此外，中国借助“一带一路”这一共同发展之路，将协商民主的协商形式落于实践，使所有参与国家共同协商发展大计、共享发展成果，成为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治理新秩序的新典范。新时代协商民主在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出的有益经验和发展的国际实践，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给以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依据。

2. 新时代协商民主理念融入国际治理观，切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此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成为国际治理新的主流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合作协商的价值理念而提出的，坚持协商对话、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等原则发挥全球治理效能。政协协商坚持和平发展、协作共赢的协商理念，并将其融入国际治理观中，“努力为完善国际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②。继续将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融入国际治理中，发挥国际协商机制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效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发展。

四、结语

新时代协商民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共产党宝贵政治经验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伟大实践，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和理论特征。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协商民主主体体系逐渐成型，其理论根源、协商渠道、实践路径等形成了不断完善的体系结构，提高了新时代协商民主制度化水平，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我国的民主政治体制的优势日益彰显；借助“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治理新理念，我国协商民主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不断增强。此外，要深刻认识到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充分发挥新时代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广泛开展协商，汇集民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中国不是自绝于世界的政治体，在现代化进程飞速推进的时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与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发生着频繁碰撞和相互影响。面对这样的交互现状，我们要增强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制度自信，同时从人类民主政治文明中汲取有益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因子，并将其内化于新时代协商民主中，完善现有民主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不断推进新时代协商民主建设，这既有利于完善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和话语体系，加强与不同民主模式的对话和互鉴，又有利于更广泛深入地践行新时代协商民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责任编辑：罗雷

^① 四个“权利”标准，即人民是否享有选举投票的权利、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民主选举的权利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31日，第2版。

民族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民族工作的历史贡献

尹记远

(昆明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 民族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一时期,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 为组织、发动少数民族群众支持、参与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主要表现在: 确立新型民族关系, 增进了各族人民对党和人民军队的认同; 拓宽培养渠道, 锻造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 发动武装斗争, 创建了革命根据地; 动员参军参战, 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形成斗敌合力, 保证了武装部队的安全和斗争的开展; 确保部队供给, 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关键词: 解放战争; 云南; 民族工作; 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3-0082-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部中国史, 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 是祖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一个缩影, 民族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站在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前线, 从云南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严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结合云南革命的具体实际, 把民族工作放在群众工作的首位, 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政治主张, 开展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民族工作, 使民族工作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开创了新的局面, 为各民族同心戮力争取云南解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纵观这一时期云南民族工作的历史贡献,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新型民族关系, 增进了各族人民对党和人民军队的认同

解放战争时期, 国民党继续实施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 不仅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些歧视性措施, 而且还在民族与民族之间不断制造矛盾, 再加上云南本身就少数民族众多,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习惯和生活习惯, 具有各自的民族观念, 这就决定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解决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民族工作时强调: “做好民族工作, 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 最管用的是

基金项目: 昆明医科大学 2021 年教研教改立项一般课题“习近平历史观深度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2021-JY-Y-008)。

作者简介: 尹记远, 昆明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云南省情研究。

争取人心。”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自始至终将民族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准确把握云南多民族省份的基本省情，旗帜鲜明地将民族平等团结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重点，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先后专门就民族工作发布过许多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压迫剥削的种种罪行，响亮地提出了“云南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口号，^①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真正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政策，与国民党匪帮的大汉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②号召“各少数民族互相尊重、友谊团结，参加解放事业”、^③“反对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④为各族人民指明了争取自由、谋求解放的道路。在实际工作中注意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真诚善待各少数民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以心换心，以信任换信任，以真诚的帮助换取各民族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和同心同德，逐步确立起既体现充分尊重“多元”、平等团结，又凸显高度认同“一体”的新型民族关系，形成了云南历史上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的局面。至今仍竖立在云南普洱县（今宁洱县）的《民族团结誓词碑》（1950年立）就是有力的证明。上面写道：“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意，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⑤

民族工作的有效开展，用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使绝大多数兄弟民族从党的政策宣传和部队的实际行动中了解到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主张，加深了对党和解放军的认识，各少数民族群众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深深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的救星，从而对共产党和毛主席产生了无限的崇敬，心悦诚服地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把“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看作自己的靠山和亲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欢迎和拥护；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革命工作，看作与自己有切身利益的工作，以前所未有的忠诚，来拥护和支持”。^⑥通过革命斗争，少数民族与共产党和解放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峨山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称游击队为“我们民族的队伍”；^⑦西双版纳的群众把过去“塔汉奔”（他们的军队）、“塔汉书”（你们的军队）的称呼改为“塔汉好”（我们的解放军）；^⑧彝族群众亲切地称干部、战士为“阿斯纳苏波”（咱们彝家人），称游击大队为“阿斯塔厄棱”（我们是一家人）；^⑨佤族人民心中也树立起了“共产党伟大，解放军伟大，祖国伟大”的信念；^⑩有的少数民族甚至以毛为姓，^⑪来表达对领袖和共产党的赤诚之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331页。

② 中共云南省委、广西区委、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

③ 中共大理州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大理地方党史大事记》，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④ 中共曲靖地委史志工作委员会、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东川市委党史征集办公室编：《滇东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7年，第213页。

⑤ 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五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

⑥ 中共云南省委、广西区委、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上）》，第177页。

⑦ 董子健：《忆峨山中学地下革命斗争时期的民族工作》，《民族工作》1989年第7期，第46页。

⑧ 西双版纳政协编：《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⑨ 中共昆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解放战争时期昆明地区武装斗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4页。

⑩ 李浩：《临沧地区佤族百年社会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9页。

⑪ 李文学：《这个姓永远不能改》，《云南日报》1999年8月21日，第3版。

情。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认同成为推动云南解放的强大动力。

二、拓宽培养渠道，锻造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干部是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调节民族关系的中心环节。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从成立之初就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看作党开展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使党的民族工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解放战争时期，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动员广大少数民族革命力量，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更加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骨干和桥梁作用，不断拓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渠道。

在斗争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少数民族干部。这一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陆续增派党团员到农村，特别是到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山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不仅使原有的少数民族干部发挥了特殊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带动提高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觉悟，调动了少数民族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各地党组织又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骨干，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活跃在党和军队的重要岗位上。如在滇西北党组织和边纵七支队156名县团级干部中，就有100多名是当地少数民族，其中在担任过县委书记、县长、团长、团政委的76人中有55人是当地少数民族，在区乡、营连的干部中当地少数民族的比例更高。^①

通过短期培训和正规教育来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能力素质。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各地举办了各类短期或长期的军政干校、训练班，通过培训，使各族青年提高了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坚定了革命理想信念，初步掌握了开展民运、统战工作和武装斗争方面的基本知识，增强了组织领导才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党员和干部。比如在曲靖地区：1947年至1950年2月，中共罗盘地委和罗平县各级党组织先后举办了8期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每期均吸收少数民族干部中的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参加，其中1949年6月从八达民族游击独立大队抽调60余名少数民族青年，举办了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经过培训，组成沙人（即布依族）工作团，1949年9月又专门举办了一期共70余人的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据1950年2月统计，罗平县有少数民族干部近200人；平彝县在1948年6月至1949年底也先后举办干部训练班6期，训练干部300余人次，其中少数民族干部60余人次。^②其它地区亦开展了有效的培训工作，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和干部。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秘密将知识分子党员疏散隐蔽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校，以学校为据点，招收当地少数民族青少年入学，挑选少数民族学生担任班干部、学生自治会干部，培养民族工作骨干，并把工作向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延伸。其中，建水建民中学号称云南的“陕北公学”，先后曾有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近百人在该校工作和任教，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峨山中学被誉为滇中地区的“革命摇篮”，学校把少数民族学生中涌现出的革命积极分子吸收加入“民青”，把先进分子吸收入党，仅彝族党员和民青成员就有100多人。^③

据资料统计，解放战争时期，到1949年9月，全省共有少数民族干部1392人（其中几乎各

^① 王元辅：《解放战争时期云南人民武装斗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72—75页。

^②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00页。

^③ 中共玉溪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滇中革命武装斗争纪实（1944.3—1950.3）》（内部资料），第2页。

少数民族都或多或少占有一定比例，如人口较少的基诺族，也有何贵等干部)。^① 这些少数民族干部政治过硬、敢于担当，不仅能带兵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具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对宣传和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民族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都起到巨大的作用，在武装斗争中，他们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和艰苦磨炼，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云南革命斗争的中流砥柱，也是解放后开创党的各项工作的骨干力量。

三、发动武装斗争，创建了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1947年12月，省工委建水会议作了在全省开展武装斗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广大农村的决定后，全省开展了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争，创建起了革命根据地。

云南少数民族居住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以上，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云南发动群众的工作就是做发动少数民族的工作，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游击区，实际上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和游击区。省工委在部署和发动武装斗争的时候，正是从这一省情入手，充分认识到云南各族人民在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开始就将工作重点放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组织和发动了少数民族参加游击战争，掌握了部分秘密武装和接受党领导的统战人士的武装。

这一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各地的武装斗争，都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首先立足、发动，并以这些地区为中心向四周发展的。据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回忆说，解放战争后期“游击战争遍及全省90多个县，滇池边上的昆阳，昆明远郊的安宁，近郊的大板桥、大小连山等地都有游击队的活动。根据地日益巩固……已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国民党省政府的许多县长（约近70人）不敢或不能到职就任”。^② 1947年6月6日，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敌后武工队首先在宣威的板桥发动武装起义，揭开了党领导下的云南各族人民游击战争的序幕，之后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创建了10块革命根据地，它们是：彝族聚居的弥泸和滇西革命根据地，哈尼、彝、傣、佤、拉祜、布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滇南和思普革命根据地，壮、瑶、苗等民族聚居的开广革命根据地，彝、苗、布依等少数民族聚居的罗盘革命根据地，彝、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滇东北革命根据地，彝、哈尼、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滇中革命根据地，白、纳西、傈僳、藏、普米、怒、独龙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彝、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滇北革命根据地。这10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离不开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参与。

四、踊跃参军参战，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广泛宣传及贯彻执行下，云南各民族群众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们拥护党的领导，踊跃参军，成为人民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成立时，“边纵”在云南的10个支队、2个独立团中，少数民族战士占了很大的比例。彝族是云南分布最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此仅以彝族为例说明。由于云南的地理条件和民族分布的特点，“边纵”第二、三、六、七、八各支队及滇中游击团的根据地，都是在彝族人民广泛居住的山区，广大彝族青年踊跃参军，壮大了人民武装，其中第二支队和滇中独立团彝族战士占50%以上；第三支队、第六支队、罗盘支队、第七支队、第八支队、第十支队中，

^①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第23页。

^② 郑伯克：《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498—499页。

彝族战士占20%~30%；活动于文山州的第一支队也有占10%的彝族战士。^①

由于参军热情极高，各少数民族形成了不少单独的战斗组织。如边纵七支队6个主力团中就有基本由白族组成的2个团、以纳西族为主的2个团，7000多名指战员中，有5000多名是少数民族，其中白族约3000人，纳西族1000多人，藏、彝、傣、普米、土家、苗、回等1000多人；17个主力营中，除汉族为主的4个外，白族为主的7个，以纳西族为主的3个，傣族为主的1个，彝族为主的1个，土家、傣、苗族合组的1个，还有1支藏族骑兵大队，1个彝族直属营。^②其它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罗盘区民族独立游击大队下辖2个布依族中队、1个彝族中队；^③高良特区也有2个少数民族中队：一个是以壮族为主的150余人的中队，壮族何良武任中队长，一个是以苗族为主的90余人的中队，苗族杨洪春任中队长。^④边纵第六支队威宁游击团下辖6个连队（无营建制）共790人，指战员中，有彝族280人，苗族82人，回族5人，布依族4人。^⑤活跃在弥泸地区的边纵第二支队13团少数民族指战员占51%，14团军事干部中彝族占三分之二。^⑥战斗在滇南地区的边纵第十支队，少数民族战士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如江外独立营3个连，第一连彝族占60%，壮族、哈尼族占15%，第二连壮族占50%，傣族占20%，哈尼族、彝族占30%，第三连90%是哈尼族。^⑦滇中地区的通海县蒙古族一次就有60余人参加游击队，该县纳古乡一地就成立了一个回族连。^⑧在思普地区，有临沧的拉祜族、傣族、布朗族和少部分汉族在圈控组成的本地第一支人民武装，有在沧源组建的佤族第十大队和佤山守备大队。此外，各民族地区的护乡团，几乎全由少数民族组成。

五、形成斗争合力，保证了武装部队的安全和斗争的开展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民族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支援革命的积极性，子弟兵战场杀敌，少数民族群众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冒死掩护军队和干部。在他们的掩护下，游击队来去自如，有时与敌人就在一个村里，敌人也像聋子、瞎子一样，全然不知。还有一些杰出的少数民族人士曾打入国民党内部收集军事情报，如回族地下党员聂映仙曾利用其在国民政府云南省民政厅和省公路管理局工作的合法身份，成功收集到当时云南关于各地的农村情况、征兵、征粮、征税情况和各地方官员贪污违法情况以及全省的公路交通进度概况等方面的重要情报，1948年3月又受党派遣去智取国民党全省军事地图。这套绝密文件，对于云南地下党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⑨

“九·九整肃”后，国民党以滇东、滇东南根据地为重点，对边纵发动了大规模清剿，少数民

① 《彝族简史》编写组编：《彝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2—193页。

②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驰骋在滇桂黔第二战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

③ 中共曲靖地委史志委员会、中共黔西南州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六盘水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滇桂黔罗盘区党史资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④ 中共曲靖地委史志工作委员会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曲靖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建设》，内部资料，第234页。

⑤ 中共昭通地委组织部、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征集研究室、昭通地区档案馆：《中国共产党云南省昭通地区组织史资料 云南省昭通地区政权、军事、统战、群团系统组织史资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⑥ 昆明市路南彝族自治县编纂委员会编：《路南彝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708页。

⑦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第381—382页。

⑧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5页。

⑨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第146页。

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掩护、支援游击队，谱写了一曲团结反清剿的凯歌。在禄劝，叛乱匪徒为搜捕工作组干部金梦华将村寨包围，彝族上层人士金那氏冒死将其藏在家中，使其幸免于难；此外，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还掩护了工作组的另外两位同志，并将其转移外乡。^① 在南山区，彝族群众迅速坚壁清野，转移到深山密林中隐藏，为了不暴露目标，群众自觉控制烟火，有的还忍痛给不懂事的孩子灌香面水，使其哭不出声音。^② 残酷的反清剿斗争中，许多少数民族老百姓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9年11月，驻马登街的保四团强迫白族农民和炳泽带路，他将计就计把敌人带入我35团的伏击阵地中，被敌人当场杀害。^③ 敌人袭击圭山蒲草村时，因为威逼群众说出游击队的行踪无效，一连枪杀了彝族人民30余人，结果还是没有从群众口中得到一点消息。^④

除此以外，少数民族群众还千方百计掩护伤病员、救死扶伤，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只有20余户的砚山县地都村，除4户苗族外都是壮族，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在这里设了一个医疗站，在敌人扫荡期间，他们把伤病员背出背进，东躲西藏，保证了伤病员的安全。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底，先后到这里的100多个伤病员，除两人因重伤医治无效外，其余都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⑤ 1949年8月陆良召夸战斗结束后，在龙海山区沙戈村后面的山菁里，成立了一个后方医院，这里的群众虽然过着洋芋荞子难充饥的生活，却千方百计保证子弟兵的供给，不到一个月，这个荆棘丛生的深山老林中，就现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六十多个伤病员除三人牺牲外，其余都健康归队。^⑥ 在围攻剑川以及龙门邑战斗后，当地白族妇女不顾危险，救护伤员，甚至以乳汁相喂。^⑦ 边纵八支队在姚安弥兴的战斗后，曾将部分伤病员留在东山区根据地休养，敌人得知前来搜查，毫无所获，竟对群众进行刑讯逼供，负责掩护伤病员的一家三口被折磨至死，也未招供。^⑧

六、确保部队供给，鼓舞战士们的斗志

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看到了解放希望，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节衣缩食，却把蔬菜、粮食、猪肉、鸡蛋等物品送给部队，保证干部和战士给养。这类感人的事迹随处可见，不胜枚举。1949年4月，滇桂黔边纵队为解决战争中的困难，经上级批准发行革命公债，开广区为5万半开银元。少数民族聚居的广南县苍翠乡群众不顾贫困，听到宣传后，踊跃认购，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粮出粮，有的还用鸡、猪、禽蛋来抵，在短短几天里，就认购了近万元，广南东街有的店铺一次就认购了一个街期的营业额。^⑨ 丽江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向滇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在战斗中，纳西族和各族人民组成五万人的劳军人员，捐献出大批银元（仅1949年“八一”献金就捐献半开银元二十四万五千元）、猪、羊、牛、香烟等现金和物资。^⑩ 此外，云南少数民族工商界的一些人士也为云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如回族商界人士马筱春，1949年秘密对边纵余卫民部给予物资支援，在昆明保卫战中，又以物资和现金支援驻守南郊的卢

① 云南中共党史学会编：《边纵武装斗争讨论文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

② 云南中共党史学会编：《边纵武装斗争讨论文选》，第425页。

③ 安泰：《滇西北革命回忆录（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356页。

④ 《彝族简史》编写组编：《彝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⑤ 云南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十一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9页。

⑥ 中共曲靖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曲靖党史资料第二辑》，内部资料，第27页。

⑦ 中共大理丽江保山怒江迪庆德宏地州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史料选编（上）》，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28页。

⑧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驰骋在滇桂黔第二战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350页。

⑨ 郭明进：《永生难忘的岁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⑩ 《纳西族简史》编写组编：《纳西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3页。

汉保安团，抗击了国民党对昆明城区的进攻；^①大理喜洲白族资本家严宝成同情革命，拿出石印机无偿赠给滇西北地委办报，捐献了大量西药、棉纱等物资支援七支队，七支队进驻大理后，又组织喜洲大小资本家集资，并捐献各种物资、缝制军服大衣。^②

1949年11月5日，滇桂黔边区党委发出《从反“扫荡”中加强迎接野战军工作》的指示后，云南各族人民积极响应，迅速组织迎军工作团，深入到各族群众中筹集物资，各族人民人背马驮将其运到公路沿线。据不完全统计，仅开广、罗盘、弥泸地区在短短时间内就筹集了粮食1148多万公斤，各种肉类250685多斤，各类油1636多斤，鞋161229双，以及鸡蛋、蔬菜、食盐等。^③其中，富宁县二十多天筹粮80万斤，麻栗坡一个月给部队打好了三万七千双草鞋。^④面对云南各族人民纯朴热情的欢迎，南下野战军指战员的心中温暖如春，他们激动地说：“回到家了！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亲人了！”^⑤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云南的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部云南解放战争史，就是云南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它的每一项辉煌成就都凝结着各族人民的智慧和血汗。正如1950年12月5日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在全省少数民族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的，“这显著表现在游击战争少数民族积极参加并与敌人坚决斗争，而且许多地区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的威信，在各族人民中有了深刻的影响；在斗争中已涌现一批各族人民自己的干部和与少数民族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民族工作干部。这些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进行祖国伟大建设事业的良好基础”。^⑥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汪民之、许椿：《云南省30—40年代企业家爱国主义者马筱春》（油印本）。

② 中共大理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大理人民革命斗争史》，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98页。

③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驰骋在滇桂黔第二战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419页。

④ 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页。

⑤ 袁林：《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少数民族的重大贡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57—62页。

⑥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第124页。

文化治理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中的 现实意义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李 贞

(云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摘 要: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和有力抓手。依托于云南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资源,使得文化得以不断发挥工具性价值,通过行之有效的文化治理机制,实现各民族之间“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平衡。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具体实践为例,分析民族文化如何发挥软实力作用,成为不断健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具体实践和呈现样本,以期对整个云南实现经济跨越发展、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边疆安定繁荣提供有益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 文化治理; 民族团结进步; 西双版纳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3-0089-05

一、文化治理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中的价值意涵

从“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到“努力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是贯穿云南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灵魂。云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15个特有民族、16个跨境民族、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这意味着民族问题是必须要处理好的重大问题,民族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一重大问题和重要关系,除了依靠国家层面的政策体系支持外,还需依靠自身,在巩固和厚植现有治理资源的基础上挖掘存量资源,从而真正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文化作为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人工体系,其意义就在于对人们生活所起的功能^①。千百年来云南各族人民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被誉为世界“民族文化活化石”“民族文化基因库”。丰富的文化资源,使得民族文化在实现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相知相亲相惜,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其特有作用的发挥,实现民族团结进步正能量的凝聚,而这个特有作用的发挥则可以用文化治理来加以概述。

基金项目: 2019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治理研究”(2019J0929)。

作者简介: 李贞,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政治、边疆治理。

^①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关于文化治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伯明翰学派,目前在学界有影响的思想理念主要包括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治理性”概念以及托尼·本尼特的“治理性文化”观,等等。2000年左右,文化治理这一概念逐渐在我国台湾地区成为研究关键词。2007年左右,“文化治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开始在中国大陆兴起,可以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明显受到福柯、本尼特等西方学者的影响,同时也借鉴了我国台湾地区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文化治理,学界却至今尚未有一个一致性的学术定义。目前,学界对文化治理的理论建构,可概括为两个维度,即作为治理工具的文化 and 作为治理对象的文化。

基于本文的研究视角,笔者将文化视作治理的工具,文化治理也被定义为经由文化来实现治理。因为当文化能够通过分类与差异化,形成身份认同,增进特定群体的凝聚力与归属感^①,文化就具有了工具属性,就能够以一种隐性权力的存在形态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塑人的作用,展开潜移默化的对族群成员的个体规训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性构建各民族大团结的共同体要素。

2016年12月27日,国家民委命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西双版纳以云南省实施示范区建设“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为契机,抓好示范创建工程建设。勐腊县勐腊镇曼龙勒村、景洪市等8家单位先后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景洪市基诺山乡巴亚村委会巴坡村等15个村被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2个村被命名为“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9年,积极推进“7+N”创建模式,启动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进旅游景区”“进服务窗口”活动,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深化。

通过对西双版纳进行实地调查发现,西双版纳牢牢把握住民族文化是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根”和“魂”,依托特有的文化优势,通过发挥文化所具有的整合社会的功能、凝聚共识的功能和发展导向的功能,真正实现了13个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相知相亲相惜,交往交流交融。本文以期在总结文化治理助力经济跨越发展、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边疆安定繁荣的实践成果的基础上,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提出文化治理运行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具体路径,纵深推进西双版纳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工作。

二、文化治理的具体实践形态

(一) 突显文化符号: 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基础

符号既是结构化的结构,是知识表达和建构客观世界的工具,又是被结构化的结构,是一种交流工具和统治的工具,发挥着文化的作用。^②西双版纳通过树立和突出语言文字符号、政治象征符号、仪式庆典符号、节日文化符号来传承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西双版纳的傣文被称为傣泐文,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语言文字符号所承载的文化知识本身就是一个意义系统,且在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加强民族团结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所以需要个体通过学习获取意义。民族语言是民族意识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之一,独立的民族语言有助于支撑起独立的民族文化,语言是构建民族身份的重要条件之一^③。西双版纳

① 李山:《社区文化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行动路径》,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② 刘伟兵,龙柏林:《仪式感如何生成—仪式发挥文化功能的运行机理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27页。

③ 童庆生:《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08页。

千百年来一直都把傣语作为社会交际和进行思维的工具,开展傣语教学,保障了傣族人民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强化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同时,西双版纳一直延续并持续强化早在1932年就开展的傣语汉语双语教学,树立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意识,编制了双语电子课件,这也成为了西双版纳双语教材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语言文字是桥梁,是纽带,这一举措能促进各民族语言互通、心灵相通,增强各民族之间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基固本。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的内涵与民族谚语、诗歌文学、图腾、民间歌舞中所蕴含的核心理念进行内嵌,形成相关联的价值共识符号,深化各族群众的意识形态,从而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育成符合政治规范的具有共同体意识的合格成员。在民族节日和民间仪式中,操演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而操演的主体是人,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节日还是仪式都是由人的实践活动而构建成的一个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自然而然就会产生集体情感,而集体情感通过特定人物、程序、礼节、器物、音乐、空间等符号元素,就会转化成为支配集体成员的思想行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本质上是一种强大的权力场域,在整合特定社会群体的基础上,对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着约束,从而使成员自觉履行某些政治与社会职能。因此,诸如“开门节”、“关门节”、“浴佛节”等特定民族群体的民族节日和民间仪式也就成为了文化治理的特定工具和文化政策的组成部分,通过集体情感、集体记忆的叠加和意义再生产,凝聚人心,从而获得共同体的统一性和人格性,以此增强群体认同和民族认同。

(二) 发展文化产业: 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的发展基础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西双版纳立足州情,充分发挥民族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实现文化对经济的有效驱动。目前,西双版纳有2个民族特色乡镇和20个民族特色村寨,以“一融合、两成为、五得到”为目标,有效实现了民族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了发展优势。“一融合”即:实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发展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两成为”即:使民族特色村镇建设成为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引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示范。“五得到”即:特色民居和民族文化得到保护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到完善增强、优势资源和特色产业得到有效开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得到巩固发展。围绕上述目标,西双版纳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一是在宏观维度上坚持民生为本,把经济发展、文化资本、民族团结有机结合起来,发展民族特色乡村旅游,使之成为云南民族文化的品牌、特色旅游的名片、展示美丽云南的窗口,通过发展三产,带动二产,提升一产,实现了群众增收,在增强了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同时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当地群众成为建设、保护、经营、受益的主体,增强村(居)民自豪感,提高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筑牢民族团结进步之魂。

二是在微观领域,依托各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资源,因族因乡制宜、因村施策、精准化地通过打造门槛低、产业链长、经济附加值高、能够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和增收致富的特色文化产业,形成文化与城镇、旅游、产业、生态、乡村建设和沿边开放“六位一体”的融合发展模式。此外,把沿边村寨建成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的现代化边境小康示范村,即充分发挥沿边区位优势,使小康示范村成为展示国门形象的窗口、守土固边的堡垒,又使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各民族大团结更加巩固,社会更加和谐,实现民族团结一家亲,携手同心奔小康。

三是大力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双版纳各民族的非遗名录及传承人涵盖了曲艺、民俗、传统技艺、传统舞蹈、民间文学、传统医药、民族民间美术、传统文化保护区等,涉及群

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现有11种国家级非遗名录,17种省级非遗名录,37种州级非遗名录以及31种县市级非遗名录。同时,还有31所非遗传习所,9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49位省级非遗传承人,205位州级传承人以及189位县市级传承人^①。非遗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性”的体现,同时也是族群记忆的一种具象化体现,非遗传承人的族群身份所内涵的族群性,集中体现出经由非物质文化遗产投射出来的族群文化特征,并能唤起族群成员的文化记忆,以此激发文化共同体所凝聚的集体情感。西双版纳非常注重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作用,鼓励竹编、傣刀、傣药、象脚鼓等有市场潜力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项目+传承人+基地”、“传承人+协会”等模式,最大限度调动传承人的积极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注入市场生机和活力,以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内生动力为宗旨,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实体。

(三) 依托乡规民约: 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的制度基础

在规章制度的制定上,西双版纳要坚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全完善民族宗教工作法治化体系,依法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依法协调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但是面对有13个民族这一客观州情,除顶层设计指引方向外,还需要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使制度真正实现“顶天立地”。这就需要在制度体系中内嵌民族文化。因为文化是确保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的重要力量,文化对社会有导向和控制作用,文化指导和控制着人们的心理、情绪,而且为人们提供价值观念、思想方式、行为规范,使人们按照一定文化体系的导向去生活、去行动。要不断强化民族团结进步的制度基础,自然也就需要通过民族文化对群众、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等进行塑造,使其能自发地把“一家人”的思想作为各民族平等团结、亲如兄弟姐妹的真心写照,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立场和世界观;把“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作为为各族群众谋幸福,不离不弃不怨的真诚追求,作为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使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在13个世居民族中,傣族占总人口的34%,汉族占25%,其他少数民族占41%,基诺族是西双版纳独有的少数民族。在如何引导处于国家疆域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群众在相知、相亲、相惜和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相互包容的过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双版纳将乡规民约作为一个重要载体。乡规民约作为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与政治规范部分重叠,对法律规范起到补充作用。而乡规民约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工作推进中的有利抓手,是因为它是内化为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的精神生活的一种展示,具有更加细化和生活化的特点,能够发挥“日用而不自知”的显著优势,使其能够成为乡村群众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绘制民族团结同心圆的关键是人,要让乡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五观五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必须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着在一起”等政治意识形态通过乡规民约不断宣传、灌输,凭借文化权力的规训,以此塑造具备各民族要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信念和理念的民族,培育大量认同、践行和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公共人”,以此奠定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人力资源和群众基础。

三、文化治理的未来发展路向

从理论角度来看,文化治理在西双版纳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是“通过文化进而以文化为场域”实现国家公共政策所设定和意欲达到的某一特定时期的目标^②。从实践角度来看,文化治理既包括政策话语的表述、文化象征符号的树立和突显、文化仪式的安排、文化空

^① 统计日期截至2020年7月15日。

^② 吴理财:《文化治理视域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6页。

间的布局和再现等对他者的治理技术，也包括文化解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等对自我的治理技术。

要继续高质量推进西双版纳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工作，就一定不能忽略文化因素，文化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影响最为深远、经久不衰的因素。在已有文化治理实践形态的基础上，更加要强调文化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科学化，从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是文化治理应规避“三单”（单主体、单向度、单声道）。政府不能是单主体、单向度、单声道式的治理主体，而是应该遵循“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一核”强调党委政府在文化治理中总揽全局的地位和作用，“多元”围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的发展战略，强调充分调动发挥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市场、社会组织和普通群众的力量，遵循以“元治理”为基本前提，以“协同治理”为运行规则，以文化治理为手段，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不断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工作。

二是文化治理要丰富实践载体。4G 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以及 5G 时代的来临，脱胎于“互联网+社交网”精细传播模式的社交媒体革命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和获取方式，社交媒体早已成为话语嘯聚、释放、表征、争锋与分类汇流的舆论场^①，这使得网络意识形态越发成为一种隐性的权力资源。因而，文化治理也应承担网络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的功能，将意识形态具体化为情感、认同、思想方式，等等，通过“文化领导权”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基础。

三是文化治理须打造标杆性示范典型。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工作要体现时代性、彰显群众性、富有创造性，才具有蓬勃生机和活力。西双版纳 13 个世居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而文化又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的体现^②，这就意味着除了凝练不同民族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在共性层面上实现文化治理外，还应该针对不同民族的实际情况，按照“分门别类，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全面推进”的思路，打造符合各民族具体实际的标杆性示范典型，创造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最终形成针对所有民族的以点串线、以线连片、以片带面的示范创建格局，奋力谱写民族团结进步发展新篇章。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李贞：《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风险治理研究——基于“两微”舆论风险的视角》，《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2 期，第 105 页。

^② [英]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年，第 337 页。

文化建设

云南水族文化传承及发展研究

方琳, 李云兵, 张横

(曲靖市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曲靖 655000)

摘要: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及发展研究对于云南这样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省份具有重要的意义。水族是云南25个少数民族中的重要一员,其在历史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云南水族主要聚居在曲靖市富源县,其拥有丰富的建筑、服饰、饮食、民间工艺、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节日及婚丧、民间口头文学等物质或非物质特色民族文化。其文化传承方式主要有行为传承(口耳相传)、师徒传承、符号传承、特定人群的传承、政府主导的传承等。由于水族文化受周边民族文化影响较大、受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下的现代文明冲击、民族文化传播者及年轻一代背离乡土、云南水族文化研究存在盲区等多方面原因,目前云南水族文化传承发展中存在多项文化因子濒临失传、文化传承人断档明显、多民族融合现象突出、文化研究成果及宣传推广较少等问题。笔者建议通过强化民族认同、完善健全传承人培养扶持机制、发展特色文化乡村旅游、创新文化传承及发展方式等路径,推动实现云南水族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云南水族; 文化传承; 文化发展; 富源

中图分类号: G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3-0094-07

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是维系一个民族存续的重要基础。而在当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现代文明的浪潮席卷下,许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强烈的冲击。当前,如何较好地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持续发展,是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和创建民族文化强省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文章特选取云南水族为研究对象,了解其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探讨其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云南水族文化传承及发展变迁现状

曲靖市富源县古敢乡是云南省唯一的水族乡,下辖古敢、补掌、沙营三个村委会,全省大部分水族人口均聚居于此,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域特点的水族特色文化。

(一) 文化传承及发展变迁概况

1. 物质文化传承及发展变迁

一是建筑文化。云南富源水族村寨多位于低山丘陵区的河谷地带,临水而居,环境怡然。其民居形式最早是传统干栏式建筑,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干栏式建筑如今多已消匿。

基金项目: 2019年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校)科研协作课题一般项目“云南水族文化传承及发展研究”(2019SYXTB03)。

作者简介: 方琳,曲靖市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副处长,研究方向为民俗学、社会学;李云兵,曲靖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张横,曲靖市社会主义学院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

当前,云南富源水族的民居建筑形式基本变为砖石结构,同汉族民居已没有太大区别,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难觅踪迹。

二是服饰文化。云南富源水族曾有过“短衣长裙”的着装历史,后因劳作的需要改裙子为裤装。其服饰以青、蓝色为主基调,搭配以黑、白色。到20世纪80年代末,鉴于传统服饰制作繁琐,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现代服饰穿着便于制作和购买,云南富源水族传统服饰渐渐萎缩,仅在少数村寨流行,大部分已为现代服饰所取代。

三是饮食文化。云南富源水族的饮食习惯反映了其作为稻作民族的特点,饮食结构中大米是主食,辅以旱地作物,喜食糯米,偏好酸辣口味。富源水族地区最负盛名的一道菜为“姜子鸭”,具有温补祛湿效用。多数水族男子喜欢饮酒,目前酿制水酒的工艺仅在老厂镇新堡村委会乐额村传承。此外,传统的美食还有糯米制作的粽子。

四是民间工艺。主要以刺绣、印染、编织、雕刻等为代表。刺绣多表现在传统民族服饰的背带、袖口、鞋面、围腰等方面。不同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传统的“马尾绣”,云南富源的水族妇女创造了一种用头发进行刺绣的“头发绣”。雕刻有石雕和木雕之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吞口”。“吞口”木雕源于水族民间古老的吞口崇拜,其造型是一个木雕人头像,总体形状基本是人首、凸眼、犬耳、宽鼻、獠牙、咧嘴、伸舌头、口含一柄短木利剑,用红、白、黑、黄四种鲜明的颜料绘制图案,造型独特,极富文化意蕴。对于刺绣、纺织、印染等手艺,当地大部分老年妇女都能掌握,部分中年妇女能够掌握,而青年女子则较为生疏。雕刻则是一门精细的手工艺,需要经过拜师学习和长期的实践积累,目前掌握此项技艺的手工艺人较少。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发展变迁

一是宗教信仰。云南富源水族有自然崇拜的传统,认为万物有灵,人们通过祭拜山神、树神、水神、龙神、土地神、牛神等来祈求安康。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吞口崇拜,这是全国其他水族聚集区所没有的。吞口崇拜源于一则当地广泛流传的民间传说,讲述了瘟疫横行的远古时代,一条鱼王从水面冒出把瘟神镇压住的故事。后来人们先是用纸画符,后逐渐演变成用木材雕刻来描绘出传说中鱼王的模样,并将其悬挂于门头以达到辟邪祈福的目的。目前,在富源县老厂镇新堡村委会乐额村村口的金丝榔木下,有一个高约40公分,宽约15公分的石雕动物坐像“吞”,其造型为虎头鱼身象腿鸟尾,背靠村子,面朝村外。人们认为“吞”可以吞恶辟邪,镇住妖魔鬼怪,保一方平安,将其视为村子的保护神。

二是语言文字。水族有本民族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同布依语、壮语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目前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群众相互间仍然可以用水语流利地交流,但云南富源县的水族已经通用汉语,仅有老厂镇新堡村委会乐额村的王加益、熊美菊、熊小刁等十余位老年人还能够用水语交流。水族古文字称为“水书”,由这种文字写成的《水书》是水族先民用于占卜祭祀的古巫书,也是水族文字得以保存沿袭至今的主要载体。据统计,现存的水族文字约有500个单字,包括象形字、会意字和形声字。目前,水语和水族文字在富源水族中已面临完全失传的危险。不过近年来,古敢水族乡开始有一些人到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去学习包括水族语言和文字在内的传统文化。

三是节日习俗。云南富源水族不同于贵州三都水族使用水历,而是同汉族一样使用农历,因此其传统节日也与三都水族主要的民俗节日如端节、卯节和敬霞节等不同。云南富源水族主要的节日有:二月二“祭白龙”,三月三“祭龙节”,六月六“祭土地神”,六月二十二“祭山节”,十月初一“舂牛粑”。同时,受周边汉族影响,云南富源水族也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汉族传统节日。不过,其传统节日的祭祀习俗仍然基本保存完整。目前来看,当地最为隆重而富有民族特色的节日习俗莫过于古敢乡补掌村“三月三”的对歌节,即在祭祀“龙王”结束后,当地水族群众尤其是青年男女着盛装进行对歌。

四是婚丧习俗。云南富源水族长期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传统上不与其他民族通婚，而在本民族内部实行异姓通婚，且多为父母包办、媒妁定亲等。现在云南水族青年男女在交往上较为自由，没有过多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水族也开始同其他民族通婚，婚姻程序也已经简化许多，至多保留最重要的说亲、迎亲、回门3个程序，已基本同汉族无异。

由于受汉族的影响，目前富源大部分水族村寨是请汉族阴阳先生主持安葬，仅有少部分村寨还保留着传统的丧葬习俗。如老厂镇乐额村，抱摩^①王加益（1943年生）是濒危水族语言的保护传承人，精通水语，在其主持的丧葬活动中，所念诵的《开路经》《超度经》等全部使用水语，仪式大致经过19个程序。但乐额村水族丧葬习俗的这些特点是建立在王家益个人熟悉和掌握水族民间传统文化习俗的基础上的，如今老人已经78岁高龄，面临后继无人的状况。

五是民间口头文学。主要可分为五大类型，即追本溯源的创世神话，解释自然现象的传说，解释宗教祭祀活动及民俗节日由来的传说，反映本族人民赖以生存的自然风物景观的故事，反映有关爱情婚姻、是非善恶等本民族集体价值观的故事等。

六是民间歌舞。云南富源水族民间舞蹈主要有吞口舞、金钱棒舞、狮子舞、板凳龙舞、木叶琴舞等，其中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的是吞口舞、金钱棒舞和狮子舞。“吞口”是云南富源水族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因子，由吞口崇拜演化形成的吞口舞自然也是其特有的舞蹈形式。吞口舞多在村寨或家中遭难时表演，旨在驱邪避魔，保佑安康。2005年，《吞口舞》在中国（江西）国际傩文化艺术节荣获银奖，云南富源水族的吞口舞由此开始引起广泛关注。近年来，吞口舞多由当地政府组织，参加相关演出比赛或庆典表演，而村民自发自愿组成的表演队伍很少，这也导致了目前吞口舞传播和普及不广泛的现象。云南富源水族歌谣主题鲜明，素材多元丰富，可分为祭祀歌、劳动歌、生活歌、情歌、风俗歌、时政歌、儿歌等。当地常见的乐器主要有唢呐、短笛、箫筒、唢筒、月琴、二胡、铜鼓、铜锣等，多在节庆、婚礼和丧葬时使用。

（二）传承方式

1. 行为传承（口耳相传）

在民族宗教祭祀活动中，如祭山神、祭龙神、祭土地神、祭吞口、舂春米等，在整个活动过程中由长辈们将整套仪式过程行为传给下一代。围绕着各种祭祀活动，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人们会经历一次心灵的震荡，精神的洗礼。在传统节日节庆中，如三月三大型对歌节，在歌舞狂欢活动中，本民族传统的乐曲、舞蹈、民间文学等便由老传少，如传递接力棒一样，代代相传。体现在个体身上，行为传承始终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从小时候的耳濡目染到成人后的以身作则，从受教者到施教者，每个人在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中都完成了自身使命。

2. 师徒传承

师徒传承主要是指针对某一项手工技艺所进行的极具专业性的代际传承。目前为止，在云南富源水族聚集区，民族文化遗产人主要集中在吞口的雕刻制作、民间乐器演奏、山歌演唱、狮子灯舞、姜子鸭制作技艺、水族服饰及刺绣技艺传承等方面。这些传承人大多数都是年轻时拜师学艺，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掌握了一门技艺而不断发扬光大，如郎万平（吞口制作）、吴心田（乐器制作）等人。也有部分传承人的技艺是自幼从自己的父母长辈那里习得的，如王关翠，自幼跟随母亲学习头发刺绣和纺织；再如熊小刁，其掌握熟知的水语是源于母亲熊美菊的言传身教。

3. 符号传承

符号具有象征的功能，以直观具体可感的形式如服饰、建筑、图腾物、岩画、雕刻等表现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崇拜信仰、审美意识等。其具有追根溯源、记载史实、传承传统、展现习俗、

^① 所谓“抱摩”，传统上被水族群众认为是阴阳界的使者，在葬礼时负责用水语念诵祈祷经、丧葬经，为逝世的人入殓、诵经、出殡、安葬；此外，平时还负责用水语为闯遇鬼神致身体不适的人治解，治解时根据闯遇鬼神的情况分别用猪头、鸡、鸭等畜禽，加上其他物品，择时吟诵。

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云南富源水族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传承事项就是“吞口”。“吞口”是一个横眉怒目的人像头雕,悬挂于门头,主要有5种类型:“凶神恶煞”“猩猩必煞”“凶神八煞”“双剑雾煞”“送子行煞”,各有不同的外形特征,具有驱邪避魔的作用。^①

4. 特定人群的传承

以往在每个水族村寨中,都有主持重大宗教祭祀活动的抱摩,他们熟知水族的历史渊源、语言文字、神话传说,可以说是本民族的精英。他们在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环节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老厂镇乐额村的王加益,他精通水语,爱好文艺,擅长二胡、笛子、箫等乐器,经常组织村民排练民歌、舞蹈,更重要的是他是乐额村的抱摩,熟悉并掌握水族丧葬经《摩克筛》,能使用草药为水族人治病。

5. 政府主导的传承

近年来,曲靖市各级党委政府实施多项重点工程对富源水族文化进行保护、挖掘和宣传,通过政府行为在更大范围内传承传播水族传统文化。一是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积极扶持民间文化艺人;三是精心编辑出版相关书籍;四是全力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五是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

二、云南水族文化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存在的问题

1. 多项文化因子濒临失传

云南水族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中,祭祀活动、民歌、舞蹈等生生不息,还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吞口”崇拜。但与此同时,受周边民族尤其是汉族文化的影响,一些文化因子也发生了较大变异,尤其是在建筑、服饰和语言文字方面。目前在云南水族聚居区,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基本上已经消失,服饰普遍汉化。水族文字也已基本失传,无人能识,仅在老厂镇乐额村王加益、王金学和相邻的罗平县阿白吉村熊家贵家中收藏有少量《水书》。在语言方面,仅在老厂镇乐额村有十余名老人能够用水语交流,他们多为七八十岁的老人,其中最年轻的熊小刁也已经六十余岁。如不采取更有力的保护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云南富源水语的文化传承终将随着年长者的逝世一起被埋葬。

2. 文化传承人断档明显

当前,随着年轻一代选择外出打工,云南水族村寨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小孩。以致许多民间技艺虽然掌握在部分传承人手中,但在往下一代的传承时形成了巨大的空档。当年轻人纷纷涌向大城市谋求生活,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观念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使得相应的文化事项传承没有了依托,即人的需要和人的参与。例如吞口技艺的传承人郎万平虽然也收了一些徒弟,但是他们隔三岔五地总要到外地打工,并不能形成系统而专业的学习,且缺乏实践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人们观念的变化,对于悬挂吞口辟邪的需求也在相应地缩减。没有了市场需求,吞口的制作自然也会萎缩,这也是限制吞口技艺传承和发展的一个原因。

3. 多民族融合现象突出

各个民族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总会与周边的其他民族之间发生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通过这样的交流融合,各民族原初的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必然会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地理文化环境。在云南省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水族属于人口较少民族。2018年全省水族人口为0.9万人,仅比独龙族多。云南富源水族因其所处地理位置,受周边汉族、布依族、壮族等的影响较深。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有被同化的地方,自然也有其独特的地方,譬如“吞口”的信仰就是云南富源水族较为独特的文化事项。但是在多民族融合发展的现实背景下,目前云南水族传

^① 余晖:《大型水族风情歌舞〈吞口〉创作背后的文化思考》,《民族艺术研究》2008年第2期,第66—69页。

统文化可以说被同化的地方较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面临较大困境。

4. 文化研究成果及宣传推广较少

基于《中国水族研究文献题录》所列文献(收录文献起止时间是1958—2014年)以及对知网(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58—2019年,分别以“云南水族”“富源水族”“古敢水族”为关键词)进行检索,1958—2019年期间全国公开发表、出版的有关云南水族研究的中文文献主要有:62篇期刊论文,3篇会议论文,4篇学位论文,7本书籍。从全国对水族研究的文献来看,同贵州的水族研究相比,云南水族的研究还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就是发文量少,成果不够丰富。^①另一方面,在多姿多彩的云南民族文化传播展示中,水族文化的宣传推广显然是不充分的,公众对云南水族的认知度太低。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涉及水族的民俗文化事项很少,仅有水族马尾绣、水书习俗、水族端节三项,而这三项都归属于贵州省。云南富源水族仅有水族吞口、水族狮子灯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二) 原因分析

1. 水族文化受周边民族文化影响较大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在全国18个水族乡中,仅有1个在云南省境内,即曲靖市富源县古敢水族乡,另外17个均在贵州省境内。可以看出,全国水族人口聚居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古敢乡位于云贵交界处,地处曲靖市富源县东南部,东、南、北三面与贵州省兴义市的坪东、乌沙、清水河、威舍四镇相连,西接富源县黄泥河镇。古敢乡总面积82.6平方公里,境内居住着汉、水、彝、苗、白、回、布依和蒙古8个民族,其中水族约占总人口的35%。此外,在富源县黄泥河镇、老厂镇、富村镇还散居有部分水族。总体而言,云南水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周围都被汉族、彝族、壮族、布依族等民族的村寨所环绕,水族文化受周边民族尤其是汉族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

2. 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下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

与贵州水族聚居区一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民俗文化相比,云南富源水族传统文化特征呈现较为弱化的现象,许多民俗文化事项反而更接近周边的汉、彝、苗、壮、布依族等。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网络的普及,受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许多民族传统文化均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从传统服饰、饮食、建筑等物质文化逐渐为年轻一代所摒弃,到神话传说、语言文字、节日习俗、宗教信仰、婚丧习俗等精神文化的本质内涵无人理解和承袭,导致其传统民俗文化遗产后继无人,呈现断裂化现象。

3. 民族文化传播者及年轻一代的乡土背离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我国城市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农村人口逐步下滑,出现了农村只有老人小孩留守以至乡村凋敝的现象。据统计,2018年富源县常住人口为75.14万人,户籍人口83.36万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为8.22万人。^②富源县近五年来均为人口净流出状态,在这当中,离开农村涌进城市的人口主要是正当年的强劳动力。古敢水族乡同全县的情况也是如出一辙,全乡大部分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留守村寨的多数是老年人和儿童,这就造成了民族文化传播主体的缺失。

4. 云南水族文化研究存在盲区

从现有关于云南水族研究的文献来看,研究的持续性较差,没有形成长期跟踪研究的态势,不能形成一批系列成果。而从现在已发表的文章作者来看,多数只有一篇成果,也没有形成作者群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持续关注 and 调查的现象,缺乏学科带头人。从全省民族文化研究来看,对水

^① 方琳:《云南水族研究文献的分析和评价》,《创造》2019年第12期,第59—63页。

^② 曲靖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曲靖调查队编:《曲靖统计年鉴(2019)》,2019年,第40—44页。

族文化的研究不够突出,成果较少,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更少。从全国水族文化研究来看,由于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是全国水族主要聚集区,民族文化事项突出,全国水族文化研究主要聚焦于贵州境内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文化,对云南水族的关注度不高,形成了云南水族研究的盲区。^①

三、云南水族文化传承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

(一) 夯实根基——强化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是民族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在民族文化的延续和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归属感来源于对本民族高度的认同,由此民族文化才会更加彰显活力。

云南水族在全国水族人口所占比例较少,受周边民族影响较多,尤其受汉族影响深远。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云南水族自身的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民族特色逐步消失,最后基本同汉族没有明显的区别。受现代文化的冲击,青年一代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也越来越弱化,这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族认同。

要充分发挥家庭、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作用。从娃娃抓起,让他们熟知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参与各项民俗祭祀及节庆活动,通过言传身教形成长期的浸染,提升其对传承和发展水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其作为水族儿女身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注重培养古敢乡水族师资队伍,通过派出去交流学习的方式,主要到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培训学习,到相关文化研究机构学习,掌握水族的语言文字,大力抢救濒危的云南水族语言,从而在古敢普及水族语言文字。同时通过请进来的方式,把本民族民间文化艺人、音乐、舞蹈、吞口制作、刺绣等方面的文化传承人请进学校和课堂,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作为民族文化交流学习课程展示。在课程的开发和民族文化资源的展示学习方面,通过书本、网络、音视频以及节庆活动策划等多种形式开展,不断激发和提升青少年主动学习本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和内驱力。

(二) 抓住关键——完善健全传承人培养扶持机制

要重视云南水族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加强文化遗产普查力度,大力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目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仅有水族马尾绣、水书习俗、水族端节3项属于水族,数目很少,且均在贵州省境内。为此,要加强云南水族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和名录申报工作。如“老厂乐额村水族语言”目前仅被列为县级保护项目,政府部门要依托其在云南民族文化中的独有性,积极将其申报为更高级别的保护项目。同时要加强对水族文化遗产的普查登记工作,如对古敢乡吞口制作、吞口舞、狮子舞、金钱棒舞等民间技艺活动进行系统的普查登记。

要建立科学可行的传承人培养扶持体系。对传承人的真正重视,不仅仅是将其列为民族文化传承人即可,还要建立各种保障机制,将传承人的个人记忆、个人技艺扩展为本民族的集体记忆、集体技艺。对各级传承人应适当给予生活补助费,使其可以安心开展文化传承活动而不必到处谋划生计;同时通过相应的政策不断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给予物质和精神的鼓励,保护其权益。要加大对传承人的培养力度,激励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通过对文化传习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设施进行扶持、规范和引导,充分发挥传承人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在一定范围内评估其传承效果,对其实施监督管理,使其文化的传承从自发、随意阶段走向自觉、规范化阶段,不断扩大影响面和感召力。

要不遗余力地挖掘当地水族文化资源。学术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认为水语在云南水族地区已经荡然无存。而在几年前,通过老厂镇文化站工作人员的大量调研、实录工作,发现乐额村还保留有水语,村内有十余名老人能够熟练交流水语,部分中青年能够听懂水语。^②这一重要发现,

^① 方琳:《云南水族研究文献的分析和评价》,第59—63页。

^② 参看卢鹏荣:《中国乐额水族文化探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改变了学术界长期的认知。但是由于经费、工作人员较少等实际问题,目前对乐额村的水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开展并不乐观。地方政府、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深入挖掘保护像乐额村这样的保留有较浓厚民族文化习俗的水族村寨,制定水族传统文化村落保护实施方案,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使原生态的水族村寨焕发勃勃生机。

(三) 用活机制——发展特色文化乡村旅游业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云南省着力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要积极作为,紧紧依靠国家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弘扬传承云南水族文化。鉴于古敢乡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和云南富源之间,地理位置独特,其发展既要面向滇中,又要面向贵州、重庆、成都等方向,省内省外形成联动机制。古敢水族文化,既要与贵州三都水族文化加大交流力度,融入全国水族文化氛围中,同时也要充分挖掘在特定地理环境下形成的独有文化事项,保持文化特性,增强吸引力。古敢乡要充分挖掘宣传水族民族文化传统,着力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业。通过文旅结合,依托古敢乡及周边村寨特有的水族风情,尤其突出打造宣传云南水族特有的“吞口”文化;依托境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典型的峡谷、森林、山峰、断岩等喀斯特地貌,打造特色休闲旅游小镇。积极响应云南省政府“三张牌”的号召,依托补掌温泉资源,着力打造古敢水乡“健康生活目的地”;充分利用当地优质环境资源和特有农产品,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打造古敢水乡“绿色食品牌”。把富源古敢乡及周边水族村寨打造成云南省内独一无二的集“水族民俗体验区、农业观光区”和“以温泉为主的康养休闲特色小镇”为一体的特色乡村文化健康旅游目的地。

(四) 搭建平台——创新文化传承及发展方式

各级地方政府要积极倡导,加大资金投入、深化招商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着力从更广泛范围来搭建平台,全力扶持云南水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工作。

在民族文化原生态区域中使其活态文化有效传承的一种有效举措,就是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目前,云南省省级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涉及水族的有古敢乡下笔冲村水族传统文化保护区。鉴于乐额村在水语语言及宗教祭祀、民族歌舞等方面还保留较为传统的民族文化,应着力推进其省级水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进行精心规划、保护和开发,进一步保存其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同时也要极力避免在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产业时,为了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和审美而进行的一些伪民俗表演,要保护本区域内民族文化的真实性,从而将其打造成为具有较强生命力、影响力和吸引力的云南水族生态博物馆。

要进一步加大文化研究力度,省级社科基金要制定倾向性政策,定期专列资金和研究项目,以云南省水族研究会为牵头,每年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广度和研究深度的云南水族文化研究成果;专家学者要形成持续性的关注研究,围绕云南水族文化某一方面问题的研究形成一个长期追踪的态势;文艺工作者要深入调研,多出云南水族的宣传作品;形成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的良好局面,形成同贵州水族文化研究积极交流、互补共鉴的繁荣发展局面,进一步扩大云南富源水族的知名度。

要积极应用互联网技术,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可推出一批文创产品,譬如吞口制作,可以将其形象卡通化,创作一些呆萌、可爱的手办、茶宠、小挂件等,突出其避邪、祈福的良好寓意,扩大市场需求,创造经济价值。要加快农村电商发展,通过政府积极搭建平台,实现年轻一代在家门口务工,赚钱养家、照看小孩两不误。要充分利用当下直播经济的发展,带领村民进行歌舞表演、吞口制作等的网络直播展示。充分利用互联网经济业态新发展,通过“直播带货”“云销售”等方式带动水族特色农产品的销售。通过这些措施,力图让大量的水族人口能够留下来在原生文化生态区域内生产生活,传承人断档的问题也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责任编辑:朱家麟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

张璐¹, 许焯²

(1.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 湖南湘潭 411100; 2.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16)

摘要: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有利于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养。传承过程应遵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以实践为导向、具备国际视野、批判继承传统的原则。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困境: 从主体来看, 政府包揽过多、社会参与度低, 且协同不够; 从客体来看, 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缺乏; 从内容来看, 对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的内容发掘和阐释不到位; 从方式和手段来看, 相对单一且滞后; 从保障系统来看, 机制和制度保障不力。为此, 应当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 构建多元协同合作的主体体系; 着力加大教育宣传力度, 加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 全面加强研究阐释, 形成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传承发展内容; 重点利用现代化信息化资源, 丰富并创新传承发展方式和手段; 多方探索并确立制度, 建立健全传承发展保障系统。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3-0101-0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孕育和产生的。它深植于华夏儿女的精神血脉之中, 是所有中华儿女的精神记忆, 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急剧变迁, 作为我国独有的精神标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旧为指引中国人民解决发展新问题提供智慧指引和价值源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下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养的重要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出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①。无疑, 在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一项重要课题。

一、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

(一) 文化及传统文化的内涵

文化产生于社会生活之中, 它是社会历史的集中体现。广义上的文化, 不仅涵盖了思维观念、

基金项目: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题“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2020DX043)。

作者简介: 张璐,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 许焯,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副教授, 学报副主编, 湖南大学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与实践。

^① 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2021 年 3 月 13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2021 年 8 月 29 日。

价值取向与风俗习惯,也包括科学技术与风土人情。文化代表了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总和。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它展开分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等等。文化这一概念比较宏观,它是社会现象,也是历史现象。而这种现象仅在人类社会存在。换言之,在人类社会尚未产生之时,是没有文化的。

传统文化又称“文化遗产”,是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传统文化是由文明发展而来的,其中反映了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与习俗习惯。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向前演进。传统文化包括四个维度:器物维度、价值维度、行为维度和制度维度。它不仅是对以往生产生活的抽象总结,也是今天人们行为选择的指引。

(二)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基本精神

马克思主义认为,时代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的产生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并对政治和文化、社会等其他因素产生影响,且最终将导致整体性的质变进而开启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是一个历史时间段的概念,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程。从纵向维度理解新时代,其时间节点起始于党的十八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成果基础之上,领导中国人民统筹推进各项事业,开启了新的征程。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①党的十九大发出号召:“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②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因子,这些因子在新时代仍能发挥作用,需要在继承中创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给予我们民族以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也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所积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基本精神已经内化为中国人民内在的文化基因。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了以下几个向度的内容。

思想文化向度。如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观念,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人最为重要也最基础的价值规范,这些价值品质不能丢失。另外,儒家思想中的舍身取义、三省吾身、忧患意识等,也是重要精神品质。道家思想主张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等观念,强调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符合今天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的要求。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尚贤和贵义,传递了达观向上的处世态度,以及提倡人人接受教育的公平性,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核一致。

个人道德向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励人们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① 人民网:《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3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503/c1024-29961468.html>, 2021年8月29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页。

^③ 新华网:《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3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03/c_1122774230.htm, 2021年8月29日。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其强调的迎着困难不屈奋斗和进取的精神令人动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了人民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国耳忘家,公耳忘私”等等展现了浓烈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的注重个人素质、自律观、廉耻观,“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强调克制个人欲望,遵守言行规范,也符合当代社会的要求。

社会和谐向度。大同世界的理想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追求,“和为贵”“和而不同”等和谐观念中流露出中华儿女内心对和平与和谐的渴望。在历史上,社会和谐观念对于促进国内发展和世界文明交融产生了重要作用,今天它也能助力于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构建良好的国际关系。

二、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 有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当前的国际环境呈现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国与国之间综合实力的比较不仅体现在经济、军事等维度,也体现在文化实力层面。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实力的构成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着十分重要且特殊的作用。这是因为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一种具有以柔克刚能力的国家安全战略资源。

文化交流的样态既可能是互相借鉴融合,也可能是走向冲突对抗。当前中华文化正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为了更好地融入国际文明交流对话,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以及文化挑战,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提升综合国力无疑会成为中国的选择。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就是说最坚硬的力量也要有最柔软的力量作为辅助。治国必须借助文化这种柔性的巧力。文化作为精神武器,对于国内社会的发展以及与国外的竞争,都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与优势,是我们最应当挖掘的内生文化资源。正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影响,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充分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内涵。

(二) 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文化建设也会影响其他领域的建设。长期的发展实践,也充分证明了文化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大力推进文化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遵循“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建设文化强国,推进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要花大力气来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同时它又首先体现在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的、契合老百姓需要的文化市场。那么,我们的大众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化?喜欢怎样的文化呢?在中国的场景下审视上述两个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毫无疑问是答案的构成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练了中国人的智慧和价值观,群众基础到今天仍然十分牢固。一方面公众比较容易接受这种文化形式,另一方面其中蕴藏的精神理念又符合当下建设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精神和中国品格,以之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之一乃是必然。

此外,文化即人化,人的现代化又首先表现为人的思维意识发生转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公民个人提出了人的意识观念现代化的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带给处于新时代的中华儿女以行为选择上的启迪,也能从精神层面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 有利于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道德素养

衡量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不能以GDP作为唯一指标,社会道德水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向度。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然而,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同时,我国也存在着很多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对精神文化领域产生了不良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公民个人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这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前提。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都没有思想,不讲道德修养,那么这个社会的存在就没有意义,遑论希望。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致性。中华民族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我国的传统文化极为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注重通过道德教育来提高个人修养素质。新时代,我们依旧可以通过教育手段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提升公民个人道德层次,进而奠定社会道德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说:“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含中华传统美德,是今天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新的历史时期,思想道德建设将被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离不开对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学习。我们应该把传统美德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结合起来。

三、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遵循的原则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理念视角出发,审视判断和分析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充分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开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要正确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两面性,识别优秀文化,拒绝传统文化中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有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糟粕内容,对陈规陋习说不。二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认识到在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进行创新,科学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找出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化的突破口。三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认识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应当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

(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之所以能成为独特的民族记忆和精神追求,就是因为它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的累积和承继而来的。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是引领中国人民围绕第二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价值归属,也要体现在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是各种文明成果享受者,因而文化要为人而服务。在新时代,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牢牢把握住“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而不是本末倒置。要高度尊重人民群众,把人的需要作为传承保护活动的出发点,让人民群众切实享有文化的参与感和认同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

(三) 坚持实践导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在这一时期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新时代这一历史定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的5000多年的历史,反映了中国的国情。改革开放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也迎来了新的变化。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一些错误观念侵蚀了少部分人的大脑。拜金主义、奢靡之风、个人主义思想抬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错误观念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成为当前我们推进文化建设的任务之一。所以,我们主张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必须高度关注社会实践,从新时代新形势出发,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

(四) 具备国际视野

当前,面对全球化趋势,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走向,这是新时代必须回答的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中华民族,也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体现着鲜明的民族性,又表现出高度的世界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不是独立的,而是互为条件。如果我们在文化发展道路上选择固步自封,那就会止步不前甚至倒退。只有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并不等同于牺牲文化的

^①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1版。

民族性或者走向西化,而是强调要在保有文化民族性的同时,融入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主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碰撞。

(五) 批判继承传统

马克思曾经说过,“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①新时代,怎样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智慧滋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新时代的客观要求,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经说过,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等制约,中华传统文化“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要注重与时俱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是要做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我们不是要搞文化复古主义,也不是要搞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在正确把握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实现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发展。

四、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一) 从传承发展的主体来看,政府包揽过多、社会参与度低、协同不够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遗产的主体。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须充分激发十四亿中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现实情况是政府主体大量包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事务,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乱象犹存。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也尚未捋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责任划分,导致一些部门不作为、乱作为;文化领域相关企业参与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没有充分意识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与文化事业、企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没有看到其中的机遇。加之,政策激励有限,导致缺乏积极性,创新意识不足,出现过度商业化、市场化、三俗文化产品;随着文化发展越来越多元,一些民众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缺乏正确认知,主动参与传承创新过程意识不足。此外,各主体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时候,缺乏同其他主体协同配合的意识,往往是各行其是,影响了传承的效果。

(二) 从传承的客体来看,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不足

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学习过程中,开放的态度一方面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走向世界,实现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得一些年轻人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西方文化过于推崇。例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本国雄厚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借助于美国大片等形式,对中国观众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这些年轻人在强烈的文化冲击之下,对西方文化和礼仪表现得极为认同,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圣诞节、万圣节等洋节也在中国大行其道,吃西餐成为不少人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和风俗却被束之高阁,被不少人认为没有存在价值和吸引力,是过时的。而这仅仅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受到冲击的一个缩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没有实现与社会发展要求的同步,加上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就必然产生认同危机。

(三) 从传承的内容来看,对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的内容发掘和阐释不到位

文化由经济和政治决定,并且要为政治服务。文化也只有顺应经济和政治的变迁,反映时代要求,方能保持活力。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静止地停留于过去,而是要“活起来”,与时代同频共振,在薪火相传中推陈出新。“看不到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主义因素,就必然把传统和落后等同起来,把传统和现代截然对立起来,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③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说要搞复古主义,更不是对传统文化照单全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思想精髓直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0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③ 陈志刚:《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思想新定位》,《新视野》2020年第5期,第5—11页。

今天仍能指导我们正确开展实践活动。但我们也要承认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一些观念已经不符合当下客观实际的需要，需要与时俱进地对内涵进行再次挖掘。

（四）从传承的方式和手段来看，方式和手段相对单一且滞后

互联网新媒体因简单的操作方式、较高的传播自由度和较大的影响力，在近近年来得到迅速推广，同时也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场域。在这一背景下，把新媒体、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结合起来，体现出重要价值。传统的传承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官方渠道通过书本和广播等形式开展，方式和手段单一，边际效率也越来越低。虽然一些主管部门也已经开始尝试各种新的方式，但从量和质的角度来说，目前我们在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方式创新上的探索是不够的，内容吸引力还有待提升，交互体验感也不足，还处于比较粗浅的阶段。

（五）从传承的保障系统来看，机制和制度保障不力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有制度和机制作为保障。制度是为了规范和激励传承发展过程中各相关主体的行为，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法律规范和政策支持下实现良性发展。而机制则强调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中，要实现部门和机构的良好配合。当前我们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不完善，难以为传承保护各项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我国在立法方面，已经比较完善，但具体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特定领域，则显得并不完备，法制的保障作用有限。政策方面，依旧需要进一步补充和细化，激励作用尚有挖掘空间。另外，由于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部门各自为政、协同配合难、职责权限划分不清等问题尚存。此外，专业人才缺乏，也是影响传承创新的掣肘因素之一。

五、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对策和路径

（一）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创造性，构建多元协同合作的传承发展体系

从党政部门的角度而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服务意识，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方面充分发挥积极推动和正确引导作用。党政部门在传承保护体系中居于把控方向和大局的地位，各部门之间要做好协同配合，避免产生各自为政、职责不清的现象。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参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并与地方建设结合起来。同时，党委政府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社会主体主动融入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中来，充分发挥引导、激励、服务与监督职能，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致力于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从企业的角度而言，要自觉承担起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责任，如文化企业可以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模式与技术手段，创新传播方式，进一步扩大传播面。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广大人民群众是新时代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最广泛的社会基础。要运用好优秀历史人物、先进典型人物的榜样示范作用，讲好中国故事，创新传播形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整个社会掀起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热潮。

（二）着力加大教育宣传力度，加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与中华民族一直高度重视教育密切相关。正是一代代承担教育使命的人，保障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认可“文化立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与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各种教育形式相融合，把思政课这一载体有效利用起来。与此同时，学校应优化文化环境，在各种功能区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培育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需要借助于多样化的传播载体，通过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多种形式，适应群众的文化需求、审美情趣与生活习惯。平台方面，要充分利用线下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把这些机构打造成有力的传播渠道，结合现代科技，优化宣传方式，以生动活泼亲和新颖的手段来实施宣传活动。要提高电视、广播和互联网等传播平台的利用效率，通过打造文

化类综艺节目,来覆盖更多的人群。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通过线上平台和融媒体矩阵来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大势所趋。要加大公共场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如公交车站、文化宣传墙等场所,扩大宣传的覆盖面。

(三) 全面加强研究阐释,形成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传承发展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数千年的智慧结晶,具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内涵。新时代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首要任务是对其内涵进行更深一步的挖掘,并进行整理分类。为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我们要坚持辩证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传统文化。例如传统文化中的孝悌理义、自强不息、文明和谐等理念,在新时代仍然具有推动作用。我们要继续挖掘这些有益文化与新时代的联系,激发其活力和价值。

创新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始终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我们要正确地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自觉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联系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其优势和魅力。要讲清楚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与特征,方便人们通过更加通俗化的语言来理解其内涵,充分实现创造性转化。

(四) 重点利用现代化信息化资源,丰富并创新传承发展方式和手段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得利用网络多媒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可能。如今,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除了传统的书本学习和学校课程之外,还可以灵活运用网络传播方式。

要顺应新媒体时代发展趋势,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平台。“善于利用新媒体与新载体,提高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逐渐解决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乏味、形式单一、技术落后等问题。”^①在这些平台上定期发布相关文章咨询,优化内容设计与编辑,吸引公众关注,引导转载分享。各类学习平台或账号,应当设置互动模块,为公众提问交流提供途径。充分运用直播等新兴方式,借助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的引流优势,以具有吸引力的视频和互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利用VR技术,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展览形式,让公众通过多媒体的浸润式体验,对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亲近感,通过具体物件收获对传统文化更为准确的认识。

(五) 多方探索并确立制度,建立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保障系统

一是要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新时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而不是由哪一两个职能部门就能够推动的。因此要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明确各自的职责职能,健全相关的政策保障。

二是要完善法律法规。针对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法律体系还处于起步时期,法律规范尚不健全,执法环节缺乏力度,监督职能发挥有限。我们要建立中华传统文化保护机构,强化文化领域法制保障。

三是要大力培养人才。科学把握当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现状,形成人才教育机制,鼓励公众参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促进专业人才培养成长。

四是要加大资金支持。在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同时,引导社会机构参与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中来,加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完善文化活动室、图书室和博物馆等场所建设,提高文化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吴增礼,肖佳:《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变迁及基本经验》,《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8—14页。

发展问题研究

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吴 韬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信息技术部, 云南 昆明 650111)

摘 要:党的十九大作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和提升数字治理水平提出明确要求。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引发学术界高度关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也积极开展。本文对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探讨当前研究文献关注的方向、内容、重点和存在的不足。同时,就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进行梳理,总结经验做法和取得成效。最后,展望未来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研究方向和探索路径。

关键词: 数字政府; 数字治理; 政府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3-0108-07

一、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理论研究

(一) 我国数字政府的理论研究

党的十九大作出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和智慧社会重大部署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②由此,数字政府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热潮。“数字政府”理念是伴随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下世界各国政府推动管理改革过程中的不断形成和完善的。追根溯源,关于“数字政府”概念的渊源,有学者认为1998年美国率先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之后,衍生出了数字政府、数字城市、数字社区、数字家庭等理念,^③数字政府作为西方的舶来词传入我国之后,随着1999年我国“政府上网”工程的深入实施和互联网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又演变形成了电子政府、电子政务、在线政府、网络

基金项目: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2021年度课题“新时代以数字经济推动云南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2021YBKT01);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项目(202105AC160027)。

作者简介: 吴韬,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数据、数字经济、数字政府。

①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版。

③ 罗强强:《中国数字政府研究:现状、演化及启示》,《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2—27页。

政府、智慧政府等不同的理念。在早期,有学者从技术、管理和政策三个逻辑层面对数字政府的新趋势进行了理论预判,^①有学者认为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府或电子政务具有一定的通用性且作为同义词可以交换使用。^②也有学者从国外关于电子政务经历存在、互动、交易和转化四个阶段后进入数字政府阶段的治理过程,区分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府的概念,^③并就西方学者从行政过程、治理模式、组织形式以及技术手段等角度来阐释数字政府的概念,认为数字政府是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行政过程,代表着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具有“技术”、“组织”和“权威”于一身的复合性特征,既促成了政府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融合,又促进了数据的横向及纵向流动与整合,使政府的治理结构从“碎片”走向“整体”,治理方式更加数字化、智能化,治理过程更加开放、透明和高效,进而提升治理水平与治理绩效。^④

目前,“数字政府是什么?建设什么样的数字政府?如何建设这样的数字政府?这三个问题关乎数字政府建设的未来走向,但是还缺乏共识性的研究结论。”^⑤尽管学术界尚未形成权威、统一和公认的数字政府的概念,但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侧重来探讨数字政府的概念并不断丰富着这一概念。王伟玲立足数字政府产生的时代背景,认为数字政府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是工业时代的传统政府向信息时代演变产生的一种政府形态”。^⑥何圣东、杨大鹏从技术层面指出,数字政府是“政府事务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展开的政府存在状态和政府活动实现形式”。^⑦卢晓蕊认为,数字政府“是一种与信息革命相适应的政府形态,其核心目标是基于数据驱动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管理架构上趋于整体化,在业务架构上趋于平台化,在技术架构上趋于智能化,在内外交互上趋于敏捷化”^⑧。黄璜探讨了近40年来我国政府发展过程中经历的“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三个政策阶段以及数字政府在核心目标、顶层设计、政策议题、业务架构和技术基础上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认为数字政府的概念应该包含技术和组织两个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技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配信息资源,并基于数字基础设施进一步实现赋能、协同与重构,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革命。^⑨吴慧娟、付光伟对数字政府的概念进行考察后指出,我国在经历了“电子政务”、“互联网+政府”和“智慧治理”以及“数字政府”四个演进阶段之后,实现了“数字政府”概念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发展,认为在当下,“数字政府”是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实现政府决策、政府管理、公共服务提供多领域的数字化,实现政府内部改革以及外部行政创新或再造,进而打造“公开透明、民主开放”政府形象的一种政府形态。^⑩类似上述的观点很多,无疑是对“数字政府”概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诚然,学术界对于数字政府的概念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也给出了多元化的界定和阐释,但这并不影响学者们从多个层面拓展研究“数字政府”内涵与外延的热情。黄璜从政策层面分析认

① 孙志建:《数字政府发展的国际新形势:理论预判和评估引领的综合》,《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32—42、127页。

② 蒋敏娟、黄璜:《数字政府:概念界说、价值蕴含与治理框架——基于西方国家的文献与经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第175—182页。

③ 蒋敏娟、黄璜:《数字政府:概念界说、价值蕴含与治理框架——基于西方国家的文献与经验》,第175—182页。

④ 蒋敏娟、黄璜:《数字政府:概念界说、价值蕴含与治理框架——基于西方国家的文献与经验》,第175—182页。

⑤ 马亮:《数字政府建设: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第99—111页。

⑥ 王伟玲:《加快实施数字政府战略: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电子政务》2019年第12期,第86—94页。

⑦ 何圣东、杨大鹏:《数字政府建设的内涵及路径——基于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经验分析》,《浙江学刊》2018年第5期,第45—53页。

⑧ 卢晓蕊:《数字政府建设:概念、框架及实践》,《行政科学论坛》2020年第12期,第10—13页。

⑨ 黄璜:《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治理研究》2020年第3期,第2、6—15页。

⑩ 吴慧娟、付光伟:《数字政府概念的社会史考察》,《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第18—22、29页。

为,数字政府是一个新的政策概念,与电子政务之间反映了不同的政策内容。^①王伟玲从组织层面分析指出,数字政府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是工业时代的传统政府向信息时代的现代政府演变产生的政府形态。^②戴长征、鲍静从演变层面分析提出,数字政府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治理方式,主要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信息化”与“网络化”、政府服务的“智能化”与“精准化”以及信息传播的“扁平化”与“多中心化”三个方面的演变。^③张世璟等从变革层面分析认为,数字政府利用社会公共数据的内生价值,通过重塑政府的职能,实现政府职能部门在行政、决策、服务、治理等各领域的数字化变革,构建形成了“行政、服务和治理”一体化的政府治理新模式。^④王春晖从平台层面分析表示,数字政府的重要特质是“平台政府”,通过政务平台把政府与民众联系起来,实现了政府流程再造和效率提升。^⑤张权等从转型层面分析认为,数字政府通过信息技术对政府的组织和过程进行改造,不仅从组织形态上发生了转变,而且从政府活动形式上也发生了转变,实现了政府的数字化转型。^⑥汪玉凯从治理层面分析指出,数字政府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和服务,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业务模式优化,是以数字化驱动治理方式的变革。^⑦陈小华等从形态层面分析认为,数字政府的形态包括建设目标、平台架构、治理机制、制度基础四大要素。^⑧

此外,还有学者以全球视野探讨数字政府,从美国数字政府建设经验、发展历程、治理经验给出了对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经验借鉴,^⑨以及国外发达国家数字政府建设取得的先进经验,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给出了启示和建议,^⑩周民提出要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以服务为导向强化政务服务、营商环境等领域创新推进数字政府建设,^⑪潘毅刚从十个维度提出了数字政府建设的评判标准,^⑫李军鹏就面向基本现代化的数字政府建设方略进行了探讨^⑬等等,学者们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观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作赘述。

(二) 我国数字治理的理论研究

数字治理是数字时代治理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成果。当前,数字科技革命浪潮激荡澎湃,数字化变革正引领政府治理现代化,走向智慧化,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引擎。^⑭数字治理是政府数字化建设迈入变革期,促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实现政府改革、服务、治理和创新,加快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⑮学术界关于数字治理概念的探讨是伴随着数字政府概念的提出及研究而不断深入的,在西方学者提出数字政府概念后,进入21世纪,基于电子商

① 黄瑛:《中国“数字政府”的政策演变——兼论“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的关系》,《行政论坛》2020年第3期,第47—55页。

② 王伟玲:《加快实施数字政府战略: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第86—94页。

③ 戴长征、鲍静:《数字政府治理——基于社会形态演变进程的考察》,《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9期,第21—27页。

④ 张世璟、张严:《数字政府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老区建设》2021年第8期,第72—80页。

⑤ 王春晖:《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经营管理者》2021年第5期,第1页。

⑥ 张权、熊锦:《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基于组织与行动者的类型学分析》,《学习论坛》2021年第3期,第57—63页。

⑦ 汪玉凯:《“十四五”时期数字中国发展趋势分析》,《党政研究》2021年第4期,第16—20页。

⑧ 陈小华、潘宇航:《数字政府:演进阶段、整体形态与治理意蕴》,《观察与思考》2021年第1期,第97—106页。

⑨ 姚水琼、齐胤植:《美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研究与经验借鉴》,《治理研究》2019年第6期,第60—65页。

⑩ 潘志安、陶明、郭丹华:《国外数字政府建设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与建议》,《科技广场》2019年第3期,第35—41页。

⑪ 周民:《关于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若干思考》,《信息安全研究》2020年第11期,第1042—1045页。

⑫ 潘毅刚:《数字政府建设“十标准”》,《浙江经济》2020年第10期,第79页。

⑬ 李军鹏:《面向基本现代化的数字政府建设方略》,《改革》2020年第12期,第16—27页。

⑭ 张立:《数字化引领政府治理现代化》,《软件和集成电路》2021年第5期,第24页。

⑮ 司一夫:《政府数字变革的探索与思考》,《软件和集成电路》2021年第5期,第40—41页。

务、电子政务等概念,电子治理、数字治理的概念也随之进入学术界研究的视野。在早期,国内很多学者将数字治理与电子治理视为同义词进行定义和阐释。徐晓林、周立新从“善治”的角度提出数字治理的概念,即政府、市民社会和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社会三大主体,在政府与市民、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政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信息的交换、交流、审批及系统整合等活动,进而实现政府所有后台办公工程和内部行政系统之间的运作。^① 刘邦凡探讨了电子治理的广义(应用电子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管理以及对一切与电子有关事务的积极主动的管理)与狭义(政府的电子治理)的含义,^② 王浦劬、杨凤春认为,电子治理是一种更多与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组织与利用方式相关联的社会政治组织及其活动的方式,涉及公众如何影响政府立法机关以及公共管理过程的一系列活动。^③ 史达在梳理电子治理的概念及与电子政务的差异的基础上认为,电子治理是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与信息化发展相结合的重要产物,不仅体现了公众、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新型关系,而且体现了公众和企业的参与,是一种治理范式的转变。^④ 孙志建提出“治理工具”的观点,认为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的治理工具将会呈现信息化转向和更加重视信息工具的使用、网络舆情的利用等发展趋势。^⑤ 纵观前期学者们的研究,大多以党政部门为主体,偏重于信息网络技术层面,集中于静态概念、动态预警、过程控制等方面,对数字治理结构、机制等方面的探讨还有待深入。^⑥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数字治理的研究日益深入,不断拓展其内涵及外延。祝智庭等比较分析了数字治理相关概念界定,从提高数字治理能力层面,提出数字治理与信息素养、知识管理共同融合形成智慧学习的新素养。^⑦ 韩兆柱等梳理了国内外数字治理的相关理论研究,以数字治理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时间为脉络,从探讨一般意义上的数字治理与数字治理理论的差异性,新公共管理体制的形成对数字治理理论的影响,以及数字治理理论深化发展过程中新公共管理“数字治理”理论范式的争论等,对数字治理的内涵进行深度解读和比较研究。^⑧ 杨健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数字经济治理问题及其遵循的原则与治理的重点内容。^⑨ 于君博认为,将数字政府治理应用于政府“放管服”改革,有利于促进政府内部和外部的服务流程再造,确保信息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间的融通。^⑩ 王少泉探讨了数字治理演变趋势和推进路径,提出了解决思路。^⑪ 杨国栋对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进行了分析,认为数字政府治理的实质是数字时代和数字化生存中的国家治理。^⑫ 何哲分析了国家数字治理的宏观架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等问题,指出数字治理包含了对数据的治理和基于数据的治理两个层面的内涵与意义,二者相互依赖。^⑬ 鲍静、贾开就推进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分析了数字治理的原则、框架和要素等问题。^⑭ 颜

① 徐晓林、周立新:《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体系构建》,《管理世界》2004年第11期,第140—141页。

② 刘邦凡:《电子治理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③ 王浦劬、杨凤春:《电子治理:电子政务发展的新趋向》,《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1期,第75—77页。

④ 史达:《电子治理的概念解析及基本框架研究》,《电子政务》2011年第10期,第2—12页。

⑤ 孙志建:《数字政府发展的国际新趋势:理论预判和评估引领的综合》,《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32—42、127页。

⑥ 徐硕强、庄杰、李华君:《数字政府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研究》,《电子政务》2012年第9期,第9—13页。

⑦ 祝智庭、陈丹:《数字治理:智慧学习新素养》,《电化教育研究》2014年第9期,第9—17页。

⑧ 韩兆柱、马文娟:《数字治理理论研究综述》,《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23—35页。

⑨ 杨健:《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科技中国》2017年第3期,第57—59页。

⑩ 于君博:《数字政府治理助力“放管服”》,《审计观察》2017年第3期,第47—49页。

⑪ 王少泉:《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现状、问题及推进途径》,《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32—37页。

⑫ 杨国栋:《数字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长白学刊》2018年第6期,第73—79页。

⑬ 何哲:《国家数字治理的宏观架构》,《电子政务》2019年第1期,第32—38页。

⑭ 鲍静、贾开:《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原则、框架与要素》,《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23—32、125—126页。

佳华、王张华对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与智慧治理等相关概念及其关系进行了辨析。^① 贾开立足数字治理改革,剖析了数字治理与个体生活、社会结构和政府运行之间的“三重分离”现象,提出要释放数字治理潜能并服务于人的发展。^② 郑磊通过对数字治理的效度、温度和尺度的梳理、回顾与探讨,认为数字治理的终极目标应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数字为中心,要把握好效度、温度和尺度这三个“度”。^③ 孟天广认为,数字治理是数字时代的全新治理范式,是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其内涵至少包含对数据的治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以及对数字融合空间进行治理三个方面,将全方位赋能国家治理。^④ 杨学山认为要以系统的观念创新发展数字政府,推进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⑤ 此外,学者们还从智慧城市、县域经济、数字乡村等方面以及治理机理、质量、模式、途径等内容来探讨数字治理,学者们视野开阔,观点纷呈,不乏真知灼见。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治理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从多角度、多层面、多领域对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概念、内涵及其外延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许多独到的、有价值的观点和思路,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治理的持续探索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实践探索

(一) 我国数字政府的实践探索

伴随数字中国建设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各地区从不同层面和各自侧重,探索以数字化变革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实践,取得了积极进展。概括地说,首先,从强化顶层设计来看,如北京市早在1999年就提出并推动“数字北京”建设,从顶层设计入手,着力构建北京市电子政务的总体框架,“十一五”期间完成了基本建设目标。2012年3月,北京市印发《智慧北京行动纲要》,实施“智慧北京”八大行动,全力建设“人人享有信息化成果”的智慧城市,在“十二五”期间实施“祥云工程”行动计划,深化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及人口、法人、空间地理、宏观经济等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2016年12月,《北京市“十三五”时期信息化发展规划》颁布,提出要建设新型“智慧北京”,并在“十三五”时期加快建设大数据政务网站平台,打造支撑“智慧北京”的全方位政务数据共享与信息服务体系,努力成为互联网创新中心、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智慧城市建设示范区。2021年7月,《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出台,提出北京市要通过5至10年的接续努力,建设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六个高地”,打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北京样板”和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北京标杆”,加快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企业、数字市民等数字化主体建设,全面构建数字化特征的现代治理体系。

其次,从推行政务改革来看,如广东省于2017年12月率先在全国推行“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从行政理念、组织架构、技术创新等方面实行变革,倡导“政务互联网思维”,打造一体化高效运行的“整体政府”,将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列为全省全面深化改革的18项重点任务之首,开创了“3+3+3”数字政府建设模式,通过组建“数字政府”建设管理机构,统筹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各项工作,通过构建项目全流程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体系,规范数字政府项目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制度变革与技术革新“双重”作用,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促进数字技术与政府管理、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打造了“粤省事”、“粤政易”和“粤商通”等政务服务品牌,^⑥力争到2025年全面建成“智领粤政,善治为民”的“广东数字政府2.0”,并实现“五个

^① 颜佳华、王张华:《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与智慧治理概念及其关系辨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25—30、88页。

^② 贾开:《数字治理的反思与改革研究:三重分离、计算性争论与治理融合创新》,《电子政务》2020年第5期,第40—48页。

^③ 郑磊:《数字治理的效度、温度和尺度》,《治理研究》2021年第2期,第2、5—16页。

^④ 孟天广:《数字治理全方位赋能数字化转型》,《政策瞭望》2021年第3期,第33—35页。

^⑤ 杨学山:《以系统观念创新发展数字政府》,《软件和集成电路》2021年第5期,第25页。

^⑥ 李哲、石小兵:《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广东探索》,《中国财政》2020年第12期,第69—70页。

全国领先”。如浙江省于2017年2月，印发《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构建“四横三纵”的七大体系，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打造了“浙里办”、“浙政钉”等政务服务品牌。2018年7月，《浙江省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方案（2018—2020年）》颁布，以标准化建设支撑政府数字化转型。2021年2月，《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出台，明确要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聚焦“七个关键”和“五大方面”，突出一体化、全方位、制度重塑、数字赋能与现代化，助推“数字浙江”建设和提升省域治理科学化、精准化和协同化水平。

再次，从转变服务方式来看，如上海市自2002年1月开通“中国上海”门户网站后，持续推进政府网站服务群建设。2012年5月，《上海市电子政务管理办法》出台，明确要着力提升政府服务水平，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2016年又先后颁布《上海市推进“互联网+行动”实施意见》《上海市电子政务云建设工作方案》等文件，加快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而近年来，上海市大力推行“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模式，持续转变政务服务方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构筑数字政府框架、打造数字治理生态和建设“智慧城市”。^①如贵州省2014年10月依托大数据发展优势，上线运营“云上贵州”政务数据服务平台，创新实现了“五个一”即“一朵云”承载、“一个库”汇聚、“一张网”服务、“一个平台”支撑和“一套标准”管理以及“三个百分之百”即政府网站百分之百迁移上线、网站域名百分之百集中解析和数据资源百分之百汇聚归集，2018年12月，《贵州省推进“一云一网一平台”建设工作方案》印发，进而围绕“六个智能”建设思路，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一体化政务服务总门户，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淘宝式”网上政务服务，^②2020年11月，《贵州省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工作方案》发布，旨在创新政务服务供给模式，推动政务服务高频事项“跨省通办”。

此外，从基础设施体系、政务服务能力以及数据开放共享等方面来看，我国各地区也因地制宜开展了实践探索。如山东省通过优化“1+N”省市一体化政务云服务体系，逐步构建起了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融合汇聚的数据资源体系、先进适用的应用支撑体系和可管可控的安全保障体系以及持续优化的规范标准体系。如内蒙古自治区通过持续完善政务信息基础设施，基本构建起了数字政府基础设施体系和政务数据共享交换体系，政务服务能力和网络安全保障不断增强。^③如黑龙江省构建起了全省统一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初步建成人口、法人等基础数据库，政务数据资源整合与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数字政府运营成效显著，政务服务能力攀升。^④类似省份的数字政府建设大致相近，但也各有特色，这里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的云南省，在“十三五”时期不断夯实“五网”基础设施，奋力弥补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短板弱项。2019年1月，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云南”，自此开启了数字云南建设的新征程。随后，云南省成立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全面统筹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网络化和智慧化。截至2021年9月，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先后召开五次会议，研究部署数字云南建设各项工作，明确了“数字云南”建设要以“共建、共用、共享”目标，坚持“切口小一点、研究深一点、更管用一点”原则，以“政务云”建设作为着力点，不断拓展公共云、高速宽带、智慧旅游、智慧城市等重点应用领域，并启动新一轮“云上云”行动计划，利用数字经济打造了“一部手机办事通”、“一部手机游云南”和“一部手机云品荟”等“一部手机”系列品牌，正在

^① 谭必勇、刘芮：《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论逻辑与结构要素——基于上海市“一网通办”的实践与探索》，《电子政务》2020年第8期，第60—70页。

^② 蒋敏娟：《地方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比较——以广东、浙江、贵州三省为例》，《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6期，第51—60页。

^③ 庞彩云：《“十四五”时期加快推动内蒙古数字政府建设》，《实践（思想理论版）》2021年第2期，第25—27页。

^④ 蔡德发、李青：《黑龙江省数字政府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商业经济》2020年第12期，第11—12、19页。

以后发优势走出一条“以应用试验换产业、市场开放换产业”的数字化发展之路。

（二）我国数字治理的实践探索

我国数字治理的实践探索，可以说是伴随着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历程而不断走向深入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治理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从厘清概念内涵方面来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数字政府”概念之后，我国各地区对数字治理的概念、内涵及要义日益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与理解，在有关数字政府建设规划方案中，“电子治理”、“网络治理”、“网络化治理”等表述已鲜有出现，“数字治理”概念进一步明晰，逐渐形成广泛共识并成为各地区数字政府及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次，从构建标准体系来看，我国地方政府推进数字治理标准化也有了初步探索。如2021年7月，浙江省印发《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标准化体系建设方案（2021—2025）》，围绕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五大系统标准体系，在术语定义、方法标准、编码标准等方面率先探索地方政府推进数字化改革和实施数字治理的广域通用标准。

再次，从提升治理能力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围绕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和政务服务方式重塑，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广东省以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省域治理“一网统管”、政府运行“一网协同”等构建高效便捷泛在的政务服务体系，以“粤省事”、“粤商通”等“粤系列”平台促进线上、线下政务和社会服务深度融合，不断推动全省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和数字化治理能力。

此外，从加强立法保障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在保障数据安全、规范政府数据共享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如2019年9月，贵州省印发《贵州省大数据安全保障条例》，这是我国首部省级层面数据安全地方性法规；2020年10月，贵州省印发《贵州省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这也是全国首部省级层面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地方性法规，从政府数据管理、共享、开放及监督管理等方面明确贵州省政府数据开放事项，为提升政府数字化水平和数字治理能力提供法治保障。

三、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治理的未来展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立足新发展阶段，发出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伟大号召，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并就“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三个方面，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提升政府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进行要求和部署，这为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较长时期持续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治理进程，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建设步伐持续加快，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将不断走向纵深。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是一个多学科多专业多领域交叉融合的全新研究课题，涉及多维度、多层面、多方面具有复杂性和动态化的问题，不仅需要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还需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未来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理应遵循我国新发展阶段所必须坚持贯彻的新发展理念，服务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可以预测，就数字政府而言，我国将立足国情，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着重就“建设怎样的数字政府”和“怎样建设数字政府”等未来数字政府走向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而我国地方政府将结合各自实际，围绕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任务，对数字政府建设、管理、服务、运营以及评估等方面进行深入实践。就数字治理而言，我国将从多层治理视角，围绕国家行政体制改革、政务服务流程再造、政务服务方式重塑以及行政效率与治理效能“提质增效”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而我国地方政府将围绕政府“数字”治理、“数智”治理以及“智慧”治理等内容进行实践探索。

责任编辑：杨松禄

大学生公益创业融入社会治理：逻辑、功能与进路

苗江欢，熊天露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崇德书院)，河南 新乡 453700)

摘要：大学生公益创业与社会治理存在着目标契合、价值一致、手段相近的特征，通过老年人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服务以及其他公益服务等形式，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协调不同群体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整体的制度自信、提升受益群体的政治认同。推动大学生公益创业要多措并举。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心、引导学生关注民生福祉；要依托现有公益组织，扩充社会资本；要进一步推动政府“放管服”改革，定向增加社会服务采购规模；要优化现有制度环境，降低创业成本。

关键词：大学生；公益创业；公益服务；融入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3-0115-06

“公益创业是指个人、社会组织或者网络等在社会使命的激发下，追求创新、效率和社会效果，经济效益兼顾社会效益；是面向社会需要建立新的组织，或向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社会活动。”^①公益创业兼具“经济人”和“道德人”属性，“以公共服务或产品的有效供给为目标，创新探索市场运作方法在公益组织中的有效运用”^②，“将传统单一的‘输血式’公益模式改变为新型‘自我造血式’的公益模式”^③，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大学生公益创业是我国“万众创业”的有效组成部分，其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激烈市场竞争的冲击，提升大学生创业的主动性与成功率；同时，也有助于大学生将自身价值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因此，在社会建设和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公益创业与社会治理理论的耦合逻辑研究，积极完善公益创业支持制度，推动大学生公益创业。

一、公益创业与社会治理间的逻辑契合性

公益创业是以商业价值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为根本取向的创业模式，具有公益性、市场导向性、创新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导致其价值追求，同时也导致其供给产品均与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内涵保持着高度契合性。梳理这种逻辑契合度，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公益创业，从而推动大学生创业尽快走出“经济人”假设的窠臼。

作者简介：苗江欢，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崇德书院)历史文化教研室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政教育、大学生就业创业；熊天露，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政教育与管理、医学伦理学。

① 唐亚阳、邓英文、汪忠：《高校公益创业教育：概念、现实意义与体系构建》，《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第5期，第49—53页。

② 陈俐帆：《公益创业：公共服务提供的新思路》，《福建论坛》2011年第8期，第170—173页。

③ 屠霁霞：《大学生公益创业影响因素分析及建议》，《教育发展研究》2018年第1期，第7—13页。

（一）公益创业与社会治理的社会性目标契合

从根本上说,治理是“国家主体为了达到和保持由经济、政治、伦理三种行为要素所构成的国民协作系统的稳定和该系统同整个外界环境的平衡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与行为的总和”^①。社会治理概念的产生,一方面是基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即社会结构、利益结构、社会问题的广泛程度都远远超出了传统社会管理机构的行为边界与能力边界;另一方面,则是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理论反思,强调要通过综合利用多元力量从而推动政府对无力处理、无暇关注或无效管理的领域的治理。这与公益创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合。一方面,着重关注教育、环保、扶贫、养老等社会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公益创业所孵化的公益组织也隶属于社会治理中“多元力量”的结构范畴,并能够不断完善社会力量结构,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与深度,为社会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

（二）公益创业与社会治理的公共价值一致

社会治理“内在蕴含着两个层面的伦理向度,一个是现实社会实实在在的善的事务,它可以称为是一种‘手段的善’;另一个是内在现实活动事务中人类的特定伦理精神,即作为一种‘目的的善’”^②。“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多样化、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决定了社会治理应以追求(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③，“公共性既是国家、市场与公众联系的纽带,又是国家、市场与公众协同治理的目标”^④。具体来看,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治理的主体是社会全体民众,社会治理的方式是社会主体多元互动,社会治理的目的是提升社会发展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之相似,公益创业是纯公益组织与一般企业的结合体,兼具社会性和经济性双重属性,超越了简单的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实现,具备了较高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集中体现在立足项目良性健康发展的基础上用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和诚信意识强化其组织形象和声誉,从而精准满足和实现服务需求,进而获得最大的组织效益。因此,作为我国“多元一体”社会治理格局的一部分,公益创业是社会治理公共性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能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公共性价值追求的实现。

（三）公益创业与社会治理均强调“市场化”手段的应用

当前,我国不断加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建设,积极推动“社会各个治理主体逐渐成为边缘治理中心,扩展社会治理格局的边界”^⑤,在强化国家责任义务的同时,引入市场的力量,动员社会的参与,进而使得多重治理力量得到整合与发挥,从而加强社会治理效能。当前,我国的公益创业更多被认为一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下出现的创造社会价值的创业活动。公益创业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商业创业和志愿公益,“兼具社会性和经济性双重属性,其社会性要求它以实现社会价值为最终目标,而经济性要求它必须按照市场化方式运营,实现自负盈亏,由输血到造血的功能强化”^⑥。这种特征与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吻合,也使其更容易融入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宏观视野。

① 周可真:《论传统治理哲学的价值目标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实现途径》,《江淮论坛》2016年第6期,第12—17页。

② 祖国华、祖语:《新时代建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之伦理意涵及当代价值》,《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00—105页。

③ 朱虹、吴楠:《社会治理的伦理分析》,《长白学刊》2015年第1期,第125—129页。

④ 颜克高、任彬彬:《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价值、结构与推进路径》,《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46—52页。

⑤ 颜克高、任彬彬:《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价值、结构与推进路径》,第46—52页。

⑥ 唐亚阳:《公益创业学概论》,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二、大学生公益创业融入社会治理的多重功能与价值

大学生公益创业不仅有助于带动大学生就业，缓解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力量优化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和供给结构，持续推动我国当下的社会建设。具体而言，其有以下社会治理功能与价值。

（一）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将国家治理制度转化为治理实践，是积极融入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打造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要求不断扩大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深度和广度，协同推进社会建设。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构想也要求，并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作为我国社会治理整体结构中的一环，大学生公益创业从多方面激发了社会活力，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是大学生公益创业有助于进一步增加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规模，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为我国社会“善治”提供完善的组织基础。二是大学生公益创业有助于将先进的服务、营销和治理理念纳入社会治理中，从而促进我国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升和进步，提升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吸引更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三是大学生创业所带来的组织规模扩大也有助于扩大同类社会组织之前的竞争，迫使他们拿出更具有创新性、竞争性的治理方案，从而推动社会治理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协调不同群体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正义是在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环境中，对权利和义务、资源和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① 一个良性的社会，正义可以实现“对公平、自由、平等的校正和提升，在公平、自由、平等的实现过程中进一步扩大和增进正义的实现范围和程度”^②。公平正义的实现依赖于社会制度的根本约束与具体制度的调节。公益组织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具体制度的一部分。大学生公益创业项目不仅能够促进具体群体（如残疾人、农民、贫困人口）的能力提升，促进其社会融入与机遇把握，从而共享发展成果；同时，大学生公益项目也可以促进少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协调不同阶层之间利益的平衡分配，增强不同群体间的粘性，增强其获得感与认同感，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运转。

（三）增强社会整体的制度自信，提升受益群体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是社会公众对政治主体作出的一种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是实现社会公众对社会政治主体认可的重要力量，也是政治主体实现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保证”^③。其“沿着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到价值认同的主线发展”^④。以公共性价值为导向的大学生创业通过自身的工作，可以促进、维护服务群体的利益，提升其获得感与幸福感，从而起到教育的目的，使之坚信我国当前社会治理具体制度与政策不仅是适合我国国情的，而且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弥补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产生的社会分化与割裂现象，维护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大局。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公益创业也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宣讲机，将“执政为民”“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以实际行动注入服务群体，乃至所有周边群众头脑中，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对政府政策和工作评价的满意度，增进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具有极端重要性，不仅是抵御西方国家政治诱变的坚强壁垒，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崛起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基础。

① 史瑞杰：《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效率与公平》，《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4期，第197—209页。

② 史瑞杰：《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效率与公平》，第197—209页。

③ 张振伟：《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削弱与增强》，《兰州学刊》2004年第5期，第14—17页。

④ 史世奎、李元：《论国民党在台初期建构“国家认同”的路径及其缺陷》，《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72—75页。

三、大学生公益创业融入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

我国自古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情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有“少年强则国强”的奋斗精神。当前，我国大学生秉持这些信念，积极投身于多领域进行公益创业，立足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需求，结合自身的资源、能力与人文关怀，精准选择创业项目，积极投身恰当嵌入社会治理格局中。其中，老年人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服务、其他公益服务等领域成为当前我国大学生公益创业的重点关注领域，也成为我国大学生公益创业融入社会治理的主要路径。

（一）老年人服务

2000年以来，我国就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共有2.64亿，占全国总人口约18.7%。中国的快速老龄化，一方面使社保系统和家庭财务持续承压，导致家庭结构和内部关系的巨大变迁，另一方面，生理衰退和信息技术变革导致老年人社交关系内卷、心理问题频发。面对这种状况，一方面要加大国家养老体系的建设，除却居家养老以外，还应加强社会养老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则要社会组织广泛介入老年人保健、养老服务、心理辅导、文化娱乐以及信息化教育等公益领域，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近年来，已有大学生通过公益创业的方式主动介入社区老年人服务。如由江苏大学生公益创业项目“爱之光”所推行的“青导奇缘”项目，通过加大对老年人的陪伴力度，缓解老年孤独感、保障老年人心理健康。当前，我国公益组织在老年人服务方面还有较大可拓展空间，尤其在“三无”“贫困”等弱势老人的福祉方面关注度不够。这也为大学生公益创业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二）助残服务

我国残疾人规模庞大。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残疾人口数量约在8500万人左右^①。为推进残疾人事业，2016年我国发布《“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要积极培育扶持助残组织健康发展，引导支持其开展助残活动，促进志愿助残服务常态化、专业化和有效化。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残疾人工作体系，在教育、医疗、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了长期的扶持，帮助其实现尊严、获得感与幸福感。然而，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的残疾人事业与残疾人发展的需求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紧紧围绕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巩固并延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毫不放松地加强残疾人民生保障，落实‘六稳’‘六保’首要任务，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和职业技能水平，稳定并扩大残疾人就业创业，丰富残疾人文化体育生活，以科技和法治力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不失时机地促进残疾人发展，为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②。这也为大学生投身助残服务创业拓展了空间。医学类大学生可以在健康服务、康养等领域为残疾人提供服务；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可以关注于残疾人心理健康和情绪管理；室内设计专业大学生可以关注居住环境的改造与无障碍居住环境的开发设计；教育学专业大学生可从残疾人执业培训等角度进行创业。目前，已有大学生投身于残疾人服务事业。如2020年开展的“阳光橱窗”残疾人扶贫公益计划，就是通过打造残疾人手工艺品教学及线上交易公益性平台，带动残疾人就业与致富。

^①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0年末全国残疾人总数及各类、不同残疾等级人数》，2012年6月26日，<http://www.cdpc.org.cn/zwgk/zccx/cjrgk/4c0d47abe6a3414790d4ee786553fb65.htm>，2021年8月14日。

^②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联召开“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征求意见座谈会》，2020年8月13日，<http://www.shdisabled.gov.cn/clwz/clwz/xwzx/clzyxw/2020/08/13/4028fc766e82321e0173ec57e3474ef1.html>，2021年8月14日。

（三）青少年服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随着我国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青少年（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青年）在成长成才、创业发展、社会融入等方面遇到很多问题，也使之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之一。青少年服务工作的开展，一方面要依赖共青团、中华儿童基金会等组织，另一方面，则要依赖于专业程度高、网络下沉、方案灵活的社会组织。大学生在青少年服务领域进行公益创业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大学生与其服务对象均属同辈群体，具有很多共享的价值观和学习、生活经历，更容易通过交流达成共识，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和实现服务的目的。二是大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道德关怀，更容易在对问题进行精准分析的基础上实现正确的价值引导。在青少年服务领域的公益创业方面，当前我国已有较为成功的案例，如昆明润土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与壹阳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均在青少年健康、心理卫生等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通过开发课程和项目，承接来自省内外的数量委托项目，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四）其他公益服务

除上述以外，大学生也可以通过其他公益创业项目主动融入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大潮。例如环保公益项目。环保型项目是大学生公益创业的热门选题。随着五个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始迅速走进人们的视野，环保意识也开始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公益创业中开始积极进行环保产业、节能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助力生态建设，共建美好家园。一些公益创业主体就坚守阳光创业初心，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工作，承担社会责任。

四、推动我国大学生公益创业融入社会治理的进路建构

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变革，不仅带来了技术的巨大进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与实现等成就，同时也捎带了利益关系的深度调整、环境破坏以及人口生育率等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要求政府不断吸收更多的专业型公益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从而为公益组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前，公益组织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及空间分布不均衡等问题。这也要求我们要通过教育、制度和政策等不断推进我国大学生公益创业。

（一）培养学生的道德心，引导学生关注民生福祉

一般来说，公益创业主体和普通创业者不同，他们拥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他们也更善于识别社会变革中出现的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从而创造社会价值。所以，公益创业者聚焦社会问题具有天然优势，这也是保证公益创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所以，公益创业首先需要将创业目标聚焦于如何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之上，引导社会资源聚焦社会痛点、热点问题，支持可持续的创新解决方案。民生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具有广泛的利益关联性和较强的公共性，也是连接公益创业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公益创业关注民生福祉，有利于拓展增进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渠道和层次。公益创业作为新时代发展最迅速的一种创业模式，也需积极抓住民生，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更大的治理成效。只有在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公益创业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动能、发展助力和发展平台。所以，必须把公益创业放在社会治理创新、民生福祉改善的大局中来谋划。可以说，这是手段亦是目的。

（二）依托现有公益组织，不断扩大社会资本

公益创业还需要积极创造社会资本，当然这得建立在公益和资本的良性循环之上。社会资本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交往的频度、广度、深度和密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和伙伴关系。公益创业过程中，必须与众多利益主体建立良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是获得声望的关键环节。一是建

议党委政府加强现有公益组织的孵化、教育引导,通过吸引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具体的服务项目,促使大学生了解盈利性公益组织的组织架构、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等知识,掌握将自我人文关怀与社会服务结合的技巧与方法,消除大学生与盈利性公益服务的分隔感,树立投身公益服务的决心和勇气。二是要建立资本与公益创业的合作平台,推动私人部门通过公益创业积极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并通过向私人部门推荐大学生公益创业项目,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大学生的创业门槛。三是要建立统一的大学生公益创业交流平台,鼓励大学生之间的知识和信息交流,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活力,带动大学生公益创业突破地域限制,投身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进行公益创业。

(三) 进一步推动政府“放管服”改革,定向增加社会服务采购规模

“政府服务的本质是提供公共产品,做好服务的关键是以企业和居民的需求为核心,不断提升公共产品的有效性”^①。当前,我国正在推行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放管服”改革,“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降低经济社会运行的制度成本,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完成创新宏观调控、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的现代转型”^②,“最终目的是给所有市场主体放权放得更活、监管更有序更公平、服务更到位更有效”^③。在“放管服”改革中,政府大量的服务工作需要向社会购买。鉴于大学生公益创业的特殊性,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中应该增大对大学生公益创业相关服务产品的购买规模,简化购买流程,适当降低购买资格要求。同时,在购买服务中,应增大对大学生公益创业组织的帮扶力度,推动其尽快完善组织结构,走出创业阶段。

(四) 优化现有制度环境,降低创业成本

在“放管服”改革中,国务院对为民服务、养老照护、公益慈善、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社会组织降低准入门槛。为促进大学生公益创业,政府还应该采取如下措施:进一步降低采购门槛,放宽工作场地、固定资产等要求指标;允许新创业、尚未盈利的公益创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投标;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租金、税收优惠等财政支持,降低大学生公益创业的成本;保障公益创业项目的人才供给,推动公益组织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推动理论创新和产品创新,为社会提供有针对性、高质量的服务产品。

五、结语

大学生公益创业工作是大学生创业格局中的重要部分。推进该工作可以进一步增加社会服务供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增强制度自信。推进该工作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将大学生从单纯的“经济人”角色转变为复合的“社会人”角色,使其重视社会责任的承担与自身道德价值的实现。针对大学生公益创业,政府与社会要持鼓励、宽容的态度,不断通过政策、文化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优化,保证创业人的尊严,给予其道德关怀,推动其组织尽快转成为成熟的社会组织,积极嵌入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实现。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张海冰:《打造新发展格局需深化“放管服”改革》,《经济参考报》2020年9月1日,第1版。

② 王柳:《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学习时报》2019年12月23日,第5版。

③ 胡敏:《深化放管服改革 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经济参考报》2021年6月10日,第1版。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院务咨询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

7月23日下午，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院务咨询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健全和完善共识教育协商办学的体制机制，推动云南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工作迈上新台阶，听取来自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省级统战单位、在昆高校、科研院所各位委员的意见建议。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院务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彬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院务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院务咨询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会议由徐彬主持。



会上，徐彬副主席为各位委员颁发了聘书；李涛副部长宣读了《省委统战部关于调整院务咨询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学院党组书记蔡勇介绍了《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2021—2025年发展规划》；学院常务副院长何云葵通报了2021年上半年教育培训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

各位委员结合《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2021—2025年发展规划》、省社院下半年教育培训工作，在学科建设、课程建设、理论研究、统战智库、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

李涛指出，院务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省社院院务咨询委员会工作机制正式启动，“联合党校联合办”拥有了重要平台，省社院与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省级统战单位、在昆高校、科研院所的沟通联系合作



建立了常态化的机制；标志着我们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和省委印发的《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又迈出了坚实步伐。他强调：一是作为院务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要在主任委员带领下做好各项工作；二是希望这一届院务咨询委员会委员充分发挥作用；三是省委统战部将一如既往地由省社院和院务咨询委员会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徐彬认真听取委员意见，要求省社院认真梳理汇总、研究吸纳，使之成为办学的实践、工作的动力、发展的基础。他强调，今天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与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省级统战单位、在昆高校、科研院所的沟通协作，进一步把“联合党校联合办”落到实处。

徐彬要求，一要突出“联合”，更加密切地推动“联合党校”的发展。更好地凝聚统战系统和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共识和智慧，真正“共商共建、共享共惠、共荣共兴”。二要突出“咨询”，以专业水准推进“十四五”时期云南统一战线教育培训工作。希望委员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和长处，充分发挥咨询协商作用，充分发挥好“智囊”作用，通过充分咨询、重点咨询、反复咨询，提高咨询质量，提出符合学院发展实际的好建议，促进成果转化。三要突出“院务”，以务实作风推动建设全国一流省级社院目标的实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咨询和协商中重点突出“院务”，使云南统一战线教育培训工作更具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全方位提升办学治院水平。通过院务咨询委员会这一制度化平台，发挥主体作用，以内行专业的水准、互动融合的姿态，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做实用好院务咨询委员会，落实好“联合党校联合办”，在推动云南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学院各处（室）、教学服务中心负责人参加会议。

（文字：肖莉莉 图片：王曜宇 责编：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1999年创刊)

2021年9月 第3期(总第91期) 第23卷

主管: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650031

电子邮箱:ynsyxbbjb@163.com

出版日期:2021年9月20日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Started in 1999)

Sept. 2021 No.3 (Sum.91) Vol.23

Responsible Institution: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No.221 Wu Yi Road,Kunming City,PRC

Post code:650031

E-mail:ynsyxbbjb@163.com

Published: September 20, 2021

ISSN 1671-2811



9 771671 281210

定价: 9.00元